

576.992  
454.03



3 0619 8193 6

# 中國青年黨建黨十九週年紀念特刊

## 目錄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二日發行

卷頭語

中國青年黨今後的兩大使命

趙毓松

全面和平與各黨各派的協力

陳耀芝

十九年來我們奮鬥的兩大階段

張光達

中國何以不能實行民主政治

王照明

太平洋大憲章與東亞新秩序

沈志遠

兩年來從政的感想

李守黑

大亞洲主義與中國前途

關作瓊

唯誠救國論

關作瓊

無黨政治與一黨專政

陳海濤

政治得失的衡量

許淨生

目前政治的病態與全面和平的前途

左臨淵

中外人士之中國青年黨觀(三篇)

張吾軍

渭清

閒話

# 國家主義淺說內容：

- 第一章 學理上之國家與國家主義
- 第二章 國家主義與今日之中國
- 第三章 國家主義的革命方略
- 第四章 國家主義的政治理想
- 第五章 國家主義與中國經濟問題
- 第六章 國家主義與國際問題
- 第七章 國家主義的政策大綱
- 第八章 國家主義何以特別反對共產主義
- 第九章 國家主義者的生活態度
- 第十章 中國國家主義運動與中國青年黨

中國青年黨總部編印

中國青年黨建黨第十九週年紀念特刊目錄

卷頭語

中國青年黨今後的兩大使命

十九年來我們奮鬥的兩大階段

太平洋大憲章與東亞新秩序

大亞洲主義與中國前途

無黨政治與一黨專政

目前政治的病態與全面和平的前途

全面和平與各黨各派的協力

中國何以不能實行民主政治

兩年來從政的感想

唯誠救國論

(一)

趙毓松 (五)

張光達 (七)

沈志遠 (二四)

關作瓚 (三四)

陳海濤 (五〇)

左臨淵 (六一)

陳耀芝 (七〇)

王照明 (八三)

李守黑 (九三)

關作瓚 (九七)

政治得失的衡量

中外人士之中國青年黨觀

- (一) 國內左右兩派之中國青年黨觀
- (二) 國外友邦人士之中國青年黨觀

詩九首

- (一) 悼成志鐘同志
- (二) 昆明寄懷馬寅初先生
- (三) 香港寄懷張君勳先生
- (四) 中國青年黨建黨十九週年紀念日舟中述感
- (五) 登北固山遠眺
- (六) 奉和為農兄壬午生日之作并寄所懷
- (七) 寄懷陳意園先生
- (八) 中國青年黨十九週年紀念日述懷
- (九) 中國青年黨十九週年紀念日述感

閒話

許淨生

(二〇三)

張吾軍

(二一四)

張吾軍

(二二三)

愚公

(一九六)

愚公

(六九)

愚公

(六九)

愚公

(四九)

木公

(三三)

木公

(六〇)

木公

(一三二)

胡遂良

(四九)

楊從仁

(一三六)

渭清

(一三三)



# 卷頭語

中國青年黨創黨於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迄今適爲第十九周年；而正式宣言參加和平運動，則肇始於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距今尚不過兩年又九個月。在此兩年又九個月中，吾人有感於國民黨領袖汪精衛先生「罪己的精神」之偉大，深願一本過去十餘年在野黨奮鬥的歷史，以期協力完成政府所標舉「對外實現和平，對內實施憲政，」的兩大使命！雖其間格於事勢，限於環境，尙有未能完全竭盡其智能，以作最善最大的努力，不無遺憾之處！但對軍政上一切措施，經濟上一切變革，外交上一切部署，無不極端尊重汪先生的意旨，縱觀點未盡相同，主張不無出入，仍竭力棄其小異，就其大同，以避免無謂的「黨爭」，務使此甫經脫離「一黨專政」的桎梏，轉向於「政黨神聖聯合」的雛型政制，不僅從茲奠定新生的「民主政治」的基礎，抑且永留中國政治史上最燦爛光榮的一頁。以是過去兩年又九個月中，吾人力持緘默，埋首苦幹，不欲在言論上多所置議，其故卽在此。此種維護大局共體時艱的苦心，想爲中外朝野有識之士所共諒！茲以本黨第十九週年紀念日，發佈特刊，一面檢討過去，回顧吾人血淚染成之歷史；一面詳察現實，稍貢吾人對於國事一得之愚！聊綴數語，以作引端：

第一：中日事變以來，雙方人民生命財產損失，難以數計。幸有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近衛首相發表對華三原則於前，而汪精衛先生復於同月二十九日發表豔電主張言利於後，

中日問題，遂急轉直下，由是而有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全國各黨各派無黨無派之組府還都，由是而有同年十一月三十日中日調整國交基本條約的簽訂。直至去年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發生，日本移師南征，卒將英美百餘年來侵略東亞的根基，掃蕩無存，雖目前戰事尚未中止，而我東亞被壓迫各民族，從茲得以解除束縛。吾人對於日本朝野不以戰勝國自居急謀結束中日事變的道義精神，以及驅逐英美侵略勢力的英勇戰績，深表無限的敬意！同時，因全面和平尚未實現，不克與友軍駢肩作戰，尤抱極深的歉忱！

第二：當汪先生未於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飛離重慶以前，舉國惑於「主和者就是漢奸」的輿論，無人敢於倡議言和，獨汪先生能力排衆議，不畏艱阻，毅然主張和平，雖三四年來戰爭狀態，并未終止，全面和平，猶未實現，其中原因錯雜，要非一端。然和平區內人民，能於田園荒蕪之後，重復歸其故鄉，敗瓦頽垣之中，從新理其舊業，苟非汪先生倡導和運，曷克臻此！所憾者，渝方殘餘勢力，依然存在，共產軍隊，到處陰謀赤化，我和平軍人「建軍」未久，終日征剿，尙未克奏膚功。以是人民於兵燹之餘，猶未能樂業安居。及至大東亞戰爭發生，汪先生更以「同甘共苦，勵行節約」之義，勗勉國人，是我和平區民衆，除自身已苦於物價暴騰生活維艱之外，猶須與東亞各民族分憂共苦，以期共存共榮！吾人對於束緊肚皮忍受苦痛的和平區民衆，以及汪先生不避犧牲忠勇謀國的信念，實表無上的敬佩！

第三：非和平區民衆，五年來忍受砲火與飛機的轟炸，忍受濫發紙幣後的生活困難，忍受

屢次喪師失地的精神苦痛，忍受一黨專政與個人獨裁的無理壓迫，忍受官商勾結假公濟私的非法統制，輾轉遷徙，不以爲苦，妻離子散，不以爲恨，家產蕩然，不以爲可惜！而我抗戰軍人誤信英美帝國主義者的挑撥離間，誤信軍事統帥的謬誤主張「抗戰」，以及藍衣社的虛偽宣傳，以是五年來各戰場的戰果，雖敗而不餒，且愈戰而愈勇！推原其故，實「國家至上」之一念，爲其胸中主宰，遂視任何犧牲，均爲求仁得仁，毫無顧惜。此種堅韌特性，執政者果能利用而善導之，未嘗不可藉此樹立民族復興的基礎。無如重慶政府依然拘泥「以不變應萬變」的原則，喪失許多可以言和的良機，徒然驅策祇知服從不知其他的無辜民衆與士兵，斷送其生命於盲目的「抗戰到底」的口號之下，寧不可悲！以是吾人對於忍受戰爭苦痛毫無怨言的非和平區域民衆，以及爲國犧牲的抗戰軍人，極表崇高的敬意！

第四：吾人創黨之初，卽首以實行國家主義，實現全民政治，實施社會政策三大綱領，號召國人，而十九年來，始則受國共兩黨的聯合壓迫，繼則爲獨裁武夫所敵視，甚至「以反革命治罪條例」及「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兩特別法令，嚴厲處置本黨同志，因是吾人過去所遭受之生命上，財產上，精神上的損失，以及失業失學的艱苦，實有難言之痛！茲當本黨建黨第十九週年紀念日，對過去爲衛國反共及盡瘁黨務的殉難受傷以及積勞病歿的本黨同志，吾人深表極崇敬的悼念！同時，對於困處數千里外非和平區域的各地同志，吾人更寄予無限的懷念，并遙祝其健康！

總之，自中日事變以來，國家意識普遍覺醒，國人始了然於國家主義之真諦，不復再有誤解曲解之辭，是則吾人過去十九年的奮鬥，尙不致謂爲「徒勞無功」，惟目前對於全民政治的認識，尙嫌不足，雖間有覺悟過去一黨專政的錯誤，主張實施憲政，以拯救國家危亡者，但相反的認爲須維護舊政制甚至傾向個人獨裁以便自私自利者，仍有絕大的潛在力量。况吾人主張之社會政策，牽涉範圍頗廣，亦非俟治安確立，秩序恢復，全面和平實現，則一切方案，一切計劃，無非空談。以是吾人今後所遭遇之艱苦，卽就協力完成實施憲政與實現和平兩點而言，當什倍百倍於過去十九年的努力，但決不以此灰心，決不以此自餒，「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決仍本此信念，繼續邁進！

左傳有云：「一夫不可狃，而况國乎！」吾人今效其義，換句話講：「一夫不可狃，而况黨乎！」政黨本爲一有信仰有主張有組織有羣衆的集團，吾人既有十九年的歷史又有佈滿全國的同志，雖不敢妄自誇大，以爲一黨之力單獨可以救國，但自己再三檢討，確確實實尙有許多未盡的力量與未用的人才，在目前「政黨神聖聯合」政制下果能彼此開誠合作，不存畛域之見，俾吾人得以貢獻其全部力量，則在協力救國的途中，吾人總不失爲一個有力的單位吧？目前本黨同志雖分處和平區與非和平區兩地，山川阻隔，情愫難通，深信今後工作的趨向決不因地域限制而有差別，其共爲同一目標而奮鬥，不言可喻。

「多難興邦」，古有明訓，願我國人，共同努力！（志遠）

576.992  
454.03  
2

## 中國青年黨今後的兩大使命

趙毓松

中國青年黨自建黨以來，至今已經十九週年了。回憶十九年前的今日，一羣壯懷激烈之書生，鑒於祖國情勢的阡危，與共產主義的伸張，毅然揭起國家主義的大纛，與內求統一外求獨立的口號，以號召全國，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十餘年來，我們這一羣書生，憑着自己對國家的一片血誠，不計成敗，繼續不斷的和專制獨夫與共產黨徒，作殊死的鬥爭。中間雖遭遇種種無情的壓迫與摧殘，而我們奮鬥的精神，仍舊是再接再厲，最後終被承認為合法政黨之一。關於這一點，我們不但可以自慰，而且可以自豪。

今當建黨十九週年紀念之期，我們回顧過去光榮的歷史，與夫目前國勢的傾危，我們更感覺到責任的重大。我們今後將挾其全力，以求貫徹我們兩大使命。

一、加緊反共工作，反共是中國青年黨先天的使命。因為共產主義與國家主義，是兩種絕對不能相容的思想，階級專政，與全民政治，是兩種極端衝突的政策。所以自中國青年黨成立以來，便不斷的和共產黨發生激烈的衝突與鬭爭，中國青年黨同志因此而犧牲者，前仆後繼。當國民黨聯俄容共時代，國共兩黨聯合所加於我們的壓迫，誠非人所能堪。然而我們的反抗，也只有再接再厲。自中日事變發生以來，共產黨利用抗戰的題目，成立邊區政府，極力擴張地

盤，培養實力。抗戰儘可失敗，而共產黨的勢力，却日見增高。抗戰的時期愈延長，共產黨愈爲得計。共產黨最會利用坐大政策與失敗主義，以逐漸擴張自己的地盤與實力，至於國家民族的前途，與人民大眾的生死，全不在他們的意下。這種殘忍自私的政黨，是國家民族的仇敵。我們國家主義者認清我們自己的使命，今後必須挾其全力從政治上社會上軍事上文化思想上，加緊我們反共的工作。

二、促進全面和平，日本武力征服中國，既不可能。渝方反攻勝利，也絕對無此希望。雙方長此相持，結果只有兩敗俱傷，同歸於盡。自從大東亞戰爭發生以來，日本的槍口已經轉向英美，中日的關係，已經轉變到另一新階段。我們認爲這是中日兩國罷戰言和棄嫌修好的絕好時機。無奈渝方受着英美蘇聯的慫恿，仍舊堅持着盲目抗戰的政策，弄成一種既不能戰又不能和的僵局，這是狠可惋惜的。中日事變，不幸已經繼續五年有餘。在這五年的事變當中，因爲戰爭的消耗，與生產的減少，弄得物資的缺乏，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在抗戰方面的人民，固然是朝不謀夕，即在和平區域內的人民，也都在叫苦連天。戰事倘再相持三五年，得不到個解決，恐怕大家都要一齊餓死。這是全國人民當前最切身最嚴重的生死問題。因而全國人民，無論抗戰區域和平區域，無一個不希望全面和平早日到來，中日兩國，早日恢復和平友邦的關係。我們今後當竭其力之所及，順應國民心理，以促進中日兩國全面的和平。

# 十九年來我們奮鬥的兩大階段

張光達

國家多故，歲月如流，中國青年黨自從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在法京巴黎之玫瑰城共和街舉行結黨式以來，已經奮鬥了整整十九年了。拿歷史的眼光來看，短短十九年，在時間上，不過是極小的一個片段。可是在這十九年中，國家發生亙古未有的變亂，而陷於存亡一髮的危境，本黨亦經歷許多艱難與困苦，而其所提倡的國家主義，則已成爲全國多數人民共同的信仰，其所倡導的國家主義運動，則已發展而成爲中華民族建國運動的主流。我們的同志，經過十九年的艱苦奮鬥，少年的已變成壯年，青年的已漸入中年，低徊往事，百感茫茫。而殉主義，殉國家，艱難死事，慷慨捐軀的同志，到處都有，尤堪悼念。這十九年中，我們究竟爲了國家民族有什麼努力，對於國家民族有多少貢獻，檢討過去而策勵未來，也是青年黨同志今天應有之事。

近代中國建國運動的目標，對外爲擺脫歐美帝國主義國家所加於中國的重重桎梏，而爭取國家的獨立與自由；對內

十九年來我們奮鬥的兩大階段

爲推翻一姓或少數人的專制統治，而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的全民政治。故在中國建國運動中，天然的應以「國家至上」爲中心思想，而樹立民主中心勢力以領導之。中國青年黨卽爲適應此種時代要求，擔負此種歷史使命而產生。蓋當時受第三國際指揮的共產黨已經開始在中國積極活動，鼓吹「階級鬥爭」，「一黨專政」，「世界革命」，「工人無祖國」等等謬論，國民黨也因實行聯俄容共的政策，理論與行動都受了共產黨的影響，引狼入室而不自覺其危。舊有的政黨，既不能獲得國人的信賴，我們這一部分人本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遂不得不另組新黨，爲理想而奮鬥。中國青年黨創立之後，明白揭櫫「國家主義」「民主政治」「社會政策」三大綱領，以爲建國的目標。過去十九年之奮鬥，卽向着這個目標而邁進。民國二十七年九月，本黨在漢口舉行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宣言，其中有一段敘述本黨的主張，茲特引錄如下：

## 中國青年黨建黨第十九週年紀念特刊

本黨創立之初，正是世界和平空氣瀰漫的時候，華盛頓會議的結果，九國公約保障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給予相信中國可以完全信賴國際保障安全的人以最大的安慰，因此懈怠自強自救的準備。中國青年黨在那個時代已經預見外力保障之不可信託，自強自救之不可忽略，中國人的問題祇有靠中國人自己來解決，任何友邦不能越俎代庖，為發醒國人倚賴外力，不求自立之道的迷夢起見，才明白地提出國家主義的原則，樹立國家高於一切的信仰，與當時所謂時代思潮宜戰。我們會主張以內求統一，外求獨立的精神來建國；我們會主張用全民武裝，自強自救的手段來衛國；我們會主張在政治上從速實現全民政治，使全體國民共同擔負衛國建國的責任；我們會主張在經濟上對外實行保護關稅，對內實行社會政策，以消弭社會的不平，建立自主的國防經濟體系；我們會主張在教育上建立以國家思想為信仰的教育方針，實行學校軍事化；我們會主張在國防上採陸主海從主義，樹立飛潛政策，以補海防空防之不足；我們會主張在文化思想上，消極地糾正個人主義，家族主義，部落主義，階級主義的謬誤思想，積極地建設組織化，紀律化，科學化，民主化的現代國家精神；我們會主張依國際平等的原則，促進世界的和平，建設平等化的合理國際組織；凡此種種，在本黨政策大綱及過去十五年中歷屆

## 八

全代會的宣言，以及一切屬於本黨的言論出版物都可以覆按，在當時依賴外力保障的迷夢正在瀰漫的時候，本黨所有的主張，固自為一部分有真知灼見的愛國人士所同情，但也免不了有一部分的反對。就為着這種反對，中國青年黨的同志，在十五年來，曾經蒙受過種種的摧殘，招致過種種的迫害，為着國家，為着信仰，為着真理與正義，中國青年黨的同志曾經孤獨地接受一切環境的猜疑，譏笑，排斥，干涉。現在事過境遷，我們不願意詳細追溯這些過去的事，然而我們不能忘記了對於死難同志的哀悼回憶，我們應該給全體中國國民很虔誠地指出來，過去實有一部份先知先覺的愛國青年，為着所抱的遠見超過於時代以前的緣故，不幸被愚昧的時代所犧牲了。」

我們之所以信仰國家主義，提倡國家主義，純粹因為國家主義合乎當前的要求，適應世界的潮流。國家主義是隨着國家組織存在的客觀事實而發生的，而國家發生與存在，又自有其學理的根據，歷史的背景，和事實的必要。既有國家集團之存在，這個國家集團的組成分子，在精神上自然會發生一種共同的國家意識。大家感覺同是一體，感覺自身與其所屬的國家有休戚相關不可分離的利害關係。大家生於斯，食於斯，工作於斯，遊釣於斯，死葬於斯，上須保存先民貽



留下來悠久深厚的歷史文化，下須爲子子孫孫作億萬斯年的打算。假使一方面又有外界的刺激，感覺到國家被侵略，而自身受壓迫，非起而自衛自救以圖生存不可，於是自然而然的發生國家主義的運動，雖有大力，亦不能遏。國家組織之維持賴此，國家民族之復興亦賴此。自從十九世紀以來，國家主義在歐洲各國，已成天經地義，不待提倡，人人信仰。獨在中國，則自秦漢建立漢民族統一的大帝國以後，悠悠二千餘年中，因爲環境不變，四圍外族都沒有發展到民族國家的階段，文化也比較中國落後，無從觀摩競爭，反而養成妄自尊大的心理。浸淫於大同思想與世界生活之中，生息於專制統治與家族制度之下的中國人，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家族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國家。國家意識既甚模糊，國家組織自難進步。結果中國這個國家，在形式上，論土地，則踞有亞洲東部大陸，比較整個歐洲還大，幅圓不可謂不廣；論人民，則四萬萬五千萬黃帝子孫，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不可謂不多；論政府，則歷朝厲行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生殺予奪，爲所欲爲，無限的權力不可謂不大。但是近百年來，海通一開

### 十九年來我們奮鬥的兩大階段

，環境一變，以一個既無現代國家意識又無現代國家機構的老大帝國，與意識和組織均已進步的國家相遇，遂無往而不失敗。自從一八四一年鴉片戰爭失敗以後，帝國主義的侵略，紛至沓來，不平等條約束縛，一重一重的加到我們身上。於是領土被割裂，主權被侵害，如割讓地，租借地，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內河航行權，內地駐兵權，海關郵政鹽務管理權等等權利，予取予求，不一而足。軍事侵略，政治侵略，經濟侵略，文化侵略，并行齊下，互相爲用，結果遂使中國淪於半殖民地的地位。憂時愛國之士，鑒於外交的失敗，國家的危險，於是紛紛奮起，大聲疾呼，鼓吹國家思想，從事救國運動，中間經過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雖然波瀾壯闊，但是國家意識的發揚，只限於知識階級，還沒有普及到全體國民。要全國人民覺醒，奮發起來，共同担负救國的責任，實有普遍的廣泛的灌輸國家思想之必要。我們遂當仁不讓，引爲己任，有系統，有組織的來提倡國家主義，以確立「國家至上」的中心信仰。

觀乎以上所述，我們信仰國家主義，倡導國家主義運動，有歷史的背景，有學理的根據，順乎世界的潮流，合乎國

家的要求，苟非喪心病狂，何致加以反對。可是當時共產黨人秉承第三國際的企圖，抱着篡奪國民黨以赤化中國的陰謀，遂視本黨為唯一勁敵，以雷霆萬鈞之力，壓迫之，摧殘之，必欲消滅之，粉碎之以為快。什麼「反動的」，「復古的」，「落伍的」，「開倒車」的種種惡意的徽號，一齊加到我們身上。從民國十四年到民國十六年，我們在國共合作雙重壓迫之下，受盡千難萬苦。當時我們的機關報，有十餘種被封閉禁止；甚至在廣州，閱讀「醒獅週報」者罰五十元；在武漢，家藏國家主義書報者捉拿，監禁，以至暗中殺害；真是匹夫無罪，愛國其罪。民國十六年以後，國共雖然分家，我們所受的壓迫，依然有加無已。九一八事變後，我們鑒於國難當前，主張「政黨休戰」，完全遵守「國家利益超過黨派利益」的原則，本國家主義的真正精神；但是國民黨不惟不接收我們的主張，反而加緊壓迫，通過一個「國家主義派處置議決案」，引用「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把我們與共產黨同樣看待。茲引錄當時報紙所載的兩段消息，以為證明。

(一)二十四年七月十日香港東方日報(國民黨機關報)載

稱：「廣東省黨部昨通告各縣市黨部云：現奉中央執行委員會處字第六三七六號通告，內開：案據秘書處簽呈，自新後叛變之處置決議案，凡曾經自首或自新而後參加共黨者，應一律予以槍決，或處無期徒刑之適用，須具備下列二條件。(1)自首或自新前係共黨份子。(2)自首或自新後所參加者係共黨，則共黨份子自首或自新後，參加國家主義派者，自不適用本決議案。又中央第一五一一次常會通過之國家主義派處置決議案。在新刑法未施行前，引用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自新者適用共黨自新條例，係指從未參加其他反動組織，僅參加國家主義派而言，前既參加共黨自首或自新後，復參加國家主義派者，自亦不適用本決議案。惟查此等份子，反動情節較重，以後如遇有此等案件，應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及刑法總則併合論罪章(六九條以下)，分則內亂罪章(一零三條以下)從重處理，不得准予自新。」

(二)二十四年五月念九日天津大公報長沙通信稱：「何鍵主席爰於二十一日電令全省各機關云：奉委員長蔣塞祕渝電令開：查國家主義派以前行動自不無錯誤，但比來該派各重要份子多有覺悟，表示懇摯，願在黨國紀律之下，對此復興民族之事業一致努力，本黨自可予以自新，不究既往。中央前已本此旨電令各級黨部遵照在案。據報湘省邇來仍有對該派份子因其既往關係，

故意壓迫情事。犇鄉一縣滋擾尤甚。此實違中央電令之意。嗣後對於曾參加該派之人，苟其現在言論行動並無違反三民主義，即應一律加予保護，不得橫加壓迫，勳予搜捕。共有已被羈押者，應即迅予查明，分別省釋。各級黨部人員尤應切實注意，以示本黨寬厚之懷。」

從上述兩段記載看來，可見當時國民黨是如何的壓迫我們，如何的侮辱我們，試問我們究竟犯了什麼罪，要向國民黨「自新」？如果說提倡國家主義是危害民國，那不是要提倡賣國主義才算不危害民國嗎？我們反共最早最力，國民黨如果早接受我們的忠告，何致有後來的赤禍。國民黨容共之時，幫同共產黨壓迫我們；國民黨分共之後，又把我們與共產黨同科，不以為我為德，反以我為仇，試問還有什麼公道可言？本黨領袖曾琦先生當時非常憤慨，曾有致同志常乃德先生書，論及此事，其中云：

「……觀其五月十四日致何健寒電謂：查國家主義派以前行動，自不無錯誤，但比來該派重要分子多有覺悟，表示懇摯，願在黨國紀律之下。對此復興民族之事業，一致努力，自可予以自新云云。是直認吾輩為有罪之人而加以恩赦者，弟讀之誠不勝其羞憤，吾兄試思我輩以往果有錯誤乎，究竟十二年來之事實證

### 十九年來我們奮鬥的兩大階段

明國民黨之主張錯誤乎？抑吾人之主張錯誤乎？統計國民黨當權以來，喪失國家領土逾五分之一。由聯俄容共所犧牲之民衆在一千萬以上，無非一黨專政之錯誤。今錯誤者不自承認其錯誤，而轉以不錯誤者為錯誤。甚且指為自新，認其人格，此甯得為合理之舉？不圖吾輩奮鬥十餘年，乃蒙茲莫大之恥辱。彼為主義為團體而犧牲之同志，如王建陌，趙登菲，馬致祥，成志達等如有靈，恐將飲泣於九原矣。弟之一生實未嘗受此奇辱大恥，故衷心忤忤然不安，不知兄等閱之於心安乎否乎？弟本擬即時登報聲明，並嚴斥其令文之荒謬，繼念舜生兄等尚在與之交往，恐將更感困難，應徐圖補救之法，未便操切從事，故勉以理智，壓抑感情，仍望兄與諸友，揆諸初衷，妥籌良策，能進一步實現弟之主張，則吾人大可心安理得，與之合作，否則仍宜守固有之立場，保全體之人格，無論壓力如何強大，亦不當為威武所屈，犇為光榮之失敗，不為屈辱之生存，於國家然，於團體然，於個人亦然，想兄亦具有同感也。」

曾先生的意見，代表本黨全體同志的意見；曾先生的憤慨，也代表本黨全體同志的憤慨。儘管國民黨加緊壓迫，我們基於為國家為信仰為真理正義的立場，在艱難痛苦之中，始終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奮鬥。直到民國二十六年，因經

過血的教訓，中國青年黨過去所提一切原則口號及主張，遂成爲中國國民共同信守的真理，國家高於一切的信仰，已經成爲天經地義，無人能忍心害理而再加以反對了。於是國民黨政府先後邀請本黨幹部同志參加廬山談話會及國防參議會。二十七年四月本黨遂與國民黨領袖正式交換函件，其原文如下：

(一) 中國青年黨代表左舜生致國民黨正副總裁蔣介石汪精衛函：「介石精衛先生惠鑒，敬啓者，國難尙在極嚴重之階段中，中國青年黨同人雖堅信長期抗戰勝利，必屬於我，但在目前尙不敢以輕忽之心，遽弛其戒慎之念。國民黨最近發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同人等曾詳細閱讀，並以極端之善意迎之；深信果能斟酌緩急先後，逐一見諸實行，必於國家有益。中山先生畢生奮鬥之目的，其一在爭取中華民國之自由平等，此次國民黨領導全國抗戰，即此遺教精神之具體發揮；其一在建國必以憲政爲指歸，此次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在此非常時期，不忘國民參政機關之建立，國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之保障，亦即異日憲政實施之端緒，與同人等夙昔主張之國家主義民主政治適相符合，願表甚深之敬佩，國民政府爲今日舉國共認之政府，亦即抗戰唯一之中心力量，同人等必本愛國赤忱，始終

擁護。中山先生謂，「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如公等認同人等夙所主張無背於救國之原則，俾同人等十五年來所慘淡經營之一集團，在抗戰建國過程中，得盡其最善之努力，庶於國家前途，能有較大之貢獻。同人等唯認定國家至上，故在過去十五年中，雖對政治不負任何直接責任，而愛護國家，始終不渝，補偏救弊，未嘗以環境艱難而稍懈其努力。至其成績如何，固不欲自爲陳述。總之，同人等觀目前之艱鉅，念來日之大難，僅有與國民黨共患難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計，及僅知國家不能不團結，以求共保，此外亦無所企圖，坦率直陳，力求實踐。耿耿之懷，敬候明教。此頌助安！中國青年黨代表左舜生謹啓，二十七年四月念一日」

(二) 國民黨正副總裁蔣介石汪精衛覆中國青年黨代表左舜生函：「舜生先生惠鑒：展誦來書，承示對於國家前途之觀察，思深慮遠，至爲欽佩；並且示及夙昔主張，與本黨總理孫先生畢生奮鬥之目的相符合，掬示擁護政府之赤忱，願爲抗戰建國而盡最善之努力，誠懇坦直，矢共艱難，循誦之餘，彌深感謝。本黨對於抗戰建國大計與期望，已具詳於臨時代表大會宣言與抗戰建國綱領。責任所在，無可旁貸；而實踐之功，必賴羣力。今日舉國共同之期望，唯在攘除外侮，實現三民主義以救國。本黨念實，

任之艱鉅，惟望集中全國之心思才力，以共濟此日之艱危，而謀國家久遠之福利。苟從同樣之方向，必團結而無間，此願共相勉者也。輒因來書，布其誠款，即維鑒察。祇候台綫——蔣中正汪精衛謹啓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自經此次交換函件之後，國民黨才正式承認本黨合法的地位，并聘請本黨同志爲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昔爲階下囚，今爲座上客，本黨提倡國家主義，經過十五年的艱苦奮鬥，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這是本黨奮鬥的第一個階級。因爲國民黨答覆本黨的信由蔣汪二氏聯名，所以現在本黨無論在和平區域或抗戰區域，都是以合法的地位，從事公開的活動，再無人能加以壓迫。而我們所提倡的國家主義究竟是「反動的」嗎，還是「革命的」嗎？究竟是「復古的」嗎，還是「維新的」嗎？究竟是「落伍的」嗎，還是「前進的」嗎？究竟是「開倒車」嗎，還是「迎頭趕上」嗎？也自有事實證明。共產黨人當日昧着良心來罵我們，現在請看看他們的祖國蘇聯，是不是實行百分之百的國家主義嗎？近來雖然還有一些人故意以「狹義的」形容詞加在「國家主義」上面，也不過徒然暴露他們的狹隘與無聊而已，何損乎國家主義的真

十九年來我們奮鬥的兩大階段

正價值！

我們提倡國家主義。同時又主張民主政治，其理由亦甚易明瞭。第一，既要全國國民共同負起救國建國的責任，必須使人人先感覺到國家乃是大家共有共治共享之物，每個人與國家都有休戚相關禍福與共的切身利害關係。要如此，必須全國國民人人都有過問政治的權利與機會，不能讓一黨一派甚至個人包辦。第二，民主政治是最合理的政治。固然，它也有缺點，有流弊，但是儘可修正，儘可補救；在還沒有發現比民主政治更好更合理的政治制度以前，何能因噎廢食。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所行的民主政治的流弊，我們早已看到，並不願意完全抄襲那一套。我們主張職業選舉與地方選舉同時並行，選民與被選舉者均須分別予以教育程度的限制，就是爲的適合中國國情，補救英美民主政治的流弊。我們的一切主張，均以適合國情爲標準，既不抄襲蘇聯的共產主義，德義的法西斯主義，也自然不抄襲英美的民主政治。我們所需要的，所主張的，乃是中國的民主政治。

孫中山先生本來是提倡民權主義最早之人，先後和滿清政府及北洋軍閥奮鬥了四十餘年，臨終易箆之時，猶不忘民

權，殷殷以從速召開國民會議囑告同志。可惜孫先生逝世之後，國民黨竟因吸收共產黨理論之故，更以蔣介石一念之私，遂忘其先總理的遺囑，放棄民主正統，實行一黨專政，釀成後來種種變亂。其他不必說，即以中日事變而論，他不發生於北洋軍閥當政亂國時期，偏偏發生於蔣介石獨裁時期，這個責任總不能推到國民或其他各黨各派身上吧！岩井英一氏在「中國新政治體制」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國民黨因國民革命的成功，盡了其時代的任務，可是國民黨真正的生命——換言之，是對於民衆的魅力，在滿洲事變以後可以認爲是喪失了。爲什麼呢？因爲國民黨指導抗日的結果，便發生了滿洲事變；但事變的結果，國民黨的政府却完全失去了滿洲。倘照當時國民黨政府的立場，當然是應該出兵滿洲收回失地而忠實履行其對國民的公約的。然而國民黨的政府，却違背了國民的信約，只在口裏喊着收回失地，而徒然暴露其依賴歐美的無力狀態。因此民衆所期待於國民黨的，便急劇地減退了。看見這種情形，挺身爲國民黨謀起死回生的，是所謂藍衣社。藍衣社從各種事情看來，完全是維持了國民黨的舊招牌的；但其內容却完全是另外一個特殊的存在。從前國民黨的色彩，是完全一變而成爲蔣介石獨裁的機構了。徹底地說，國民黨在這個時候，無論在

民衆之間或實質的意義上，都可以說是沒落了。單是這樣還不要緊，可是在國民黨的假面之下所行的蔣介石的獨裁政治，却使民衆對於國民黨的反感加深了一層。其最後的失敗，便是這次中日事變。這樣一來，國民黨對於國民應負的責任便成了致命的打擊，現在國民大眾對於國民黨的感情，已經是超過了不信任的程度，而且把它當爲怨府了。」

這段話，我們非國民黨人看到，也不勝其感慨，不知國民黨的朋友看到作何感想。假使在外國，執政的黨對於這樣重大的政治責任，總不能不引咎以謝國人吧！

我們既主張民主政治，認爲在中華民國的名義下，決不能容許有特權階級的存在，決不能容許有皇室貴族的存在，所以非反對一黨專政不可；既反對一黨專政，遂與實行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政府立於對立的地位，在國難發生以前，除理論鬥爭外，并準備以革命手段推翻這個一黨專政的局面。民國十九年國民黨中的西山會議派改組派與北方的馮閻南方的桂系等實力派聯合反蔣，在北平組織擴大會議，國民黨元老西山會議派領袖鄒魯謝持二氏曾再三要求本黨參加合作。當時本黨雖不願意參加國民黨內部的糾紛；但對於民主與獨裁之爭，當然贊成民主而反對獨裁；惟對於國民黨人倒蔣後是

否實行民主取消一黨專政，則仍不無懷疑。所以鄒氏特致函本黨領袖曾琦先生加以解釋。其原因如下：

「慕韓先生大鑒：日前駕臨暢談，至快。頃由怒剛兄來云：

先生仍對於國民黨懷疑其一黨專政，弟謹引下二節，則先生閱之當能釋然也。（一）國民會議籌備條件第五條第九項云各政黨，既以各政黨為組織國民會議之一份子，則一黨專政何有。（二）

約法第二百一十一條第二項云：如國民會議議決另定憲法時。本約法于憲法頒布之日，失其効力，憲法由各政黨參加組織之國民會議得另定，則非一黨專政更明。肅此敬請日祺。弟魯手啓。十四日」（擴大會議於十九年八月一日成立，此函係寫於那一年六月，函中所稱之怒剛，即曾參加黃花崗革命之但懋辛，現任重慶國民參政員。）

擴大會議未幾即告失敗，國民黨一黨專政如故，本黨反對一黨專政之活動亦如故。及至九一八事變發生，本黨本其向所信守「國家利益超於黨的利益」的原則，主張「政黨休戰」，全國團結，共赴國難，國民黨中明達之士亦有此同感。惟厲行個人獨裁的蔣介石還沒有覺悟，故二十一年國民政府召集國難會議，青年黨同志雖有九人被邀；但因政府限制議題，範圍太窄，青年黨同志皆未出席。二十四年七月，本

十九年來我們奮鬥的兩大階段

黨領袖曾琦先生向國內各方提出「改革現制創造新局之方案及其理由」，其中將維持一黨專政之利與維持一黨專政之害列表而比較之如下：

維持一黨專政之利

- 一，由少數人負責，意見易於一致。
- 二，可免政治制度之紛更。

維持一黨專政之害

- 一，訓政之結果不良，維持徒成怨府。
- 二，由一黨一派包辦，全國人才不能集中。
- 三，黨派超於國家之上，難以使人信仰。
- 四，一黨專政之下，民意不能伸張，國力難以增強。
- 五，頻年黨統之爭，頗似過去法統之爭，人民已有極端厭惡之感。
- 六，未來之國難嚴重，非一黨所能獨當。
- 七，國民黨自定之六年訓政，期限已滿，延期結束，徒失信用。
- 八，訓政之無期延期，與中山之遺囑不符。
- 九，待外力之逼迫，而後取銷黨治，於國家之尊嚴有損。
- 十，國民黨領袖所自發之言論，及迭次結束訓政實行憲政之約言，迄未實踐，既失國民信用，復損自身威信。

結論根據上列兩表利害之比較，提出創造新局之方案如下：

「至於創造新局，辦法甚多，惟以茲事體大，不能徒逞一己之私見，必須廣徵各方之輿論。謹舉其必須遵守之原則如下，以供朝野明達之參攷。

- 一，依於主權在民之原則，實行結束訓政，開始憲政。
- 二，於結束訓政之際，依孫中山先生十三年北上之主張，先開一國民大會預備會，再由國民大會預備會製定國民大會組織法，召集正式國民大會，國民大會預備會之組成分子，略徵中山九團體之意而變通適用之。（中山原用國民會議預備會名義，因二十年曾有一次國民會議之召集，故改稱國民大會預備會）尤以各政黨之參加，足以證明一黨專政之取消，必須實行，以昭大信。
- 三，宣佈結束訓政之後，即日開放黨禁，凡不抵觸國體之政黨，一律許其公開活動，不得任意限制。
- 四，訓政結束之後，宜由國民大會預備會先行選舉若干人物，成立各黨聯立舉國一致之政府。由此新政府負責進行憲政及一切對外事宜。

以上為改革現制創造新局最低限度之原則，國人苟能毅然共守而實行之，國事其庶幾有轉危為安之望乎，是在朝野有力人物

之決心與勇氣何如耳。」

曾先生此項意見，當時極博得各方的同情，國民黨當局也開始與本黨作意見上的交換。到二十六年，中日關係更趨緊張，廬山談話會中，青年黨幹部遂有多人被邀參加；及滬戰爆發，政府成立國防參議會，網羅各黨各派領袖，青年黨最高幹部亦在其中；二十七年國民參政會成立，青年黨亦有多人參加；於是各黨各派合作之局，可算初步實現。本黨認為國民參政會雖然不是純粹的民意機關；但如能好好運用，還不失為由一黨專政進入憲政的過渡機關，所以遂集中全力，在國民參政會中，從事民主政治的鬥爭。我們認為欲促成憲政，必須由下而上，先成立各級地方民意機關。第一屆參政會於二十七年七月舉行第一次大會時，本黨領袖曾琦先生即領銜提出設立各級地方民意機關案，而獲得通過。於是各省的省參議會首先紛紛成立，大家稱曾先生為「省參議會的產婆」，曾先生也確能當之而無愧。然而縣市參議會猶未成立，地方民衆機關終不能算完備，老百姓在地方受了切身的痛苦，依然沒有機會申訴他們的意見。所以二十八年三月參政會舉行第三次大會時，曾先生又領銜提出限半年內成立縣



市參議會案，結果將「半年」改為「短期」而決議通過。然而既稱「短期」，終不能拖延太長。政府既不利於縣市參議會的成立；一面又怕參政員的不斷催促，乃別出心裁，頒布「縣鄉鎮代表考試條例」。代表本出自選舉，選舉與考試，根本不能相容，由政府攷取之人，斷不能認為人民選舉之代表，政府如此抹殺民意，當然要引起多數參政員的不滿，這是一件事。二十八年九月參政會舉行第四次大會時，通過「

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案」，其後國民黨六中全會復決定於二十九年十一月召集國民大會。參政員們多以為蔣介石已同意取銷一黨專政放棄個人獨裁；那裏知道，蔣氏此舉，并無絲毫誠意，祇是一時權宜。蓋當時汪精衛先生已在籌備組府還都，因其表示將取銷一黨專政，實行憲政，并歡迎各黨各派合作，深得各方同情；蔣氏大起恐慌，才不得已宣稱準備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藉以維繫人心；後來看到和平政府一時並未召開國民大會實行憲政，於是又根本取銷召開國民大會的決定，出爾反爾，不顧失信於全國。參政員們因受其欺騙，更加憤慨，這又是一件事。各黨各派因為對這兩件事的不滿與憤慨，遂有民主政團大同盟

### 十九年來我們奮鬥的兩大階段

的組織，本黨即其領導份子之一，其政綱中即明白規定期限結束訓政，實行憲政；及取銷縣鄉鎮代表考試條例等項。這個大同盟，目前雖然還沒有正式對蔣介石採取對立的形勢；然其趨勢，要求民主憲政反對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各黨各派，既對蔣氏根本失望，自不得不另闢途徑，從事奮鬥，朝野協力之局的不能維持到底，其責任在蔣介石而不在各黨各派，這是很明顯的事實。

蔣介石對於取銷一黨專政、放棄個人獨裁、實行民主政治，本來沒有絲毫的誠意。過去所以拿準備開放政權的姿態要求各黨各派合作，完全因為對外失敗，不得不對內搪塞敷衍。如九一八事變後有國難會議，華北問題緊張時有廬山談話會，七七事變後有國防參議會，南京失陷後有國民參政會，外力逼緊一步對內即放鬆一步，地位稍見穩固，則又回復到絕對獨裁。他年來靦顏依附於民主陣線。英國打了敗仗，議員可以在議會中責問邱吉爾，歷數日而不休，民間輿論，更不消說。試問蔣介石不斷的喪師失地，中國人民能不能夠責問一聲嗎？名滿全國的馬寅初先生，不過因為公開批評發國難財的皇親國戚宋孔二家，即被非法拘捕，性命幾乎不保，至

今不知下落。汪精衛先生在重慶時，以國民黨副總裁的地位，尚且不能公開主和，非逃出來不可。即此二事，就可以概括一切。試問這是民主嗎，還是專制呢？即以實行獨裁政治的國家而論，如德國，國社黨的獨裁，根據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廿四日德國議會的授權法案，四年期滿，又經議會再行延長；這雖然是一種形式上的手續；但也可以見國社黨並沒有根本否認主權在民的原則，議會雖成告朔餼羊，但名義依然存在；而且希特勒元首還常常舉行國民投票，以測驗國民對於他和政府的意見，這也可見獨裁國家亦未嘗不尊重民意。其次，如意大利，法西斯黨執政以來，也依然有議會；雖然選舉方法已經改變，不能完全代表民意；但是還可以審查政府已做的工作，可以審查政府的財政預算，因此就可以監督政府。再看蘇聯，共產黨一黨專政，形式上還有所謂蘇維埃大會，並且有憲法，一九三九年公佈的新憲法，蘇俄當局且自誇為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由此可見獨裁國家原則上依然承認主權在民，相當尊重民意，形式上依然有議會，有憲法。蔣介石現行的獨裁制度，則更進一步，簡直要恢復過去「朕即國家」的專制統治了。再以個人及政績而論，假使蔣氏果

真是曠代異才，公忠體國，對外確有辦法，內治也有成績，縱然專斷獨裁，猶未嘗不可服人。現代獨裁國家的領袖，如希特勒元首，如墨索里尼首相，都有政治軍事外交的天才，對國家有誠意而無私心，能引用全國人才，勵精圖治，埋頭苦幹，故能舉富國強兵之實，得到國人的擁戴。以蔣氏與希墨二氏比較，相去不知多遠，果真神聖文武，國家何至弄到這個地步。更觀蔣氏獨裁下的政治現象，若女主干政，則宋美齡日在左右，參預一切，儼然漢之呂后，唐之武后韋后張良娣。若外戚擅權，則宋孔二家勢傾朝野，錢存美國，其貪污驕侈，遠過西漢之上官霍王諸家，東漢之竇鄧閻梁諸家，唐之楊家。若僉壬用事，則陳氏兄弟把持黨權，排除異己，其才不及唐之牛僧孺李宗閔，宋之章惇蔡京，而惡則過之。至於藍衣社縱騎密佈全國，對於正人君子，愛國青年，拘捕暗殺，無所不用其極，其淫威更百倍於明末之東廠西廠。曠觀前史，這四種現象，有一於此，即足以喪邦亂國而有餘，何況同時兼而有之。可憐我們中國人民，俯首帖耳呻吟憔悴，偷生苟活於專制統治之下，已經二千餘年，今後還能再忍受嗎？蔣介石這樣拖下去，喪失十幾省的領土，犧牲幾千萬的

同胞，毫不顧惜，而對於異己則壓迫防制，不遺餘力，一似國可亡而黨不可亡，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生命財產，可以犧牲，而個人的地位權力不可不保。我們當然不能袖手旁觀，讓他以國殉黨，惟有堅決反對，繼續奮鬥，推翻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局面，貫徹民主政治的理想，不達目的，決不中止的。

汪精衛先生脫棄重慶之後，組府還都之時，鑒於個人獨裁的誤國，與一黨專政之為全國團結的障礙，大聲疾呼，宣布取消一黨專政，實施憲政，并歡迎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參加合作。本黨一部分同志遂聞風而起，由趙毓松先生領導，與國民黨平等合作，以至於今。查國民政府綱領第五條明白規定：

「設立各級民意機關，網羅各界人才，集中全國公意，以養成民主政治。」

第六條明白規定：

「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

又國府還都宣言稱：

「所謂實施憲政，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及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十九年來我們奮鬥的兩大階段

宣言中，已有明白之決定。全國賢智之士亦已一致贊同。當此戰後，百廢待舉，端賴舉國同胞，集中心力物力，勇往精神，以完成現代國家之建設，過去個人獨裁為全國人民精誠團結之障礙，必當革除。共產黨挑撥階級鬥爭，尤為國家民族之大敵，必當摧陷廓清，使無遺毒。至於各級民意機關之設立，地方自治之舉辦，以及國民大會之召集，憲法之制定頒布，皆當剋期見諸實行，以慰海內人民之望。」

汪先生和平宣言稱：

「去年八月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鄭重宣布自今以後，易抗戰建國之口號為和平建國，並鄭重宣布以反共為和平建國之必要工作。且鑒於個人獨裁之誤國，憲政實施之不容再緩。復鄭重宣佈，務於最短期間，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使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者，得見之實行。」

汪先生於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在南京廣播「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又說：

「關於實施憲政，中央政治會議，已經決議了，在國民政府還都之後，就設立憲政實施委員會，務要於最短期間，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

「……現在國民黨打算放棄一黨專政，既然放棄一黨專政，

把這宣傳部的大權，把這民衆訓練的大權，放在中央黨部裏，怎樣可以表示不是一黨專政呢？」

汪先生這樣明白放棄一黨專政的表示和他在還都時所發表「罪己精神」的論文，恰好與蔣介石的「下詔罪人」「以國殉黨」，成了一個極端的相反。當時不惟獲得各方廣泛的同情，並且幾乎使渝蔣政權爲之根本動搖。可惜憲政實施委員會成立兩年以來，政府對於實施憲政的具體工作，還沒有進一步的表現，召集國民大會也遙遙無期，因而各方面還有許多想參加合作的集團或個人保持觀望的態度。但今年四月間，孫良誠來歸之時，上海中華日報會於四月二十三日發表一篇社論，題爲「孫良誠來歸與渝蔣之沒落」。原文節錄於下：

「渝蔣政治的本質是軍事獨裁與江浙財閥買辦勢力的合流，四年以來，渝蔣政治沒落恰恰針對着這二種性格而劃分出兩個階段，首先是由於政治的腐蝕影響了軍事獨裁勢力的破產，其次是由於英美在東亞經濟勢力的消滅帶來了買辦資本的全部瓦解。軍事獨裁的破產，是政治腐蝕的反映，政治腐蝕發展到最後階段，就是「政治的出賣」，大東戰爭爆發以來，渝蔣軍隊甘爲英美帝國主義者充炮灰，就是「政治出賣」的證明。和平運動的政治主張，是堅決反對軍事獨裁與政治出賣，在大東亞戰爭繼續勝利

與英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退出東亞之門的現階段，和平運動已經增加了一種爲全國民衆擁護的民主力量來打擊渝蔣腐敗政治。

這種民主力量從什麼地方產出的呢？是從反對渝蔣軍事獨裁與政治出賣的廣大覺悟軍人中產生出來的；最近孫良誠將軍率領二萬三千部隊的効忠和運，就是和平運動民主力量增強的證明，也是和平運動發展到更高階段的證明。渝蔣需要軍事獨裁來鎮壓民衆的不滿心理，但是軍隊高級將領與下級士兵是需要民主精神來反對軍事獨裁，孫良誠將軍在愛護民主，擁護和平運動的大無畏精神下毅然擺脫渝蔣獨裁勢力的羈絆，率部來歸，這是中國軍人精神的至高表現，也是渝蔣軍事獨裁今後崩潰的反映。」

「從孫將軍率部來歸的事實上，我們可以指出和平運動所揭發的實行民主與反對獨裁，不是一種空泛的口號，而是配合了當前中國政治改造的要求與人民的需要，不是謀一時的弭戰苟安，而是具有復興中華驅逐英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決心，這種偉大意義的啓示，與渝蔣腐敗政治恰恰是前進與沒落的對照。」

中華日報一般公認是汪先生的機關報，其言論當然可以代表執政的國民黨。該報這樣強調的攻擊獨裁，擁護民主，足見汪先生及其同志始終沒有放棄取銷一黨專政實施憲政的初衷。我們相信汪先生斷不能像蔣介石那樣不顧政治信用，在最

近的將來，一定要向國民實踐其諾言的。最近雖然又隱隱約約聽到「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呼聲；我們相信這絕不是汪先生的本意，因為這個口號本是淪蔣方面喊出來的，以圖維持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甯淪兩方，既然分道揚鑣，政治作風，豈能依然一致。我們認為當今之計，對內必須一切盡反淪蔣之所為，尤其是在根本推翻獨裁政治這一點上，然後才能把握民心，獲得全國各方的同情合作，參加支持，全面和平才有實施的希望；如果換湯不換藥，是斷斷不能起死回生的。至於我們始終要保持民主的立場，為貫徹理想而奮鬥，在任何環境之下，決不變更改衷；對於以取消一黨專政，反對個人獨裁，實行憲政號召全國的民主政治家汪先生，衷心希望其成爲國家的領袖，而不止是一黨一派的領袖。本黨仍當本這幾年來竭誠合作的精神，同心協力，共濟艱難，以促成民主政治的實現，和建國大業的成功。

此外，我們認爲國事的敗壞，人民的痛苦，政治貪污是一個最大的原因。要想政治清明，要闡人民福利，非澈底肅清貪污不可。民國二十七年本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會說：

「中國不幸，自鴉片戰爭以來，國家多故，政治不良，致陷於日蹙百里的地位。近十年來，統一逐漸完成，復興稍有希望，不幸一切內政未能盡具與國規模，致啓強隣窺伺之機。其最可痛心者爲官吏貪污風氣之繼長增高，驕奢淫佚之風，由首都以至於四方。國家每年向人民增加億萬的賦稅，募億萬的債款，是否真能滴滴俱用於建設事業，已爲天下所共疑。一般不肖官吏，平時假借官吏，浪費公帑，營私罔利，魚肉平民，以致社會愈趨窮困，而通都大邑官署私宅，反有畸形的繁榮。國家富藏，祇有此數，官吏愈趨奢佚，即平民愈加窮困，中國今日國民經濟的不均平，與其說是由於社會問題，毋寧說由於政治問題。本黨歷來於政治的貪污現象，已大聲疾呼再三加以糾彈，今後在國難嚴重情勢之下，更當本協助政府的態度，積極主張肅清貪污，以解除人民的痛苦。」

這幾年來，政治貪污的風氣，不但沒有肅清，反有變本加厲的趨勢。國事的敗壞，人民的痛苦，也日甚一日。我們更不得不本一貫的立場，一面協助政府，一面發動輿論制裁，打倒貪污，澄清政治，以解除人民的痛苦。

本黨自進入第二個階段以來，即集中全力爲民主政治而奮鬥，至於本黨三大建國綱領之一的「社會政策」，則有待

於第三個階段的奮鬥。因其距離實現時期尚早，故從未積極宣傳，以致一部份人誤認本黨祇注意政治問題而不注意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其實本黨所主張的社會政策，乃最急進的社會政策。本黨的最後目標，既在建設一個全民福利的國家，對於國家社會種種不合理的現象，自非根本消弭不可。我們不但要求政治的民主主義，並且要求社會的民主主義。大體言之，本黨的社會政策，除本黨政策大綱所規定一般社會政策，如保障人民在經濟上之工作權及生活權，保護勞資雙方結社集會自由，制定保護勞工扶助農民的各種法律，大企業國營，限制土地享有權等項外，尚有種種更急進的主張。如（一）主張教育免費；國家現行國民義務教育，只限於六年小學，中學大學教育，均非義務教育，即以小學而論，亦感於數目太少，未能普遍，於是讀書非錢不行，學費，書籍費，儀器費，實驗費，體育費，圖書館費等等名目，再加以膳費宿費，合起來計算，大學每年在千元以上，中小學亦在五五百元以上，受教育遂成爲富家子女的專利器，一般貧家子女，不但不能上大學，即中學小學，亦多望門牆而興歎。就是中資之家，欲培植幾個子女讀書，也往往因而傾家蕩產

，貧家子女的智慧並不比富家子女低劣，而刻苦好學的精神且往往過之，只因家中沒有金錢，國家義務教育又不普及不完全，遂剝奪其受教育的權利，事之不平，莫過於此，且就國家立場而言，祇有少數富家的子女才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中產階級的子女往往不能進大學，無產階級的子女則連中小學也不能進，試問民智如何能夠普遍的進步。所以我們主張國家各級學校，一律不收學費，其他一切費用，亦均由政府供給，庶幾無論貧富子女，人人均有受國家教育的平等權利與同樣機會。（二）主張醫藥免費。人之痛苦，莫過於生病，尤莫過於貧病交迫，而窮人因環境所限，無法講究衛生，更容易生病。病了無力就醫，無錢買藥，只好輾轉呻吟，束手待斃，人生悲慘，莫甚於此。中國各大小城市，雖然偶有慈善性質的醫院，但爲數有限，規模不大，不能容納多少人，且事實上還不是完全不要錢。至於許多公私醫院，則「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病無錢莫進來」。同樣的是人，同樣的生病，爲什麼有錢的即能續命，沒有錢的即不能享受醫藥的福音？這也是社會的不平現象之一。而且窮人多數是有生產力的勞動份子，其死亡便是國力的損失，政府何能坐視不顧？

像法國的巴黎，全市二十四區，每區由政府設立一個醫院，任何病人，沒有貴賤貧富的區別，不分國籍種族的界限，都可以進去住院就醫，不用化一文錢，這真是法國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的表現。所以我們主張政府須在全國各大小城市，依照人口的多寡，分區設立醫院，一切免費，來者不拒，庶幾窮苦人民的健康才有保障。就上述兩項主張觀之，可以略見本黨的急進社會政策的一斑，不過要使理想成爲事實，尙有待我們作長期的奮鬥。

綜觀上述，中國青年黨創立以來，第一個階段爲國家主義而奮鬥，從民國十二年到民國二十七年整整奮鬥了十五年，才能夠使國家至上的思想，發揚光大，成爲全國人民的中心信仰。自從民國二十七年以來，進入第二個階段的初期，正在爲民主政治而奮鬥，這個階段也許比第一個階段更要長。將來第二個階段完成後，還有社會政策的第三個階段，需要我們作最後的奮鬥。中國的建國運動，本是任重而道遠的工作，斷非一蹴可就，也非短期可成。我們對於過去的努力，

并不自滿，而體念未來責任的艱巨，更不敢自餒。我們本是書生集團，外無國際的背景，內無地盤的憑藉，赤手空拳，在重重壓迫之下，爲理想爲主義而奮鬥，不屈不撓，再接再厲，艱苦撐持至十九年之久，居然凝結成一部分力量，可見還不是「百無一用」的書生。我們既不能置國家治亂存亡於不顧，則本一貫的精神，作長期的奮鬥，亦義不容辭而勢不容已。法國大革命，自一七八九年爆發至一八七九年共和黨勝利，其間波瀾起伏，內亂外患，整整經過九十年的長期擾攘。中國革命，從辛亥那年算起，到現在還只抵到法國革命時期的三分之一。國家主義運動不發則已，一發即磅礴奔騰，其勢不容中止，莫之能禦，千迴百折，必底於成。我們如果及身而見其成功，固屬國家之幸，同胞之幸，本黨之幸，個人之幸。假使不能，還有下一輩青年在，繼起不患無人，理想終可實現；即使成功不自本黨，我們只要責任已盡，努力不虛，也就心安理得了。

## 太平洋大憲章與東亞新秩序

沈志遠

### (一) 「十四原則」的慘痛教訓

這一次世界大戰的開始，與上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時間上雖說是相距二十年，可是在性質上，無論從任何方面看，都應該把這一次世界大戰，當做是上一次世界大戰的持續，決不會解釋為偶然或是突然發生的。因為這一次世界大戰單就歐洲方面說，是老早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所締結的凡爾賽和約中，就埋下了許多可以再度引起戰爭的因素的。關於這一點，當時出席巴黎和會的英國代表路易喬治，也就預料到德國在某一時期決會設法報復的。例如他在一九一九年四月所提出的備忘錄裏面說：

「英雄主義與勝利的圖景，只能誘惑那些不知道戰爭之痛苦與恐怖的人們。當各國被戰爭所耗竭，為戰爭而出盡了一切力量，為戰爭而疲乏，流血，破毀的時候，要斡旋這一代的不平，并非難事。可是，當飽歷戰爭之實際經驗的這一代消逝以後，要目

前所構成的和平，不會挑撥起新的鬥爭。那却是一件艱難的工作了。歷史昭示吾人，視和平為一種政治藝術的勝利，實在是淺見，一八七一年的德國和平，是最好的例證。有人說可以束縛削弱德國，使他永遠沒有翻身的一天，這完全是錯誤的，法國自身的歷史，可資證明。當然，你可以剝奪德國的殖民地，把她的軍備裁減到僅夠維持治安的程度，使他成為第五等的海軍國，但結果是一樣的。如果她覺得受着一九一九年和約的不公平的待遇，她將設法報復。固然，我們的條件不妨嚴厲，不妨強硬無情，但同時也能够不失為公平，使對方覺得沒有伸訴的權利。可是，在凱旋時儘量表現着的不公平，驕矜尊大，將永遠不為對方所遺忘，或原諒。」——見邵宗漢譯八大偉人評述第一五三頁。」

路易喬治確是一位有先見之明的偉大政治家，可惜他的見解：是不會為法國代表克烈蒙梭所接受的，因為克烈蒙梭的目的，是在設法獲得法國的安全與利益，關於世界和平與人類幸福，是無暇顧及的，此種目的恰好與美國代表威爾遜



的主張爲世界建設永久和平的理想相衝突，同時，路易喬治爲着要獲得英國的利益，也無法堅持他的見解。結果，誠如盧特威喜(Emil Ludis)氏所說：「高坐於凡爾賽宮，審判着舊大陸之命運的三個最高仲裁者，是威爾遜，克烈蒙梭，路易喬治。威爾遜有着準確的思想，却缺乏實行的毅力；克烈蒙梭有着實行的毅力，却缺乏準確的思想；路易喬治既具豐富的毅力，也具明晰地公平認識一切的思想，却没有沈着堅定的個性，到了和會的最吃緊的關頭，他對於爲世界和平所依附的若干最重要的立場，是迷惑了。」因此，終於議定一割地，賠款，限制軍備，瓜分德國殖民地的凡爾賽條約，強迫德國簽訂，可是，事隔二十年，又復造成今日尙在表演中的超越往古的歷史大悲劇！

我們知道凡爾賽和約未締結以前，德國其所以肯於接收停戰媾和條件，固由於一九一八年六月以後，西線德軍的節節敗退，以及同年十一月的基爾海軍兵變，皇室統治一變而爲人民政權，事實上不得不趨於議和之一途！但由於感受美總統威爾遜在同年正月八日提出之「十四原則」及其後之各次宣言，希望他的主張能夠支配和平會議，要爲德國人民頭

於求和的一大原因。可是後來凡爾賽和約，完全違反十四原則，却爲他們始料所不及的。譬如說：威爾遜主張什麼外交公開，和約公開啦；什麼海上航行，絕對自由啦；什麼除去一切經濟障礙啦；什麼各國交換保障安全及縮減軍備啦；什麼廢分殖民地，應顧當地居民利益，不應存自私之念啦；什麼根據民族自決以解決國際疆界糾紛啦！什麼成立國際聯盟以謀世界永久和平啦；然而結果巴黎和會却變成協約國分贓會議，而凡爾賽和約亦好像成爲一分贓合同。蓋巴黎和會自始至終，參加國家雖有二十七國，實際上完全操縱於「五人會」及「十人會」兩小組織，一切以戰勝國的驕矜自大的態度，來片面的審判德國，終於使和善的「十四原則」變質而爲猙獰的凡爾賽和約，逼迫德國接受割地，賠款，限制軍備，委任統治殖民地等等苛刻條件。試問這重重的枷鎖，給予當時的德國人民是何等的殘酷呢？所以希特勒在我的舊門一書中，敘述他在停戰媾和時的心境，很憤慨的說：

「因此，一切都成空幻，所有我們的犧牲同困苦都成空的了，我們數年來的飢渴都成空的了，我們的犧牲與死的恐怖的時間都成空的了，二百萬人的生命也成空的了！」

## 中國青年黨建黨第十九週年紀念特刊

我們的國家呢？

但是——是否這是唯一的犧牲，那是我們應該忍受的？是否德國的已往比我們所想的還無價值？她對於她本身的歷史是否沒有責任？我們配處在我們已往的光榮之中嗎？我們拿什麼理由去得將來的子孫的公評？」——見董霖佩譯我的奮鬥第一一三頁

由於希特勒的極度憤懣，及德國人民在戰後所受的經濟困苦，逼使德國重新決定一個奮鬥的方向，有如希特勒所說：「我們所奮鬥的是爲：生存的保障，民族與國民的增加，牠的百姓的教養，血族的純潔，祖國的自由與獨立，如此我們的國民方能去完成宇宙的創造者所指定給他們的使命。」果然，經過二十年舉國一致的奮鬥，終於撕毀凡爾塞和約，而造成今日在歐洲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地位。「誰爲爲之？孰令致之？」那就不得不歸咎於協約國出席巴黎和會的衰衰諸公，缺乏偉大的遠識，缺乏實行的毅力，致令二十年後的今日，自食其果，方才體味到「十四原則」失敗後的慘痛教訓哩！

### (二) 大亞洋憲章的虛僞本質

二六

然而英美人到底是非常狡猾的，對於這一次世界大戰，又想抄襲威爾遜「十四原則」的老文章，由英首相邱吉爾與美總統羅斯福於去年八月舉行海上會議，聯合發表所謂大西洋憲章的八項原則。其內容爲（一）兩國并無擴大權力，攫取領土及其他野心，（二）兩國不願見有違反人民意旨的領土變更，（三）兩國尊重一切人民有選擇其政府形式的權利，并願見被武力剝奪之各國，恢復主權與自主政府，（四）兩國將致力使世界所有國家，不論大小，不論勝敗，皆可以平等條件享受其經濟繁榮所需要的貿易及原料，而對於現有之條約義務，則予以相當之尊重，（五）兩國願促成所有國家在經濟方面充分合作，目的在獲得一切改善之勞工標準，經濟進步及社會安甯，（六）兩國希望在納粹暴虐之最後破壞以後，能建立一種和平，而使各國在其疆陲之內可以安居，并將保證各地居民得以自由生活，不復再有恐懼及不足之虞，（七）上述和平，應使所有人類得自由橫越各海洋，不受阻礙，（八）兩國深信，世界所有國家，因現實及精神上的理由，必須放棄使用武力，因各國如繼續應用海陸空軍備威脅或侵略境外，則未來和平，即難維持，彼等又信在廣大及永久的一般安

全制度成立前，上項國家實有解除或裁減軍備的必要，彼等對於足以慰藉愛好人民之其他實際辦法，更將予以援助及鼓勵。

上列八項原則，吾人試加分析，即可知前三項是申述英美的政治立場和抱負，中三項是表明經濟方面的理想，第七項重申美國傳統政策的海洋自由主張，第八項反對武力的被使用，并着重於所謂侵略國家武裝的解除。雖然祇是概括的原則，但却為英美兩國對於戰後世界前途所抱的廣泛的理想與信念，畫出一個提綱挈領的輪廓，於此可見。同時就此八項原則而論，似乎比威爾遜十四原則，又進步了一點，因為威爾遜的主張，大部份都限於政治上的問題，關於更基本的經濟方面，則殊少顧及，以致國際聯盟的組織，亦因并未考慮到經濟基礎問題，而強使在經濟上相互衝突對立的國家，在政治上實行合作，終於失敗！此次羅邱宣言的八項原則在經濟方面特加致力，如第四項表示將使各國無論大小強弱抑或戰勝戰敗，皆可以平等條件享受其經濟繁榮所必需的貿易與原料，第五項表示將促使各國在經濟方面充分合作，第六項希望各國在戰勝納粹之後，能使各國在其疆界之內安居樂

太平洋大憲章與東亞新秩序

業。這些都是想補救威爾遜十四原則所遺漏了的，其目的無非在削弱軸心國的團結，誘致許多小協約國家的向心力，以取得戰爭的勝利而已。是否有履行八項原則的真誠，是否不致重蹈十四原則的覆轍，實屬疑問？所以日本田村博士認為「大西洋憲章雖然條例冠冕，而其實質則完全是表現的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欺騙性格。」此種論斷，是非常明確的。

### (三) 門戶開放政策的嚴重後果

如果說這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在歐洲是導因於二十年前威爾遜十四原則的失敗，那麼，在亞洲及太平洋方面的不幸戰爭，也可說是四十年前美國主張的門戶開放政策所促成的了！原來中日兩國在亞洲的地位，正有如歐洲的德法兩國，而其血統、文化、宗教、習俗等，更比德法關係來得親厚。不幸自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戰爭以後，中國感於一八九九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所提出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經列強同意接受後，認為從此可以倖免瓜分慘禍。今日所謂依存英美的觀念，實種根芽於此。殊不知此種門戶開放政策，實為一種變態的約束，依政治眼光言之，無論門戶開放

政策對中國有若何利益，其存在并非中國的光榮。況自一九〇〇年以後，列強在中國的榨取掠奪，較之勢力範圍時代，有加無減，而貿易投資的競爭，日益加深，致中國民族工業無由發展，而農村窮困，亦日甚一日。故門戶開放政策，自中國方面視之，在表面上似覺有利，實際上無異「飲鴆止渴」，惟國人習於苟安心理，久而不自覺耳！

可是門戶開放政策，自日本方面觀之，雖然在一九〇五年英日同盟條約及一九一一年英日續約中，一九〇五年日俄樸資茅斯和約中，甚至一九一二年華盛頓會議所締結的九國公約中，均有明白條文的規定。但因爲大陸政策與南進政策的處處與英美權益相衝突，轉覺門戶開放政策有單獨約束日本的嫌疑。其衷心的不愉快，是可以想見的。加以自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以來，中日雙方，感情破裂，英美更藉口破壞門戶開放政策，而遂其挑撥離間的陰謀。雙方終於各趨極端，愈走愈遠，因此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遂行爆發，迄今綿互五年，仍未休止，雙方所受戰禍損失，實難以統計。如果兩方在事前能夠有遠識有毅力的政治家，如像甲午戰爭時代伊藤博文李鴻章等一樣的真誠，與氣魄，

能夠把中日間許多的糾紛，導引到合理的解決途徑上去，我想這種黃種人自相殘殺而爲白種人所竊笑的戰爭，決不是絕對不可以避免的，縱然已經爆發，也是可以早日結束決不致拖延五年之久的。然而「誰爲爲之？孰令致之？」英美對遠東所主張的門戶開放策，固然不得不尸其咎，而我中日兩方也應共負戰事的責任，決不能推托任何一方面單獨負責的。

幸而中日戰爭進行了一年多，日本開始感覺如果長此久戰下去，是會中英美的鵲蚌相爭漁翁得利的詭計的，於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發表聲明，表示此次對華戰爭的目的，是在「冀求建設一可以確保東亞永久安定的新秩序」。而此新秩序的建設，是「以中日滿三國相提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樹立互助連環關係，爲其根幹，並期東亞國際正義的確立，共同防共的達成，新文化的創造，與經濟結合的實現。」但日本所望於中國者，「在分担此項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任務。倘國民政府放棄向來的指導政策，更換其人事的構成而舉更生之實，來參加建設東亞新秩序，則并不加以拒絕。」同時，日本近衛首相復發表談話：謂「中日滿三國，應以東亞新秩序之建設爲共同目的而結合，并應共舉善

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之實。」又謂；「日本毅然發動大軍的真意，如能貫徹，則所求於中國者，不在區區的領土，亦不在戰費的賠償，自可明瞭。」此種急謀結束中日事變的見解，正如同「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一樣，當時俾斯麥在事前是竭力主戰的，可是在事後竭力主和的又是他，以勢如破竹的普軍，一鼓而下維也納，迫奧國訂結城下之盟，并不是頂困難的事，然而俾斯麥的意見并不如此。他顧慮到法國會武力干涉，不如迅速收拾戰局從事媾和爲得計，所以他對德皇威廉陳述主和的意見說：

「奧地利不能當普魯士的藩屬，使奧地利和普魯士混合起來，是不成功的；奧地利若受重傷，會與法俄兩國聯兵，以求逞於普魯士；毀了奧地利就留下一個空隙，將爲新的革命開一條路。」

——見施慎之編著俾斯麥傳第七一頁。

後來德皇威廉果然接受俾斯麥的意見，而與奧國締結布魯克媾和條約。俾斯麥這種適可而止不爲己甚的遠識，直到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中，德奧共結同盟以對付協約國，果然得到「種瓜瓜得，種豆得豆」的良好收穫了。是以這一次日本急謀結束戰爭的偉大的遠識，正如俾斯麥處理普

太平洋大憲章與東亞新秩序

奧戰爭是同樣的令人敬佩的。而況當前的中國，正和一八六六年奧地利處境相同，她是決不能當日本的藩屬，同時，使日本與她混合起來，也是不成功的，她若受傷，會與英美連兵以求逞於日本的，目前重慶政府仍然迷惑於英美門戶開放政策，其故即在此，所以五年來的戰爭，雖未全毀了中國，而留下這麼一個空隙，我想是不無遺憾的。

#### (四) 建設東亞新秩序共同綱領何在

現在，我們姑且丟開重慶方面不談，中日兩國過去戰爭的錯誤，總算是糾正過來了，中日調整國交的基本條約，也於前年十一月三十日簽訂了，并明白宣言今後兩國所應當努力的，是「希望兩國互相尊重其本然之特質，於東亞建設以道義爲基礎的共同理想下，互爲善隣，緊密提攜，以確立東亞永久和平，并希望以此爲核心，而貢獻世界全體的和平。」從此兩國而立國理想與精神要素，以及現實政治目標，總算是在共同一致的途中，相互協力，不會再背道而馳的了！可是，事實上全面和平尙未實現，重慶依存英美的信念并未喪失，即就已締結的調整國交基本條約而論，尙有待於

實踐——至於如何促進緊密的提攜，如何確立東亞的永久和平，如何建設以道義為基礎的東亞新秩序，似乎到現在還祇限於空洞的理論，除彼此的一種精神默契而外，尙無一可以付諸實施的共同綱領。況且自去年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發生後，因日軍節節勝利，其情勢又復不同。換言之，即從來為英美勢力所壓迫的東亞各弱小民族，均已獲得解放，那麼，今後應當緊密提攜的，已不限於中日滿三國，應該擴大範圍而為亞洲全體民族國家的緊密提攜，至於如何建設東亞新秩序，如何確立東亞的永久和平，如何完成東亞共榮圈，甚至如何澈底排斥亞洲的英美勢力，這些都更應該由中日滿三國擴大而為亞洲全體民族國家所共同擔負的責任。所以在今日已經不是辯論理論的是非黑白，而是應該注意到怎樣能夠迅速完成上述的各種使命，無如在目前就是最缺乏一種可以匯合全亞洲各民族國家力量的共同協力的最高原則。關於這一點，孟祺先生在道義立國與大東亞憲章一文中說得最透徹，他說：

「原來到現在為止，中日兩國所存在的共同，還祇是根據各

自解釋的共同而已，舉個實例言，大亞細亞主義與東亞共榮圈，

無論其精神與目標，都可說是共同的，然究其解釋，不過是雙方體會彼此意見而所確認的共同，換言之，就是精神上的默契。至於中日兩國暨全體亞洲民族，對於亞洲新秩序的建設，其真正的共同的具體目的究竟何在，我們還缺少一種顯明而足以代表全體意識的確定文獻。」——見政治月刊第四卷第四五期合刊第二十二頁。

同時，新中國報本年九月二十三日社評我們要求太平洋憲章一文裏面說：

「誠然，關於大東亞戰爭的目的，在業已參加這一神聖戰爭的各國間，在精神上早已有了默契。然而除了各種廣泛性質的言論文獻以外，我們到現在為止，確還沒有見到過一種足以具體代表亞洲全體民族對於大東亞戰爭目的及其意義作顯明具體解釋的決定文獻。譬如說，在我們敵對的集團方面，業已有了一份圖以欺騙世人的「大西洋憲章」，反之，我們雖有意正詞嚴的戰爭目的，却還沒有一種足以宣示我們共同目的於世人之前的全亞民族的精神宣言，我們對於我們自己以及全世界，還沒有具體表示出我們戰爭的目的正確輪廓。這實在是一個很重要的遺憾！」

所以孟祺先生主張：

「關於大西洋憲章的欺騙性格，我們不必下如何詳細的批判

，即從英美帝國主義的立國基礎，與大西洋憲章文字所示的內容，即可斷言其為欺騙無疑。然而我們從理論上批判我們的敵人，自己單用理論的武器是不够的，因為這樣還是消極的。不錯，我們目前除了理論的工具外，業已在用最有力的武器在打擊我們的敵人。可是通過反英美的一切鬥爭，為顯示我們自己的終極目標起見，就非得建立起我們自己的積極主張不可。——見政治月刊第四卷第四五期合刊第二十三頁。

這種明確而又適合目前東亞實際情勢需要的意見，是值得中日兩方賢智之士所應該考慮的。

### (五) 我們需要一個太平洋大憲章

最近，日本名外交評論家田村博士，主張建立一個太平洋憲章，他的意見，認為此次大東亞戰爭的目的，雖經日本朝野名流一再闡發，無如太覺抽象，其充分意義，除日本人本身外，恐難為東亞及其他國家人民所瞭解，為使日本的真義充分貫達外界起見，有成立太平洋憲章的必要。同時，為避免大西洋憲章的雷同起見，他認為太平洋憲章的內容，應絕不和大西洋憲章那樣含有字面以外的內在動機。這一點確實非常重要，儘管大西洋憲章是缺乏真誠的，但我們太平洋

### 太平洋大憲章與東亞新秩序

憲章却非充分具備道義的精神不可，然則內容應當如何呢？

第一：太平洋憲章必須說明建設東亞新秩序的目的，有如田村博士主張，決不含有日本優越於亞洲其他民族的意義，決不企圖使亞洲其他民族從屬於日本，反之，是在使各個民族得自由發揮其本然的特質，以實現共存共榮的目的。必須日本如此堅決表示，然後英美等侵略勢力，才能了然大東亞解放戰爭的終極目標，不是在於單純的爭取太平洋的霸權，而是在於全亞洲被壓迫民族的解放。然後全亞洲被壓迫民族，才可明白大東亞戰爭真正意向，一切觀望疑慮以及從中挑撥離間的陰謀，均將失去存在的理由。

第二：太平洋憲章必須說明徹底肅清亞洲民族過去所有依賴英美思想的決意，有如田村博士主張，大東亞共榮圈的事務，必須由大東亞人民自由處理，毋須亞洲以外的民族來越俎代庖，並保證大東亞決不受外來的侵略，所有過去英美強佔東亞土地歧視東亞民族的種種惡勢力，必須一舉掃蕩而廓清之。

第三：太平洋憲章必須明白揭出今後東亞各民族應以共謀大亞洲主義的實現，為同一目標。東亞以內各民族國家，

各本自由獨立的立場，依最近中日滿共同宣言的精神，建設以道義為基礎的東亞新秩序，互相尊重其主權及領土，並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講求互助敦睦的手段，以達到東亞共存共榮，復興東亞的共同目的。

第四：太平洋憲章必須說明凡涉及大東亞經濟構造的場合，完全以促進東亞民族共存共榮為主旨，先求全亞洲各民族的國家經濟的平衡發展，與物資供求的均衡，然後方以其餘供給他洲的需求。過去英美等國只圖利用優越武力及廣大金融力量，來掠取我東亞土地的資源，及壓榨我東亞民族的經濟者，必須徹底加以清算。

第五：太平洋憲章必須說明在爭取大東亞戰爭勝利的過程中，隨時完成大東亞民族的解放，並保證決不在獲得最後勝利之後，始給予被壓迫民族獨立與自由。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大西洋憲章雖表示尊重一切人民有選擇其政府形式的權利，然英國對於印度則須要戰後始克給以獨立的自由，此種欺騙伎倆，惟有建設的大東亞戰爭中，予以事實的證明，則英美假仁假義的假面具，當可不攻自破。

第六：太平洋憲章必須指明今後東亞各民族的緊密提攜

，完全以東方道義精神為基礎，所有各民族國家間的國際條約，一律以太平洋憲章為準則，凡在大東亞戰爭前訂結之條約，足以妨害東亞民族團結，及與太平洋憲章相抵觸者，必須加以修改或廢除之。

第七：太平洋憲章的公佈形式，不妨由日本以大東亞戰爭的指導者地位，召集全亞洲民族會議，或東亞聯盟會議，而以亞洲全體民族國家的共同宣言出之，較諸大西洋憲章僅由邱吉爾羅斯福二人偕促在威爾斯親王號艦上的產物，其意義當更莊嚴偉大了。

總之，我們之所以提出太平洋憲章的要求，就是要鑒於以往威爾遜十四原則的慘痛教訓，門戶開放政策的嚴重後果，以及最近大西洋憲章的虛偽欺騙，同時，在大東亞戰爭發生後，我們東亞各民族間亦正缺乏一個共同從事建設東亞新秩序的精神綱領，因此，我們應該根據東亞各國道義立國的精神，確立完成東亞共榮圈的具體輪廓，應該把過去依存英美聽信挑撥離開的種種觀念，加以肅清，而足以造成東亞各民族間自相殘殺的許多因素，我們更應該從根本上加以清除。上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凡爾塞和約，反而為促成這一



次世界大戰的遠因，單就這一點還不夠我們借鏡嗎？所以太平洋憲章的要求，就是爲了要彌補這個缺憾的。雖然大東亞戰爭的最後勝利，爲期不遠，但爲加強大東亞全體民族對於這劃時代的偉大鬥爭的信念起見，我們必得以全亞洲民族共

同宣言的形式，列舉綱領，促進其對大東亞戰爭的認識和實行，然後再以東亞民族全體的力量，來完成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使命。我想太平洋憲章，不僅我們中日兩國人民所希望，所需要的，凡是全亞洲民族都無有不希望不需要的吧？

### 登北固山遠眺

木公

遙對瓜洲古渡頭。塔尖隱隱是揚州。  
江波浩渺漁歌起。山色蒼茫碧樹秋。  
揚帝風流餘綺夢。吳王霸業等浮漚。  
紛紛人世何嘗定。駭浪驚濤一葉舟。

## 大亞洲主義與中國前途

關作璜

### (一) 大亞洲主義思想的淵源

大亞洲主義這名詞，在日本最先提出的，雖然是大正五年即民國五年小寺謙吉氏的著書，而其思想的淵源，則實遠在明治初期。當西歷一八四二年，我國因鴉片戰爭失敗，被英人逼我簽訂南京條約的時候，日本朝野人士，已有很多人主張援清抵抗的了。到了一八九〇年日人梶井藤吉氏所著大東合邦論一書出版，更公然主張中日兩國合成一邦，合力向南洋方面發展，可惜後來日本因朝鮮問題，認為清朝庸懦無能，非自力不足以驅除歐美勢力侵入朝鮮的危險，斷然出兵弄成甲午中日之戰。清廷急不暇擇，為爭回遼東半島，又竟出面聯俄，因此大亞洲主義的萌芽，便被摧毀了。不想中俄密約成立不到一年，俄人又以索取報酬為名，強佔大連旅順，謀將勢力侵入遼東及朝鮮兩半島，引起日俄之戰，結果日勝俄敗，於是東亞人應該聯合起來抵抗歐人勢力東侵的思想

，便又在中日兩國人士腦海中復活起來。不過那時候日本國力還未十分充實，日英仍須繼續同盟，等到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在巴黎和會當中，仍得不到滿足的地位，益感到歐美人對東方民族的發展，始終脫不了猜忌的態度。而同時美國在第一次大戰中，威爾遜總統提出和平十四原則，結束了四年戰禍，組成了他認為可永遠消除戰禍的國際政府，即國際聯盟，而結果美國自己反不加入，更暴露了美國的自私，和對國際和平努力的不忠實，因此亞洲國家應聯合一致和白種人鬥爭的思想，更健全起來。同時日本朝野中，鑑於美國一面主張美洲門羅主義，拒絕他洲人過問美洲，而他一面却又堅持遠東門戶開放，極力向東方侵入，因而主張遠東國家也應該提倡遠東門羅主義以為對抗。由這兩種思想的合致，便構成大亞洲主義的具體主張。小寺謙吉氏的著書，便是在這時期出版的。到了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先生在神戶發表的演說，更表示中國人對大亞洲主義的具體主張。

由此大亞洲主義的理想，便完全確立，而深入中日兩國人士腦筋了。

此外爲大亞洲主義思想的源泉的，還有美國人所提倡的全美主義。全美主義的理想，是想聯合全美洲的國家，組織一類似聯邦機構的全美會議，來處理美洲內部國家或民族間的糾紛；一面更利用全美洲國家一致的協力，抵抗任何方面對美洲任何一點的侵略。這種主張的內容，雖不見得和大亞洲主義的內容，完全相同，而兩者思想的關聯，是不能否認的。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聯盟組織告成，美國國會否決了加入國際聯盟案時候，在美國某雜誌中，曾刊載某學者一篇論文，批評國際聯盟的前途，斷定牠終歸失敗的。其理由是國際聯盟自身無力量，其力量是靠幾個大國爲後援，而這幾個大國互相間的利害，便不一致。遇到幾個大國利害互相衝突的問題，便無法解決。況且聯盟中那些國家有些是國土和幾個大國相隔很遠的，有事時要那些大國真能越重洋，拔刀相助，是不可能的。所以主張變更國際聯盟的組織，改爲每洲設一國際聯盟，由該洲中一大國或三數大國主持，召集全洲的國家代表，用公平而有力的方法，處理該洲內國

家間政治軍事或經濟的糾紛。在這些各洲國際聯盟之上，更設一個由各洲國聯派出的代表組織的技術聯盟，處理全世界國家間的共同事務，如郵政，匯率，貨幣的交通與統一等問題，衛生慈善的互助問題，國際版權的共同保護問題，旅行交通的相互方便問題。凡是有關全世界的技術問題，由這世界聯盟主理，有關各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問題，由各洲聯盟主理，這樣纔能達到真正的永久和平。這論文當時頗惹起世界人士注意，全美會議的召集，聯絡拉丁美洲各國，成爲美政府的國策，也受這思潮所影響的。美洲人士既有此見解，亞洲有識之士當然也有同感。同時歐洲方面，英德法意間的糾紛，雖也在國際聯盟提出，可是也常常邀約幾個歐洲國家，另開會議解決。這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前二三年間，英前首相張伯倫曾一再主張訂立英德法意四強協定，解決歐洲問題，雖然被德國拒絕了，終於發生戰爭，然德意的軸心條約，由開戰初期至今，不斷拉攏歐洲國家加入，顯然想造成以德意爲軸心的歐洲國家同盟，解決戰後歐洲各國間的一切衝突這個辦法，又和全美會議及大亞洲主義的理想，有什麼分別。可見大亞洲主義的思想，實淵源甚遠，不特非少數人的

理想，而且是事勢環境所形成，將來戰後的世界和一切問題的解決，恐必由於此。現世各洲，除非洲，澳洲外，歐洲，美洲，亞洲，皆可各自召集國際會議，解決政治糾紛，然後再由三洲的國際會議，派出代表會議，解決洲與洲間關係的事件。我們亞洲的國家，如果不及早團結，聯成一氣，共謀本洲全體的福利，或甚至同室操戈，自相殘殺，結果恐難免自受其禍，這是我們亞洲民族所當共同警惕的。

由上面所說看來，可證明大亞洲主義思想的淵源，實在很遠，而括其大要，實有反抗歐人勢力東漸的對抗思想，抵禦白人排斥有色人種的自衛思想，期求各洲各自和平共處的共存思想，這三種思想爲其主要淵源。

## (二) 大亞洲主義的意義及其範圍

從來談大亞洲主義的人很多，然替她下一明確定義的很少，照日人小寺謙吉著書中所講，認爲大亞細亞主義者，卽爲合全亞細亞勢力對抗歐洲人勢力起見，先由黃色人種中之獨立民族，相互協力，依漸進的建設的方法充實各自生存力，藉其努力以實現新文明，貢獻於人類的進化爲目的者也，

故依此主義，同一人種間之爭鬥，當永遠防止，且依於人種與人種間之均勢，防遏人種間所起之戰爭，故不失爲平和大福音云云；照孫中山先生的演講，則所謂大亞細亞主義者，當爲以東方王道文化精神爲基礎，聯合亞洲各部的民族，以和平自衛爲手段，謀亞洲全部被壓迫各民族的解放的政治原則。由上開兩氏說明來看，小寺氏特別注重聯合全亞有色人種與歐洲白色人種抗，造成人種均勢，以消弭人種間的鬥爭。孫先生特別注重大亞洲主義當以東方文化王道精神的仁義道德爲基礎，對內謀全亞洲民族的團結，對外謀抵抗歐洲武力文化霸道精神的侵凌，使世界文化，日趨於光明。由此兩氏的見解，再加以近時事勢的內容，我以爲大亞洲主義的意義，應當再爲商定。鄙人不揣固陋，茲爲擬定一定義如左：

大亞洲主義者，全亞洲國家及民族，爲排除侵略消弭人種戰爭促進世界永久和平起見，以東方王道文化精神爲基礎，聯合全洲國家及民族的協力，實行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上的互助，以期達到全洲國家的政治獨立民族解放經濟共存文化提高的目的底政治原則也。

由上述的意義看，足見大亞洲主義，應當以全亞洲爲適用的範圍，以排除侵略，消弭人種戰爭，促進世界永久和平爲動機；以東方王道文化精神爲基礎；以聯合全洲國家民族的協力，實行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互助爲手段；以期求全洲國家的政治獨立民族解放經濟共存文化提高爲目的的一種政治上原則也。茲再分別加以說明：

(一)大亞洲主義適用的範圍：大亞洲主義應當以亞細亞洲全部地理上區域爲適用的範圍，那是無可疑的。有些人以爲日本現時當局的政策，在建設東亞新秩序，確立東亞共榮圈，所謂東亞共榮圈的範圍，是指以日本爲中心，包括滿洲及中國，又沿中國海伸至西南太平洋沿岸及海洋上諸海島，但這只是日本當局就目前情勢可能上劃定的範圍，在便宜上可稱爲大亞洲主義實現的初步，然這決不是大亞洲主義理想上的止境，自不待言。况政策爲政府一時施政的方針，而主義爲指示比較恆久的政治理想上的原則，兩者當然不能盡同，而有範圍大小的差別的。所以我以爲大亞細亞主義適用的範圍，當以北濱北極海，東濱太平洋，南濱印度洋，西界烏拉爾山脈，烏

### 大亞洲主義與中國前途

拉爾河，裏海，高加索山脈，黑海，地中海的亞細亞洲全部領域爲範圍，在這領域範圍中，土地面積總計四千四百三十餘萬方公里，佔地球陸地面積二分之一，人口概算爲九萬萬至十一萬萬，已建成的國家，計十三國，已獨立的八國，除我中華民國外，爲日本，泰國，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尼泊爾，阿拉伯；在獨立運動中的，有印度，緬甸，菲律賓，伊拉克，敘利亞等國，而其餘各受統制於英美等歐洲人勢力下的各地方各民族，都正期待着大亞洲主義的實現，而改善他們的地位，那是不待言的。

(二)大亞洲主義發生的動機：大亞洲主義以排除歐美勢力侵略，消弭人種戰爭，促進世界永久和平爲動機，已如前述。我此刻再引小寺謙吉氏所著大亞細亞主義論一書的序文中幾句話，更可證明，他說：『異哉！吾聞白種人之叫囂黃禍，而未聞黃種人之高唱白禍也，彼併印度，滅安南，欲席捲亞洲者，非白人耶？黃禍者夢囈耳！西鄰舊國（指我國）今且爲俎上肉矣，假使地圖上有除去中國一名之一日，則孤立於白人之間者，非只日本，且其餘

皆受制於白人矣，言念及此，甯不寒心！昔晉假道於虜以伐魏，魏亡而虜亦隨之，假令日人與白人伍，而亡中國，其不爲虜之續者幾希！今者民族統一，乃世界之趨勢，不可遏者，如全美主義，大不列顛主義，英語民族統一主義，大斯拉夫主義，大日耳曼主義，大拉丁主義，皆其著者。蓋族類不同，情感自異，而情感之厚薄，恆視其關係之親疏以爲等差。然則大蒙古主義，勢不得不倡矣。所謂大蒙古主義無他，卽黃色人種聯合論是。蓋中日兩國誠能相提挈相親睦，因以啓其富源，導其民衆，於是中國之復興可期，遠東和平可得，各國且並受其賜焉。今日調和東西文明融化黃白思想者，誠中日兩國共有事也。」此文說明大亞洲主義的動機，至爲明白。

(三)大亞洲主義實行的基礎：歐人勢力的東侵，是以他們近百年來的科學進步，物質文明所構成的功利思想爲基礎。由此基礎所產生的文化，是武力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爲我們東方文化所不取的。所以我們亞洲人起來抵抗，是企圖自衛自存，而絕不是要侵略到歐美去，所以

大亞洲主義的實行，應當以我們東方固有的王道文化爲基礎。這文化的本質，照孫中山先生所說，就是仁義道德，想用仁義道德去感化人，而不是用武力去壓迫人，不是要人畏威，而是要人懷德。在孫先生在生的十二年前，已看到歐美學者，傾佩東方文化，而斷言東方文化將必復興。此時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禍，更可信將來的世界文化，必有傾向於東方王道的一日。而我們東方國家既長久生存於此種文化之下，今後亦必當遵從此等文化，始能得到亞洲內部許多複雜的國家民族的團結，而以其深厚的文化力量，去感化他洲人。同時對於近世的科學工業武備，當然也需振興，不過不是用來侵犯或壓迫他人，而是用來自衛的。故唯其尊重科學更需要東方王道文化爲基礎，否則將踏上歐洲功利文化的覆轍了。

(四)大亞洲主義實現的手段：是以聯合全洲民族各國家，實行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互助爲手段，這是當然的。大亞洲主義進行當中，當然須要一個或數個武力比較強盛文化比較進步的國家來領導，可是這些領導的國家，必須屏除壓迫強制的手段，放棄優越感和自私心，一本諸王道

文化仁義道德的精神，扶持洲內國家各民族，使其各能得到政治上的獨立，經濟上的安定，文化生活的提高。而在這互助圈中，國與國之間彼此互尊政治上的獨立，行政上主權完整，軍事防衛上的相互扶持，經濟上的互惠互足，如金融的互助，資源的共濟，市場的共通等，必須如此，纔能達到真正團結，實現全洲九萬萬民衆，化成一體的理想，否則很容易引起同洲內國家民族間的衝突，而演出自相殘殺引狼入室的悲劇，那是很可痛心的。誠如小寺先生所言，『使日本果得因中國之惠而獲其富財，中國賴日本之力克致其治，則兩利之效，斯可舉矣。』這話實爲解決中日問題的最要點，同時亦爲實行大亞洲主義的第一步，因爲不止日本對中國當如此，即對其他亞洲諸國，無論大小，皆當如此，而全洲各國與各國之間，皆當互相如此，纔能達成大亞洲主義的目的。

(五)大亞洲主義的目的：大亞洲主義以達到全洲國家的政治獨立，經濟共存，文化提高爲目的。蓋大亞洲主義之目的，只想鞏固全亞洲民族的福利，使其外不受到他洲政治上經濟上乃至文化上的侵略，內不致引起政治的經濟

### 大亞洲主義與中國前途

的思想的鬥爭，而使全洲九萬萬民衆自由在地生活。在政治安定生活優裕經濟自給自足的高度文化環境之下，以感化他洲人，使其模仿我們，同化我們，而自己改善其生活，並不是想聯合全洲的力量，去征服他人，壓迫他國的。所以大亞洲主義目的，是自衛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和平的，而不是戰爭的；是均勢的，而不是壓倒的；是感化的，而不是壓迫的；是王道的，而不是霸道的；是文治的，而不是武功的；依上所講，可見大亞洲主義，動機固極純正，範圍固極明確，思想基礎更極光明，手段更極溫和，目的尤爲正大，絕非偏狹的種族偏見，及霸道的帝國主義可比。其目的和東亞聯盟所倡導的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四大綱領，大致相同，不過適用範圍的大小，有點不同罷了。

### (三) 大亞洲主義與世界主義及國家主義

大亞洲主義與世界主義和國家主義是相排斥的呢？還是相融和的呢？關於是一點，須先略說世界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內容：所謂世界主義，是十八世紀，歐洲方面因工業革命的

成功和統一建國的思想發達，而自然發展的思潮。當時歐洲有幾個大國，如英吉利，德意志，意大利，法蘭西都已完成統一，建設成一個龐大國家，而同時因蒸汽機的發明，促成了工業革命，使各國間的交通，貿易乃至國內的經濟情形，都改了舊觀，顯出空前的進步。於是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或文化上都期然而然的懷抱着一種超越國家的思想，即在政治上以爲不只當謀一國的統一，更當謀世界的統一；經濟上不只以一國爲活動區域，更當以全世界爲活動區域；其他如文化事業及宗教慈善等事業，無一不以世界爲對象，以全世界爲範圍。而且在最初的時期，歐洲人以爲世界上只有歐洲，稱全歐洲爲世界，其後非洲的大陸，被歐洲人爭着去開發，美洲大陸，澳洲大陸，也先後被歐洲人開發，於是歐洲人更自命爲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具有統制全世界五大洲的能力。到了二十世紀，歐洲人的世界政策，更充分發展，各國無不極力擴大陸海軍備向國外爭取殖民地，爭取資源，爭取海洋上的控制權，爭取貿易市場，爭取文化領導權。我們亞洲此時期便成爲歐洲人世界政策競爭底目的物，其後北美合衆國國勢日盛，也高舉門戶開放旗幟，來參加對遠東的競爭。

不過各國的世界主義，發展的進程到了相當時期，必然的自相衝突，那是無可避免的結果。譬如德國威廉二世，由統一歐洲然後控制世界的武力政策，進行到了相當時期便遭遇到英法俄的反對；英國藉控制海洋以控制世界資源的政策，進行到了相當階段也遇着德法俄乃至日本諸國和他抗衡；美國藉金元政策貿易政策，想操縱全世界的經濟命脈，結果也招致德義日諸國的反感；蘇聯想藉階級鬥爭思想，煽動全世界的無產革命，以便其掌握世界革命的最高指導權，結果也引起了德義日的反共同盟；到了目前時代，以武力征服爲手段的世界政策，固已證明無論何國皆不可行；即以政治控制金融操縱經濟依存爲手段的世界政策，也經各國一再試驗，而證明爲無成功希望；甚至英美人士認爲最巧妙溫和的政治妥協經濟互助文化誘導爲手段的世界政策，也因在過去二十年間試驗的失敗，而證明無效。到了目前，無論任何方面——高談世界主義，似乎都不能不被認爲空論高調了，比較可能的，還是在地理較接近，種族關係較密切，利害環境共同，文化歷史較融洽的各洲上，各自尋求國際妥協經濟共存的途徑，爲易於實現，因此便有全美主義，大亞洲主義，軸心條約的發生。



可見大亞洲主義是代世界主義而興起的，不過大亞洲主義與世界主義絕不是相反而不能並行的，大亞洲主義者也不是全不關心到全世界的問題的，不過大亞洲主義主張先鞏固各洲的平和爲基礎，以貢獻於全世界的平和，應先求各洲內部的經濟自給自足，共存共榮，然後進而謀與各洲爲物資貿易等交換，以進求全世界的共存共榮，在文化上，應先謀本洲內文化程度的提高，然後進而感化全世界，使盡棄其武力霸道主義功利物慾思想，而皈依於我東方和平王道仁義道德的文化，這都是相互的關聯，而不是絕對相反，不過努力的次序有後先不同，所用的手段有王道與霸道的區別而已，而其最終目標，在感化全世界，造福全人類，固無二致的。

至於大亞洲主義與國家主義，則更絕無不相容的地方。原來國家主義這名詞，是發生於歐洲各民族統一建國思想最流行的時期，如意大利的統一，德意志的建國，當時皆以國家主義爲號召，其後由於統一建國成功，國力龐大，漸思向外發展，而有爭奪殖民地吞併弱小的行爲，而形成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這本來是國家主義的變質，而不是國家主義的本相。其實國家主義的本相，至極簡單，不過對內謀政治機構

#### 大亞洲主義與中國前途

的統一，對外求國家與國家間的平等與獨立而已。唯其要求統一，所以對侵略主義者利用種族宗教階級等偏見分化國家統治機構的陰謀，及其以武力經濟等手段妨害國家的平等與獨立等行動，均必須反對。反之，國家主義者的自身，當然不應該用侵略主義的手段，以分化他人之國家，摧毀他國之獨立，那是不消說的。故國家主義的思想，對於世界主義思想，不盡相背，也不盡相容：如資本主義的世界觀，以爲經濟無國界的，對經濟事業的發展，當以全世界爲對象，而不當以國界爲前提，那是國家主義者所否認的；又如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以爲世界上只應有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之分，而不應有國家的分野，故工人無祖國，只有蘇維埃是祖國，這等思想，更是國家主義者所絕對反對的。國家主義者的見解，認爲無論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一切措施的計劃，都必當先以自己國家的利害爲前提，而絕不承認有超於國家的利害的。故超國家利益的事，絕對不能容認。然有利於國家同時有利於他國或世界的事，却爲他們所樂爲。故就不肯犧牲自己國家利益以利他國和世界一點觀察，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似不相容，然從其先謀有利於國家，然後漸進而謀有利於他

國以及於世界一點觀察，則兩者又絕非相反。由此觀察，可見國家主義與大亞洲主義也絕不至背道而馳。因大亞洲主義，無非是世界主義範圍的縮小而已，不特不相反，實可以相成。蓋大亞洲主義的目的，是想以全洲國家的協力，扶助洲內各國家，使其政治上得到真正的獨立，各民族得到真正的解放，經濟得到共存共榮，文化上得到平衡提高，這正是真正信仰國家主義者崇高理想。不只對於自己國家要做成真正的自由與獨立，即對於他人的國家也希望他能夠得到真正的自由與獨立；而絕不想侵犯他國的自由與獨立的，關於這一點，足見大亞洲主義，不特不至與國家主義相反，而且是相成的。日本東亞聯盟論者宮崎正義氏曾說過：「東亞聯盟因以解放東亞民族爲目標，故應完全保證解放後的政治獨立權，日本及其盟邦，不論是否努力於其他東洋諸民族之解放運動而加入聯盟，或作爲完全單獨之獨立國存在，應任其自由選擇，又加入後亦承認其脫退之權利，因日本與各盟邦之間有其政治的及經濟的相互依存關係之紐帶，故東亞聯盟爲站在各東亞各國自主立場上之盟約，并非強制之體制，所以不應加獨立國家之最後意志以任何束縛。」（宮崎著東亞聯盟

論四五—四六頁）東亞聯盟中國總會會章前言，亦明白揭出「本會同人爲謀實現孫先生之大亞洲主義，期與鄰邦各本於自由獨立之立場，依最近共同宣言之精神，建設以道義爲基礎之新秩序，互相尊重其主權及領土，并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於請求互助敦睦之手段，以達到共存共榮，復興東亞共同目的。」我以前曾說過，東亞聯盟爲大亞洲主義實行的初步，只是範圍的大小不同，而意義實一致的，觀於中日東亞聯盟論者，均一再表明保證東亞各盟邦的政治獨立，在這一點上，相信全亞洲各邦內的國家主義信仰者的見解，絕對相同，故大亞洲主義的必能得到亞洲各國的國家主義者同情與贊助，是毫無疑問的。

#### （四）大亞洲主義與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

大亞洲主義和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關係如何？研究這問題，當先明瞭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性質。所謂資本主義者，是發生於歐洲工業革命之後，歐洲各國，因工業發達的結果，造成金融資本的漲大，和經濟市場的擴充，前者適成武力擴張的源泉，後者更促起資源及市場的需要，於是憑藉

武力及金融力量以尋求殖民地及貿易市場於海外的帝國主義行動，便日漸擴張，由一國以及他國，由一洲以及於他洲，由陸地以及於海洋，由軍事侵略以及於經濟侵略，更進而爲文化的侵略，其充分發展的結果，更演成所謂世界政策。在軍事上政治上，不但欲併吞他國的土地，滅去其他民族的國家，而且想統制全世界；在經濟上不止欲發展自國的工商業，而且欲掌握他國乃至全世界的資源，吸啜他人的膏血爲自己發展的肥料，這是爲資本主義必然的手段。這種手段，當然和大亞洲主義的存在，絕對不能相容，蓋資本主義和大亞洲主義有幾點根本衝突的地方，卽：

(一)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無止境的，故爲世界的，而大亞洲主義的發展，是局部的，限於一洲的。

(二)資本主義是只求自利的，而大亞洲主義是互利的，卽先求一洲內各國家經濟的自給自足共存共榮，然後謀有利於世界，而資本主義國家只圖利用優越武力及廣大金融力量來掠取他國乃至全世界的資源，以供自己的滿足和發展的。

(三)資本主義是獨佔的，而大亞洲主義是均衡的、蓋資本主

大亞洲主義與中國前途

義以獨佔爲目的，而大亞洲主義是期求洲內各國家經濟的平衡發展和物資供求的均衡，然後以其餘供給他洲的。

(四)資本主義是獨存的，而大亞洲主義是共存的，蓋資本主義只圖自身的獨存，而大亞洲主義又是企圖國與國間和洲與洲間的共同生存的。

(五)資本主義是以資本支配政治的，而大亞洲主義是以政治統制經濟的，蓋資本主義無論對其國內及國外，均一貫的利用金融資本的力量以支配政治，操縱政治，使國內的政治和國際的政治都直接間接有利於資本家爲目的，而大亞洲主義則以各國共存民衆福利爲前提，無論在國內國外一貫的以政治的力量來統制經濟以求平衡發展及平均分配的，所以在經濟方面講，資本主義是自由的卽放任經濟事業使其自由發展的，而大亞洲主義却是統制的。

由上開各點觀察，足見大亞洲主義和資本主義，無論在何方面均絕對不能相容。至於共產主義則爲資本主義過度發展後所激成的反響，在反對資本主義一點，共產主義和大亞

洲主義，也許動機上有少許相同，然而在性質上，到底完全相反。誠以共產主義，在性質上和大亞洲主義，有下列幾點絕不相容的地方：

(一) 共產主義是世界的，而大亞洲主義是國家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否認世界上有國家地域，人種上的區別，而只承認有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區別，故企圖結合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打倒全世界的資本家，組織全世界的蘇維埃政府。而大亞洲主義，却是在政治上，以扶持大亞洲各國家，使其得到政治上的獨立，扶持各民族，使其得到真正的解放爲目的，在經濟上，是以計劃的統制的手段，使各國能得到平衡的滿足，各階層能享受合理的支配爲目的，固然不助長資本家壓迫勞動者，也不是糾合勞動者打倒資本家，而是依於計劃經濟的合理統制，而消弭勞資糾紛的。

(二) 共產主義是以唯物史觀功利思想爲基礎，而大亞洲主義則是以唯心史觀王道思想爲基礎。共產主義的思想，是由唯物史觀出發，以爲一切人類行動，都是受物質支配的，故只要改善物質支配的方法，便可支配全人類，因

此蔑視精神上的生活，而變成一只以追求物質爲目的的功利主義者，而大亞洲主義，是以東方仁愛精神爲基礎，由於全亞洲民族互相親愛的思想出發，以仁義道德的王道精神，謀團結互助的方法，兩者當然絕對不能相容。

(三) 共產主義以鬥爭爲手段，大亞洲主義，以和平協力互助爲手段。共產主義所用的手段是直接行動和鬥爭，故其手段，是殘酷的，且其鬥爭的對象，不是國與國間，而是階級之間思想之間，因此每易促起任何一國內部的流血，結果反予帝國主義者以吞併的機會。大亞洲主義是以全亞洲國家互助民族的協力爲手段，故其手段，是溫和的，公平的，不止對國內如此，對洲內如此，即其所認爲對象的歐美帝國主義者，也只是驅除其侵略勢力於本洲以外爲目的，而不包含有報復或反侵略的成分的。如上所述，大亞洲主義和共產主義，更根本不能相容，不過這裏要附帶說明，即大亞洲主義，雖和共產主義不能相容，而與社會主義的思想，却不是完全相反的。蓋社會主義的理想，是改革社會的制度，推翻財產的私有，打破生活的

不平，在這一點上大亞洲主義，毋寧說是有相當的同感，不過改革的方法和步驟，改造的方案和目的，各有不同罷了。共產主義在社會主義中，僅爲一派，除此之外，尚有集產主義，均產主義，又有無政府主義及國家社會主義等。大亞洲主義，與共產主義，雖根本不相容，然與其他社會主義，固非完全不相容也。

如上所述，足見大亞洲主義和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均絕不相容，無論爲來自歐美方面以資本主義爲基礎的白色帝國主義，抑爲來自蘇聯以共產主義，爲標榜的赤色帝國主義，均爲大亞洲主義所堅決反對，已很明瞭了。

### (五) 大亞洲主義的領導權及中日前途

大亞洲主義的推行，是不是需要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國家來領導？如果需要領導的話，又以那些國家爲適宜？這都是研究大亞洲主義者應當注意的問題。大亞洲主義，既爲聯合全亞洲民族及國家來共謀全洲的福利，則其必須有國家爲其領導，自無可疑。譬如全美主義的，有北美合衆國爲其領導，歐洲軸心條約的，以德意兩國爲領導，是其明證。而同時凡擔

負這領導責任的，必須是這主義範圍中，軍備比較充實，文化比較深厚的國家，纔負得起這重大的責任，又不待言。以今日獨立於亞洲的國家論，講武力的強盛，首推日本，講文化歷史的深厚，首推中國，那是無可否認的，所以能負起領導大亞洲主義運動責任的，此時只有日本和中國兩個國家，而且必須是日本和中國共同協力，纔領導得起來，那也是顯然的。當然，在中國目前情勢之下，如果離開了日本，單獨靠文化的力量，自然無從抵抗歐美白色帝國主義的軍事經濟侵略，固不待言。然而雖以日本目前這樣強大的武力，如果獨去擔負大亞洲主義領導的任務，姑且撇開不能達到這主義的完整目的這一點於不談，即使終局也許能達到，然而所費的力量，所犧牲的人力物力與時間，恐怕不容易計算，而因負擔這等重大犧牲的損失，必然減少了完成這大亞洲主義使命的力量，其影響尤爲嚴重，而且欲求大亞洲主義的推行，固然需要武力，但是武力所能負擔的，只是消極的任務，即排除歐美勢力的壓迫，制止局部的反動等任務，然如想完全達成大亞洲主義的實施，除消極的任務外，還需要積極的工作，這積極的工作，便是如何可使全亞洲的國家及民族，都

心悅誠服自動自發的衷心信仰大亞洲主義，熱烈擁護來領導國家的領導權，關於這一點，即是必須設法把握全亞洲的人心，使其和領導的國家混成一體，不復有絲毫芥蒂懷疑憂慮的觀感存在，致受歐美國家或其他企圖破壞亞洲主義者以可乘的間隙，然後大亞洲主義的建設任務，纔能一步一步的達到。明白此點，即當知道中國地位的重要，誠以中國爲亞洲歷史上較長遠，民族比較龐大（全亞洲民族數量，約計有九萬萬，而中國人却佔了四萬萬，）資源比較豐富的国家，環中國而生存的民族，在過去歷史上，受中國文化的薰陶，和中國民族發生過血緣上文化上經濟上密切關係的，不在少數，而日本又爲最接近中國而新興的国家，全亞洲各民族，對於日本負擔大亞洲主義的領導權，能否衷心信仰，真誠服從，我相信大家都睜開眼睛看着日本如何處理中國問題，如何對待中國民族以爲斷。所以中國這個國家，目前國力雖然很薄弱，可是文化的感化力却很大，民族的團結力依然很強，而蘊藏的資源也很富厚，人力資源的蕃殖更其偉大，這樣的一個弱大民族，這樣的一個老大國家，是不容易被消滅的，而且與其竭盡一國的力量把她毀滅，致耗損自身的元氣，予

歐美以可乘之機，何如把她保存，而利用其深厚的文化感化力，廣大的人物資源，以爲號召全亞洲各民族傾心歸附的模範，以達成領導大亞洲主義的任務呢？我相信日本忠誠謀國的人，一定知道比較何爲有利的，由此可見大亞洲主義，如果欲真誠推行，必須首先實現中日兩國的平等合作，然後以中日兩國協力，共同負起這領導的任務，纔能使全亞洲的民族心悅誠服，自發自動地奔集於這主義的旗下，首先見到此理由的，不是我們中國人，而是日本人，這裏特舉出三位日本人的言論，以爲我說的證明。

第一位是三任日本首相一手訂成日英同盟打倒俄國的桂太郎公爵，他於大正二年，孫先生遊日的時候，和孫先生作幾次的密談，其談話的大意，據戴季陶氏親聞的紀錄上記載：「（前略）此後日本唯一之生路，東方民族唯一之路，唯有極力遮斷英俄的聯絡，而且盡力聯德，以日德同盟，繼日英同盟之後以對英作戰，繼對俄作戰之後，必須打倒英國的霸權，而後東方乃得安枕，而後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問題，非獨日本，從韃靼海峽到太平洋全部東方民族的運命，皆以此計劃成敗而決。現今世界，只有三個問題，土耳其、

印度、中國是也。此三國皆在英國武力與經濟壓迫之下，然而只須解決其武力壓迫，則經濟的壓迫不成問題；（中略）今後惟望我二人互相信託，以達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奧的同盟，以解決印度問題。印度問題一解決，則全世界有色人種皆得蘇生，日本得此成功，決不愁無移民貿易之地，決不作侵略中國的拙策，對大陸絕對的保障，而以全力發展於美澳，纔是日本民族生存發展的正路，大陸發展，是中國的責任。」其說對三十餘年後今日的情形，瞭如指掌，桂公爲大亞洲主義的先覺，是當之無愧的。

第二位是日本海軍老前輩秋山真之中將，也曾說過：「日本人的命運在美洲澳洲，但是要達到此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國三個大民族，都完成了獨立；打倒英美的霸權，使海上的自由，完全實現之後，諸大陸的移住自由，纔能實現。」其說和桂公的見解完全相同。

第三位是大亞洲主義的倡導者小寺謙吉先生，也於其著書中，曾說過：「日本所缺者爲物的要素，中國所缺者爲武的要素，日本無中國，經濟不可獨立，中國無日本，政治不可以自存。誠欲有以備白哲人種，則此兩黃色人種之相扶相

持，長短相補，需給相倚，實勢之使然。兩國而欲全其獨立於國際之競爭，全其生存於人種之競爭，決不可無此，吾人之大亞洲主義蓋指此也。」（見氏著之大亞細亞主義論）此外氏於其著書中，更指出中日必須合作的十大理由，茲節錄如下：

（一）中國恃日本受武力的擁護，日本依中國受經濟的利益，中國爲農業國，日本爲工業國，兩國關係日見親密，則雙方所受恩惠，程度亦日漸增加，將來以人口衆多的中國陸軍，盡亞細亞之大陸任務，以海島帝國之日本海軍，當太平洋之海洋任務，則極東平和、始得確保，大亞細亞主義的理想，亦得貫徹矣。

（二）中日兩國爲同一種族一點，較英美間之同族關係，尤爲純粹，以中日兩國，皆不如美國之包含複雜民族，而皆純爲蒙古族之故。

（三）中日言語雖不同，而文字則大部如一。

（四）中日文學有共通之歷史，爲國民思想之要素，西洋文明輸入後，日本文學趣味雖已紛歧，然大概尙與中國共通，猶不失爲兩國國民性之連鎖力。

(五)中日兩國政治制度，在古代相同，中國革命後，政制雖不同，然政治哲學思想尚多一致。

(六)法律慣例及司法制度，從日本古制言，各種典例，自古代冠位，朝禮及大寶令以至德川幕府之制度律令，悉由中國法制直譯，或意譯，或參酌而成，日本維新後，改革司法制度，呈急激進步，於是中國法律制度的改革，又多仿自日本，至今同為大陸派法系之國家，再俟若干時日，此兩國制度法律，將復入共通時代，其共通將不拘於形式，而由過去歷史的涵養，以達到精神的一致必矣。

(七)蒙古民族宗教偏見，不如歐美民族之深，中日民族於此頗見一致，如日本佛教係由中國輸入，而支配中國人道德之儒教，又同為日本道德及格言之基礎，足資證明。

(八)中日民族之雜婚，由來已久，且近有逐漸增加之傾向。

(九)中日民族遊嬉娛樂演劇及其他生活行動，尤多一致之習尚，如鬥雞，鞦韆，圍棋，象棋，骨牌，以至管絃笙鼓之類，及民間風俗，如節令行事冠婚喪祭諸儀式，皆大

同小異，日本劇院本脚本中，由中國戲曲翻譯而來者不少，蓋兩國國民，有血族關係，且日本文明久受中國文明影響之自然結果也。

(十)中日兩國之地理位置，於海僅隔一水，於陸疆土互接，實為不可分離之實情，故英美聯合，較全美主義為更自然，而中日結合較英美聯合為更自然，故大亞洲主義之當前急務，當先圖中日兩國之結合，以之為中心勢力，而圖黃色人種之繁榮，以當歐美列強之世界的帝國主義，且以備早晚實現之人種大競爭也。

觀上舉日本三大先哲所言，足見大亞洲主義的必須先由中日結合，以中日兩國為中心，負領導的責任，然後始能推行盡利，這不是我們中國人為求自利起見的大言不慚，而是顯然擺在目前的事實，此刻日德同盟的關係已經結成，而中日友好的關係，又已由和平基本條約的訂立而奠定其基礎，英美在遠東的勢力，已將被掃蕩無餘，土耳其的獨立，早經實現，而印度的獨立，也將不遠，這樣桂太郎公爵和秋山中山將三十餘年前的期望，已將完全達到，日本朝野，得此機會，正當努力奉行桂公的遺策，嚴守小寺先生的名言，開誠佈



公，傾心與中國合作，扶助中國的獨立，解除對中國有形無形的全部局部的拘束，使其能發揮固有力量，以盡力於復興

東亞復興亞洲的任務，這樣纔是中日兩國前途的大利，更是此時此際中日兩國有識人士所當深切瞭解而引為己任的。

### 中國青年黨建黨十週年紀念日舟中述感

愚公

十年未遂澄清願。彼岸茫茫望轉遙。差幸南針猶在握。不妨鼓棹更乘潮。兼天波浪思先烈。捲地風雲憶後凋。恩怨捫胸都蕩盡。獨餘公憤莫能銷。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作於滬港途中

### 中國青年黨十九週年紀念日感賦

胡遂良

廿載韶光付水流。無端烽火起神州。南荒喜見長蛇斬。北極愁聞赤魅游。但冀天心能厭亂，更須鄰國賦同仇。寄聲與亞愛時士。風雨何妨共一舟。

## 無黨政治與一黨專政

陳海濤

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和他的國情有不可分的關係，因為各國的國情不同，於是各國的政治制度也有了差別。所以我們可以說，政治制度乃是適應各國國情的產物。就目前世界各國的政治制度來說，大別之可分為三類：第一是「一黨專政」的制度，如蘇俄的共產黨，德國的納粹黨，意大利的法西斯黨等是；第二是「多黨並立」的制度，如英美及其他民主國家是；第三是「無黨政治」的制度，如友邦日本目前所實行的新體制是。這三種政治制度，各國實行以來，究竟誰是誰非，誰得誰失，我們暫時不必加以評論。因為政治制度之於國家，猶如衣服之於人身一樣。人的衣服必須適合身材，政治制度同樣的必須適應國情。甲的衣服未必適合於乙，乙的衣服也未必適合於丙；同樣的，甲國的政治制度未必適用於乙國，乙國的政治制度也未必適用於丙國。這是至明至顯的道理。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代，因為當時環境與事實的需要，不

得不做行英美的政治制度，頒布憲法，多黨並立。但是後來工業漸漸發達，國家成了高度工業化，資本主義漸漸抬頭，政黨遂和資本家發生了密切關係，換句話說，資本家隱然有操縱政黨政治的姿態。這種政治制度的變質，結果促成了「昭和維新」，斷然加以改革，而入於無黨政治時期，例如政友會和民政黨，他們的歷史在半世紀上下，遠在中國國民黨的歷史之上。然而他們現在一概解散，將政黨在政治上所負的任務移轉於大政翼贊會，繼而又由大政翼贊會移轉於翼贊政治會，從此政黨政治的形體化為烏有，日本國民所憧憬的「王道政治」，由此產生。中國有一句古話：「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正可以作為日本新體制的註脚。日本的「明治維新」，我們可以稱他為「政黨政治時期」；現在的「昭和維新」，我們可以稱他為「無黨政治時期」。日本這種劃時期的制度上的變革，既放棄了英美的政黨政治，又不效法蘇俄德意的一黨專政，雖然實行的效果如何，因時間關係，目

前還不能預言，然而日本當局斷然改革的精神，是值得我們佩服的。

可是中國的情形和日本又有些兩樣。中國自從民國十三年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以後，蘇俄的鮑羅廷，加倫之流，把一黨專政的毒素從莫斯科傳來中國。雖然後來蔣介石察覺了共產黨的陰謀，在十六年實行清黨，國共從此分家，可是蔣介石依然踏着一黨專政的道路，實行共產黨的老套。如果從民國十七年算到現在，可以說一黨專政已經毒化了中國十五個年頭，弄得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而且蔣氏不但實行一黨專政，並且進而演成一人獨裁。起初他不過從事對黨內的爭權，其後他對於黨外人又橫加壓迫。所謂「黨高於國」，「蔣高於黨」，實際上蔣比國家還高兩級，比人民要高上三級，大有巍巍乎高不可攀之勢。這和法蘭西暴君路易十四的「朕即國家」，可以說完全同出一轍。蔣介石既這樣倒行逆施，必然的要引起黨外的竭力反對，尤其黨內的糾紛從此更越發不可收拾，譬如因為排斥胡漢民先生，便逼成了西南獨立的局面；因為排斥汪精衛先生，曾產生了擴大會議，非常會議，和造成目前組府還都的局面。這都

### 無黨政治與一黨專政

是蔣氏不顧民意，肆行一黨專政一人獨裁的結果。

然則反對專政獨裁的對症良方是什麼呢？我們的答案是：「以各黨並存代替一黨專政，以全民政治代替一人獨裁」。在和平區域裏，中國青年黨的同志，為什麼一聞汪精衛先生揭起反蔣旗幟即欣然來參加？這決不是件盲從的事。因為我們主張民主，汪先生也主張民主；我們反對獨裁，汪先生也反對獨裁；我們反對一黨專政，汪先生也主張放棄一黨專政；我們主張結束訓政，實施憲政，汪先生不但在原則上同意，而且在政府中設立「憲政實施委員會」，準備付諸實行。可見青年黨人參加和平運動，反蔣聯汪，決不是毫無理由的。我們記得汪先生在組府還都之初，曾經發表一篇論文，題目是「民權主義前途之展望」，其中明白表示對於民主政治的信仰：

「民主政治是我們所信仰的，獨裁是我們所反對的，然則阻止民主政治之流弊，使不至於散漫，而又致不致蹈獨裁政治之武斷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以為應該以一個黨，一個主義為中心，而聯合其他各黨各派，以共同負荷國家社會重任，這裏仍然將用民主政治的基本

精神，即所謂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有了一個黨一個主義做中心，則不致散漫，而且組織訓練的種種努力，使一個黨臻於紀律化，這一個主義日臻於普及化，則可以常常得着多數，以運用一切，所謂築室道謀，費時失事的毛病，可以掃除。有了其他各黨各派存在，雖居少數，而意見常被尊重沒有掣肘的壞處，而有補偏救敝的好處，較之獨裁政治，一味武斷，做好事固然可以專美，做壞事絕對沒有方法可以矯正，其是非得失之相去，不待言了。」（見「新政治論叢」上冊第五頁）

汪先生在這篇文章裏，鄭重主張聯合各黨各派，採用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這充分表現了汪先生對國事的誠意，實在是值得欽佩的開明的政治家，決不是專政獨裁的野心家。我們站在反對一黨專政和一人獨裁的立場，當然要對汪先生表示竭誠的擁護。

我們青年黨人爲什麼這樣反對一黨專政呢？關於這個問題，本黨成立十九年來，有不少的言論可作詮釋。例如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本黨領袖會琦先生發表「一致對外與一黨專政」一文，其中列舉一黨專政絕對不能挽救國難的四大理由，說得非常透澈，其原文如下：

（一）在一黨專政之下，惟國民黨人始有公開活動之權，其

他政黨之分子則等於褫奪公權之罪犯，併其救國運動而亦禁之，此與一致對外主義，顯係背道而馳，使國中一部份富於國家觀念具有號召能力之國民完全失其作用，此在國家實爲一大損失。蓋在教育不發達之中國，具有國家觀念及號召能力之分子，在平時已患其少，當外患來臨之際，合力以赴國難，猶懼不能濟事，況復禁錮一部份有能力之國民，使其不克效力於國家，此無異居心減少國家之力量，其罪惡之大，真可謂上通於天，若曰必須信仰三民主義，始能許其救國，此則直認不信仰三民主義者爲非國民，其荒謬復可道耶！

（二）在一黨專政之下，唯國民黨人始有領導民衆之權，姑無論國民黨人是否皆諸葛亮，國民是否皆阿斗，假定國民黨人皆孔明，而國民皆阿斗，試問以三十萬諸葛亮領導三萬萬九千九百七十萬阿斗，是否有人數不敷支配之虞？若果全體國民不能盡爲國民黨人所領導，即使三十萬諸葛亮人人鞠躬盡瘁，恐亦無補於國家之亡，然則一致對外豈非徒託空言耶！

（三）在一黨專政之下，國民對於當局必多不滿之處，由不滿而懷疑，由懷疑而失望，而絕望，而反抗甚至抱有「時日曷喪，及汝偕亡」之念，此乃必然之事理，亦屬普通之現象，故以國民黨人號召民衆轉不若非國民黨號召民衆之易於生效。蓋以民衆

對於國民黨既已根本絕望，則國民黨人縱有蕪張之口，亦難起其信仰；所謂「有言不信，尚口乃寤」是也。國民黨若真欲合全國之力以對外，則正宜讓非國民黨人而出而活動；一律不加干涉，庶幾由各黨之通力合作，克收舉國對外之效，於國家固有利，於國民黨亦無害；所謂公私兩利，情勢昭然，若並此極顯明之事理而不能了解，仍固執其一黨專政之成見，自身既不能號召全民，而又嫉他黨之活動，則是根本無一致對外之誠意，他日亡國滅種之罪，不能不由國民黨獨負之矣。

(四)在一黨專政之下國民黨人顯然為一種特殊的統治階級，此種特殊的統治階級，頗似滿清皇族，平日與民衆極隔閡而鮮聯絡，所謂黨部皆屬衙門，委員皆屬黨官，即黨府黨國要人，亦嘗有此評語。職是之故，黨與民衆早已分離，更無由深入社會，從事於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之工作，反之，而受壓迫之黨，若吾儕中國青年黨國家主義青年團同志，轉得從容以從事於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之工作，而深植社會之基礎，此非吾人自炫之詞，實亦國內有目所共睹也。故欲領導有組織之民衆以對外，吾儕國家主義者，自信尙有其一日之長。國民黨之當局者，亦未嘗不知，惟其知之，是以嫉之，由嫉而畏，由畏而防，終乃實行其對內大壓迫，而對外無抵抗之政策，並吾人救國之義務而亦不允其盡

### 無黨政治與一黨專政

，所謂匹夫有罪，愛國其罪，有能力不克貢獻於國家，有熱忱無從表示於民衆，吾人於此痛心久矣。然則一黨專政之下，又何從而舉一致對外之實哉？

右之所陳，皆基於事實，準乎情理，非意氣之爭也，非黨派之見也，值茲國難當前之際，吾人絕無取國民黨而代之心，亦無暇追問其已往之責任，惟盼國民黨立即取消一黨專政，俾吾人得以一致對外。質言之，欲一致對外，則不能一黨專政；欲一黨專政，則難期一致對外，此乃極明顯之事理，國民黨人之明達者，或亦有同感耳。」。（見蔡曉舟輯「救國南針之商榷」七一頁）曾先生上面所舉反對一黨專政的四大理由，說得盡情盡理，酣暢淋漓，黨外人讀了，沒有不表同情的。在這篇文章以前，曾先生還有一封「與友人論第四共和運動書」，那是「九一八」以前的作品，對於一黨專政，抨擊更烈，其中有很精采的一段：

「方今一黨專政，天下為私，凡不奉彼黨之教者，皆不得與聞國政。黨超於國，而民屈於黨，國民盡皆阿斗，黨人胥成貴族。所謂「淮南拔宅，鷄犬皆仙」者，庶幾足以擬之。如斯奇變，千古罕聞。功利之徒，趨之若鶩，不佞夙持正義，未敢苟同，誓與同志，挽既倒之狂瀾，扶將傾之國運。不獨擬管仲之浮海，恥

作曹臣；抑將效魯陽之揮戈，終迴落日。比嘗有聯自勵云：「矢精誠以戰羣魔，敢誇精衛能填海。」「效愚忠而揆末運，且看愚公竟挾山。」區區之意，竊謂民國易為黨國，共和之實已亡，吾人非作第四共和運動，起而恢復中國不可。所謂第四共和者，蓋指辛亥革命為第一共和，雲南起義為第二共和，馬廠誓師為第三共和，今政權擄於一黨之手居然宣言訓政，目四萬萬人為阿斗，而自居於諸葛亮，不容有在野黨之監督，肆違共和之原則，尤背革命之初衷，蓋清末革命先烈之宗旨，不徒在革滿人之命，尤重在實行民主共和。盟誓具在，昭然可考，辛亥之役，創造共和也，丙辰之役，擁護共和也，丁巳之役，亦保護共和也。過去之三次義舉，既皆為擁護共和，今背叛共和者即為主張共和之人，是其罪且浮於袁世凱張勳萬萬！吾人始終信仰共和者，若坐視而聽其所為，豈惟無以對革命之先烈，亦將無以對叛國之袁張。何則？始擁護而終放棄，甲討伐而乙姑容，皆於義有所未安也。謂宜集合全國信仰共和之士，起而作第四共和運動，務期去黨國之惡名，復民國之尊號，除黨治之苛政，樹民主治之先聲，於以確立憲政，永固邦基，此則不侵與國家主義同志之所企圖而願獻身與此神聖之運動者也。昔法蘭西之革命也，志士仁人，醉心民約。考其目的所在，無非易帝制為共和。不意一破壞於拿破崙一世，再

破壞於拿破崙三世，卒至普法戰爭，師丹敗挫，拿氏被擒以後，始有第三共和之確立，迄今越五十年矣，人民獲享共和之幸福，皆三次犧牲之所賜也。不佞昔遊法京，目覩其紀念之盛而彌有感。吾國共和亦經三次，而國基至今未奠，野心者流，猶時有慕拿氏之行爲而思效法之者，豈非地廣人衆遠過於法，犧牲代價，猶有未足耶！若是則第四次共和運動，更不容緩，而吾輩之責任亦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

這封信的內容，措詞比較激昂，態度非常嚴正。因爲在「九一八」以前，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把持政權，壓迫異黨，絲毫沒有開放政權的表示，青年黨當時確擬採取革命手段，推翻一黨專政，創造第四共和，恢復民主政體。但到了「九一八」以後，國家環境顯然發生重大變化，青年黨以國家爲前提，毅然放棄革命的手段，主張「政黨休戰」，祇要國民黨取消一黨專政，開放政權，青年黨即準備率領全黨同志和國民黨共赴國難。然而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始終執迷不悟，雖在國難極嚴重的時期，依然把持政權如故，壓迫異黨如故。甚至「七七事變」以後，中日大戰爆發，蔣介石軍事失敗，退保西南一隅，還是排斥異黨，包辦國事，個人獨裁

，更甚於前。這實在是極痛心的事！幸而汪精衛先生冒險出來，首倡和平，聯合各黨，組府還都，明白宣佈放棄一黨專政，這纔和青年黨的根本主張趨於一致，兩黨攜手合作，共向和平反共建國的大道邁進。

不過當「九一八」以後，我們大聲疾呼反對一黨專政的時候，或許有人以為青年黨之所以這樣主張是挾有黨見，但我們一看當時國民黨內部明達之士的言論，也頗有同情於我們這主張的。例如前任代理軍事委員長并代理國民政府主席的李協和先生，在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十七日上海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席上，有這樣一段演說：

「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已有二十一年，以言憲政，極應早已完成，乃於今日而復言促進，實已不勝惶愧。至於現在之內憂外患，則內憂甚於外患，一念其所以致此之由，皆由一黨專政之病。蓋一黨專政，其結果祇能受少數人之壓迫，謀少數人之幸福。而以前國民黨之口號，何嘗不動聽，然其表現之事實，反見其對於人民幸福，有壓迫與剝奪。是以人民欲求解放，欲求幸福，非自己努力斷不可得，且此種情形，曠觀全球，皆出一轍，固不僅中國如是，而其原因於多數人抱敷衍態度，少數人存把持之心。今當國難當頭，全國人民尤應一致奮起，貫徹自決自救之宗旨

### 無黨政治與一黨專政

而自動解放。」（見蔡曉舟輯「救國南針之商榷」七六頁）  
李先生又有一封致蔡曉舟先生的信，曾經提到國民黨內部反對開放政權的情形，茲將原信錄下：

曉舟先生台鑒，奉讀大札，至佩偉論，僕等十餘人，曾有提案力主實行民權，進行制憲，縣長民選諸端。而反對之者，且謂此時若開放政權於人民，則國民黨將何以操縱之者？故僅獲通過切實保障人民，實行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自由之一條，黨人覺悟者少；欲求民主政治之實現，我國人須及時奮起也。書難盡意，即頌文祺。

人民此時，將本身組織起來，實為必要。

李烈鈞二十一年一月九日

李先生雖是軍人，但是頭腦很開明，態度很公正，他的意見很可以代表一部分國民黨中元老派的意見，值得我們尊重的。至於非國民黨的在野名流，對於一黨專政也非常表示不滿，例如所謂「小孫派」領袖孫洪伊先生，在二十一年被聘為國難會議會員，他決定拒絕出席，并且發表一篇談話：

「外患之來，由於內政不良，國家人民，兩無組織。故本人認為促進憲政，為安內攘外之急務，主旨：（一）既已確定中華民國為民主立憲國家，則一切設施，當以民權高於一切為原則，（

(二)組全民代表會議，(三)由全國代表會議製定憲法，依憲法組民意政府。至促進程序，第一步應喚起民衆，促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至國難會議用意何在，尙不明瞭。如確有謀救國大計之誠意，自先宜放棄專政。若欲藉此以籍人民之口，或令大家分謗，則此百數十會員，爲政府所聘，非人民所選出，豈足以代表全民？又安能爲政府分謗？」（見蔡曉舟輯「救國南針之商榷」七七頁）

我們讀了孫先生的談話，可見當時反對一黨專政的空氣已經瀰漫國中，成爲輿論，不但國民黨內明達之士表示同情，即黨外各方人士無不具有同感，決不是青年黨一黨的成見。要說成見，祇有蔣介石一個人始終迷信一黨專政，始終迷信一人獨裁，置全國民意於不顧，纔是冥頑不靈的成見。

然而汪精衛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和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是大異其趣的。汪先生主張放棄一黨專政，蔣則始終要維持一黨專政；汪先生贊成民主，蔣則祇知獨裁；汪先生主張結束訓政，實施憲政，而蔣則抱殘守缺，還要繼續訓政。兩者比較，優劣懸殊，成敗可睹。因爲政治上的鬥爭，全看旗幟鮮明與否來定成敗，旗幟鮮明的一定成功，否則沒有不失敗的。這在中外歷史上可以找出不少的實例。例如三國時劉

備和曹操爭雄，所謂「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劉曹二人當然不能並立。當時曹以八十三萬人馬揮戈南下，以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餘里急追劉軍，而劉先主每日僅能行二百里，眼看就要追上，左右都爲他擔憂，但是劉先主很泰然，他說：「曹以暴，吾以仁。」他自信仁義可以勝強暴雖冒萬險而不懼，凡恃強暴的，雖兵強馬壯，也敵不過仁義的旗幟鮮明，所以當時曹氏卒遭慘敗，劉備和他三分天下，乃是必然的結果。這件事，很可以供爭雄天下者的參考。今日的局面，汪先生所揭櫫的旗幟，是用民主的旗幟來對抗蔣的獨裁的旗幟，是用實施憲政的旗幟來對抗蔣的繼續訓政的旗幟，可以說得上堂皇正大，深得人心。汪先生有這樣鮮明的旗幟，其必能繼承國民黨的正統，聯合其他各黨各派共負國家的大任，那是毫無疑問的。

不過汪先生本人雖然高瞻遠矚，胸襟恢宏，具有政治家的豁達風度，但是仍有一部分人違反汪先生的原意，高倡適應友邦的新體制，主張取消各黨各派，而獨存國民黨一黨。試問這種說法，是不是真正和友邦的新體制相吻合呢？我們姑且不加批評，先來看看友邦人士對這問題的意見。岩井英



「氏在他所著的「中國的新政治體制」一文裏說道：

「討論中國新政治體制的人們，究竟是主張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乃至以國民黨爲唯一無二的政黨，以一國一組織而建立中國的新政治體制呢？或不是呢？這一點的確切的意見，尙沒有聽到負責的人們說過，所以不能斷言，但倘若有這樣主張的人，那末，他們對於日本新政治體制運動的經緯和目的，完全可以說是缺乏認識。

「自然日本的新政治新體制，實質上雖有種種的看法，但至少形式上是將過去的各黨各派的存在一切取消而完全從新的立場建立的，這就是使國民能夠適應時局再建其鞏固的組織。因此中國的新政治體制問題，在客觀的狀態，雖與日本有種種的差異，可是根本的理念，却非加以正本清源不可。否則，如前所述，要將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新政治體制強爲混同，無論如何是不能得到國民大眾的同意的。

「有人主張國民黨的強化便是中國的新政治體制，可是這種見解，想來還是主要的出於以更生國民黨的地位，若能澈底地清算抗日反日意識，重建純粹的親日政黨則使一切歸於國民黨也可以這樣的見解的，然而這種見解，對於中央政府收拾民心的困難所在，不但認識不足，簡直是不懂中國政治運用的微妙。

## 無黨政治與一黨專政

「但我是真的以中國最親密的朋友的地位，而希望着這種進步的空氣充分順調地向其理想發展的。在這種意義上，新中央政府的各位先覺，在正確認識了內外形勢的現實，且深深反省之後，不能不希望他們以新政治體制先覺的資格，自己首先從比較解散國民黨更高的新的立場，揭起高邁的國民底且屬於亞細亞的指標，而發揮着號召各黨各派那樣的先見之明和勇氣。」（見「新政治論叢」上冊六五頁）

岩井氏說明日本的新體制是「在形式上將過去各黨各派的存在一切取消」，決不是取消其他各黨各派而獨存某一黨。并且暗示國民黨如果真有適應友邦新體制的意思，最好以身作則，先行解散。因爲友邦的新政治體制，根本是「無黨政治」，絕對沒有「一黨專政」的成分。假使硬要把一黨專政和日本的體制混爲一談，那實在是「缺乏認識」，無怪岩井氏要予以駁斥了。不過我前面已經說過，這種論調，祇有一部分少數人的謬見，并不能代表和平區國民黨全黨的見解，我們相信國民黨的幹部人物，大部分是能領會汪先生的民主精神，不會盲從這種歪曲理論的。例如南京國民黨中委袁殊先生在他的「政黨問題」一文裏，便有很透闢的議論：

「亞洲各國的復興，或亞洲各國的建國運動，與亞洲各國的建黨運動已結成相依爲命的關係。凡建國已成的國家，應該由「各黨聯合」政治走向「一黨領導」政治，如日本，土耳其等。凡建國未成的國家，如中國，暹羅，印度，越南，緬甸，菲律賓等，應該由「一人獨裁」或「歐美代治」而走向「各黨聯合」領導的政治。不管「各黨聯合」領導的政治是長期的，或短期的，這是任何國家復興，或建立的必需過程。

中國是亞洲領土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因爲長期的被歐美所侵略，以致中國的經濟結構是分割的，社會的情況是複雜的，所以一黨領導的建國運動，已有五十年的教訓，指示爲不可能。凡有誠心解決中國及復興亞洲的政治家，或集團，在今天應該一方面建立己黨，另一方面扶助友黨，並將已走錯了路的諸政黨，及其黨員爭取過來，以最大決心站在復興亞洲，建設中國的立場上聯合起來。」（見新政治論叢上冊三〇頁）

袁先生不但是國民黨的中委，而且是現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他主張中國應該由「一人獨裁」或「歐美代治」而走向「各黨聯合領導的政治」。這句話可以說是和汪先生的主張完全相合的。我們回想汪先生在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和上海新中國報記者談話，曾經明白說過：「現在是中

國新體制的前夜，要以各黨各派的聯合，從民衆中建立中心勢力，不要劫持民衆。」這已經說明中國今後的新體制是和友邦的新體制並不盡同，既不是「一黨專政」，也不是「無黨政治」，而是「各黨聯合」的政治。如果有人心懷叵測，偏偏要作歪曲的解釋，那就確實含有「劫持民衆」的意味了。

所謂日本的新體制，雖然暫時還不適合於中國的環境，但是牠的內容，確也值得我們研究，可供我們借鑑的。不過目前友邦對於新體制正在試行時期，牠的理論，也還有待於發揮。我們現在可以介紹於國人的，有久原房之助氏在東京讀賣新聞社的「新中國建設座談會」的一篇談話，他對於日本現行政治制度的基本精神有所說明：

「我以爲全體主義的機構中，一定將勃發一種新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使人與物各能充分發揮其本性爲目標的，宛如從以前個人主義的專制，產生出自由思想一樣。即在覺得拘束及難受的感情下，自然而然會產生一種可以名之爲「發揚本然的思想」之思想。如果沒有到達那樣的地步，便沒有真正的安定。因爲「企劃統制」這種東西畢竟難免使人太拘束不快，不脫所謂專制的氣

味。所以無論如何含有勉強不自然的成分。若想把這樣含有勉強不自然成分的思想，貫徹到底，這是辦不到的。我想對此崛起的思想，一定是旨在使人和物都能發揮其本性。然而這種思想，就是日本建國本來的思想。而在整個世界正向這樣的思想邁進。我們日本自建國之初，早已具有這種思想，不但具有這樣思想，而且深入在國民的腦海，普及國土的角落了。這一點，不得不使我們驚為奇蹟。只要對於日本稍加深刻的研究，深長的玩味，那末馬上為恍然大悟，這種可以名之為「發揚本然的思想」的思想，就是日本的肇國精神。這種肇國精神深深地貫徹日本的一切部面，一切級層。依此肇國精神而定國本，樹國風。從前日本明治天皇會說：「億兆國民之中有一個不得其所者，皆朕之罪也。……」這就是此種日本肇國精神的表現。從「個人主義的專制」之見地，及自由思想的立場，完全玩味不到，即從全體主義的專制說來，也不能理解這種精神，因為這日本肇國精神的目標，非常雄偉，使萬民各得其所，使萬物各能發揮其本性，因以圖發揚宇宙的「本然」。由於這種的雄偉的見地，才能够產生「掩八紘為一字」的大理想。且最感興趣的是眼前已為世界思想界的劃時代的轉換期。從個人主義轉向全體主義，又因全體主義還是不脫專制性的「企劃統制」，遂又不得不轉向於發揮各人各物的本性，發揚各人各物的「本然」之目標邁進，已成世界必然之趨勢。在這

## 無黨政治與一黨專政

世界必然趨勢之下，早把這樣的思想作為建國基礎的日本，崛起而起，勃然而興，實不是偶然的事。」（見政治月刊四卷二期八四頁）

這一段理論，說明了日本新體制的產生，其思想的淵源，是基於日本的特殊的肇國精神，這種肇國精神，就是所謂「發揚本然的思想」，因此新體制的形式和實質，既不追隨英美，又不附和蘇俄，更不抄襲德義，這種獨立自主的精神，完全在於發揮各人各物的本性，向發揚「本然」的目標邁進。關於這一點，是值得我們欽佩和效法的。今日中國的國情，雖然和日本稍有差異而有多黨並立的必要，但是中國今日所需要的「民主」，並非完全模倣英美式的「民主政治」，而是需要實行「全體主義」的「全民政治」，所謂「全民政治」的涵義，和「全體主義」是沒有差別的。從前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一「民為貴」三個字，我們便可以作為「全民政治」的理論根據，也可以說這便是中國的特殊「肇國精神」。在「全民政治」的下面，沒有什麼階級，既不能有共產黨所標榜的「無產階級」的存在，也不容許有任何貴族式的「特殊階級」的存在，所以我們認為以

「全民政治」來代替蔣介石的「專政」「獨裁」，是最適當不過的。

今日之勢，蔣介石窮蹙一隅，已經到了日暮途窮的境地了。雖然外依存於英美，內受共產黨的挾持，還在作最後的掙扎，依然沈湎於「一黨專政」和「一人獨裁」的迷夢，但是大勢已去，人心已失，欲挽回這頹勢，殆不可能。至於汪

精衛先生所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旗幟鮮明，標榜民主，放棄專政，民心歸嚮，中外改觀，和蔣介石所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不可同日而語。我們誠懇的希望汪先生能夠貫徹初衷，繼續實施憲政的偉大工作，一新全國人士的耳目，那麼全面和平自然短期就可實現，中國復興更有希望了。

奉和爲農兄壬午生日之作並寄所懷 木公

逝水韶華惜少年。黃花猶自傲霜妍。  
半生事業頻看鏡。斯世行藏只聽天。  
歷亂今同出谷鳥。淒清却羨在山泉。  
夜深缺月窺窗戶。月缺終期可再圓。

# 目前政治的病態與全面和平的前途

左臨淵

假使我們沒有完全健忘的話，應該記得兩三年前有關政局轉變的幾段重要文字，例如：

(一)二十八年八月三十日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面說：「本屆大會特鄭重宣佈，授權汪同志，延請國內賢智之士，參加中央政治委員會，前此中央政治委員會為政治之最高指導機關，其人選限於黨員，今當破除此例，以收集全國人才之效，并鄭重宣佈，除共產黨外，凡屬人民，皆當有集會給社言論出版之自由，本黨願以至誠聯合有志之士，不分派別，共同擔負收拾時局之責任，而尤為切要者，則戰爭既息，國民大會之召集，憲法之制定頒佈，已無延期之必要，務於最短期間，使全國和平得以實現；國民大會得以召集，憲法得以制定頒佈，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以完成民權主義之階段。」

(二)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國民政府還都宣言裏面說：「國民政府根據中央政治會議之決議，還都南京，謹以誠敬，昭告海內。實現和平實施憲政兩大方針，為中央政治會議所鄭重決議，國民政府當堅決執行之。……當此戰後，百廢待舉，端賴舉國同

目前政治的病態與全面和平的前途

胞，集中心力物力，勇往精進。以完成現代國家之建設。過去個人獨裁，為全國人民精誠團結之障礙，必當革除。共產黨挑撥階級鬥爭，尤為國家民族之大敵，必當摧陷廓清，使無遺毒。至於各級民意機關之設立，地方自治之舉辦，以及國民大會之召集，憲法之制定頒佈，皆當趁期舉行，以慰海內人民之望。」

(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會議終了，主席汪精衛先生向全國廣播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其演詞中說明中央宣傳部社會部從國民黨中央黨部劃歸行政院的理由，就是因為「現在國民黨打算放棄一黨專政，既然放棄一黨專政，把這宣傳部的大權，把這民衆訓練的大權，放在中央黨部裏，怎樣可以表示不是一黨專政呢？因為這樣子，我們把宣傳部，把社會部放在行政院裏頭，一方面免除兩重政府的隔閡，一方面免除一黨專政的嫌疑。」

(四)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汪精衛先生在憲政實施委員會成立大會中致訓，題為憲政實施委員會之使命，其詞謂：「最近世界潮流，對於政府機構及政治權能，其思想之變遷，為有目所

共睹，然無論如何，民爲邦本，此理萬世不易。必民力充實，國力始能擴充；必民生安定，民力始能充實。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之能生存獨立與否，視其人民心力物力之集合與運用如何以爲斷。中國今日戰後疲敝，而全面和平猶未能實現，危急存亡，間不容髮。所望憲政實施委員會能針對時局，起死回生，務使民生得所保障，民力得以發展。」

這幾段文字，可以說明中國國民黨在和平運動初期所具的抱負和決心，確是非常值得我們欽佩的。因此，國內有志之士，對於國民黨領袖汪先生這種勇於犧牲，敢於負責的精神，無不受了很大的感動。尤其是國民黨能夠洞見事變以來時局癥結所在：一方面覺悟過去「抗戰」之非計，毅然轉向於「和平」，以謀中日問題合理的解決；一方面感到以往「訓政」的錯誤，遂明白主張廓清共產黨，反對個人獨裁，放棄一黨專政，以實現民主政治，并願意把收拾時局的責任，由全國不分派別的有志之士來共同擔負。此種賢明的措施及誠懇的態度，在當時，誰能否認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汪先生主持及領導之下，不是已進入一個新生的階段嗎？

我們青年黨人，自從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創黨起，始終對於含有國際背景的中國共產黨，種種不合國情，違害國

族利益的舉動，不論何時何地是一律加以痛擊的；同時更以一貫的主張，堅決的態度，要求實行國家主義，反對一黨專政，實現全民政治。所以，近十餘年來國民黨誤信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理論而施行的「訓政」，以及對國家主義派無理的壓迫，老實講，我們青年黨人是非常反對的。一直到中日事變發生，國民黨人本着良心上的自責，事實上的教訓，才稍稍改善態度，對國民黨以外的各黨各派，開始友誼的邀約，以國防參議會及國民參政會的名義，召請各黨各派的幹部，共商國是，要求協助，我們青年黨人素來主張國事第一，黨事第二，自然是懷着滿腔熱誠來接受國民黨的邀請，希望能夠竭盡智能，貢其一得之愚，俾可有利國家，以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雖明知重慶政府方面的國民黨人，決不會輕易放棄「黨見」，決不會虛心接收黨外的諍言，其結果終究要令人失望的；然而青年黨人仍舊以「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心情，「與人爲善」的態度，作最大的努力，希望政府在戰時體制之下，注重民意，集中民力，改善政治，改進民生。可是這些後來終陷於命定的「徒費唇舌」而無補時艱了！

重慶政府執政者及國民黨人的不顧民意專斷橫行既如彼；而汪先生以「罪己的精神」所提出的對外實現和平對內實施憲政主張又如此；全國人民在戰爭失敗，經濟困難的情況中掙扎了好幾年，一旦聽到汪先生所倡導的和平運動的崛起，正尤如達到「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可說是在萬分絕望的時候又存有一線的希望了！青年黨人素來抱定以身許國，凡有利於國家生存與獨立者，決全力以赴，一切犧牲，在所不計！因是在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一部份青年黨同志以中央政治行動委員會名義，正式宣言參加和平運動，願與國民黨人共同負擔收拾時局的重責。可以說對於汪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內有識之士的主張，青年黨同志是寄以無限同情與熱望的；至對於還都後的國民政府，當然出以至誠的擁護與全力的支持，那更不必說的了！

然而國民政府還都兩年以來，憲政實施委員會算是在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正式成立，并已將二十五年五月五日所公佈的憲法，經過若干次會議，業已重新審訂完竣；中日調整國交基本條約算是在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簽訂，日本代管若干權益，業已次第返還一部份，并貸款日金三億圓

目前政治的病態與全面和平的前途

與中國，從事戰後復興建設。去年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爆發，汪先生更宣言以同甘共苦的精神，協助日本完成東亞新秩序的建立。如此看來，國民政府還都時所揭櫫的兩大施政方針——實現和平與實施憲政，就表面上說，似乎都已達到預期的目的，就實際上說，距離完成使命的時間尚遠，尤有待於最善最大的努力！何以故呢？例如憲法草案既已重新審訂完畢，即應從速召開國民大會，通過憲法，成立各級民意機關，結束訓政，開始憲政，不可再蹈重慶政府一再延期的覆轍。然而事實上已經決定今年一月一日舉行的國民大會，又不聲不響的讓它再來一次「流產」；再如中日調整國交基本條約既經簽訂，即應由局部和平進一步以求全面和平，免得「抗戰」「和平」永成對壘狀態，使人民早日解除「兩姑之間難為婦」的苦痛。然而國民政府兩年來已經屢次調整機構，本身尚且日日需要「強化」，更有何力量以言全面和平；況當初對於和平抱有熱誠信念的志士們，現在有的安富尊榮，耽於享樂；有的黨同伐異，忙於爭奪位置；有的注意培植個人勢力；這些人，在事實上早已沒有從事全面和平的餘暇。所以和平區域以外的人民，雖不贊同蔣介石繼續抗戰，

傾向和平的心理亦甚殷切，然鑒於當前撲朔迷離的事勢，無法決定適當的歸趨，遂亦喪失對國民政府積極支援的勇氣，因而使全面和平遲遲未能實現，當亦爲無可否認的事實。

因爲全面和平一時不能實現，遂亦影響到憲政不能實施。這如同重慶政府藉口抗戰期間不能實行憲政是一樣的，不過措辭不同而已。因此，目前既不能實施憲政，國民大會就可不必召集，憲法就可不必頒佈，各級民意機關就可不必設立，地方自治更說不上舉辦，一切仍舊恢復「黨治」的本來面目，至於由此所產生的許多政治上的病態，那也就在所不顧了！在這裏，我們青年黨人很願意拋棄「黨見」，不欲多所批評，然而一想到國民政府還都宣言的根本精神，是不勝其慚愧的。

關於目前政治的病態，岩井英一氏在強化國民政府與新國民運動一文（見政治月刊第三卷第三期）中說得最透澈，他說：

「當國民政府改組還都之際，本以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團結合作爲前提，惟在還都後，每逢實際政治的運用時，政府構成馬上暴露了其一元化性格的缺如，而使強力政治的實行爲不可能

，遂漸次變成國民黨中心主義，以東亞聯盟運動爲契機，殆乎還元成爲國民黨的獨裁了。

「對於國民政府，目前內外所最痛感，是其人材的缺少，人的資源的貧困。所謂人材，不是指過去的開歷，聲望，地位等問題，雖然即在此各點上，亦深感不夠。所以國民政府爲求發展強化，人材吸收與人的資源獲得問題，實屬異常重要。然則目前國民政府豈不有門戶封鎖過強的傾向？此種傾向，既妨礙和平區內人材的吸收與人的資源的開發，亦爲阻止重慶陣營參加和平政府的原因，引而伸之，亦爲不能招致民心的理由，同時使日本發生悲觀印象，結果遂不能獲得全面的支持。其間原因，不外因爲國民政府當局對國家民族的利益與強化政府本身問題未能着重，而只求鞏固一黨一派，卽由與利己的思考所致。

「凡大事業的指導者，必須具有不惑於甘言蜜語，不畏苦口良言的雅量。最後的決斷，雖出於指導者的選擇，惟亦得接受別人的忠言，簡言之，卽集合衆智，以行政治，始得謂得民心的善政。然現下國民政府雖在形式上由汪主席一元統制黨，政，軍，惟實際上則汪主席的地位，頗有日漸昇華爲偶像的傾向。一般政治，亦每少逆耳忠言，而有阿諛的現象。因是使汪主席對於內部的情形，頗有欠缺明瞭認識之處，然此點却爲名實俱全的指導者所必要。這種使下意不能上達於汪主席周圍的現象，亦爲妨礙把



握和平民衆心理的原因之一。」

所謂「漸次變成國民黨中心主義」，所謂「還元成爲國民黨的獨裁」，所謂「國民政府豈不有門戶封鎖過強的傾向」，所謂「汪主席的地位頗有日漸昇華爲偶像的傾向」，不是充分指出目前的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已經忘記還都組府時所宣言應負的使命，反而重新走上「一黨專政」的道路嗎？本來，過去十多年一黨專政的結果，已經離開政治的通常大道，愈走愈遠，幸而有汪先生的賢明果斷，在和平運動初期，總算是「迷途知返」，重新找得新生的途徑，然而兩年來實際政治的運用，依然得到相反的結果，青年黨人對此，是異常表示惋惜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們極誠懇的希望汪先生以下每個國民黨人，對岩井氏的諍言，作一痛切的反省。

目前政治的形態，表面上是國民黨中心主義，實質上與和運未開始前的一黨專政，並沒有多大的區別。這裏，筆者願提出事實來證明，例如本年十月五日新中國報載：

（揚州通訊）蘇北黨務辦事處，以蘇北公務人員，一律須加入本黨一案，曾經商請蘇北行營，轉飭所屬蘇北各縣政府遵照辦

目前政治的病態與全面和平的前途

理在案，現值積極徵收黨員期間，特飭各縣黨部，迅與各該地方機關妥慎辦理，毋稍玩忽，揚縣黨部奉令後，現正與縣府會商，積極着手徵集，務期達到征收新黨員限額云。

又如本年十月二十三日新中國報載：

（蕪湖念二日中央社電）中國國民黨蕪湖縣黨部，以案准蕪湖地方黨政聯席首次會議函開，在討論事項第三案經全體決議，凡本市各機關職員，未經申請入黨者及未經補行登記之黨員，應由各主管人開列名單，送交縣黨部，以便檢發表格，依式詳填，轉各該主管人負責轉送，俾資分別審查，旋轉中央頒發黨員證，通過紀錄在卷，茲悉該部准函後，昨轉備入黨表及登記表多份，函達各社團查照，並請勸導所屬職員，踴躍入黨，至於入黨手續，由該部印就簡略辦法，隨函附送，如添索入黨表者，亦可備函具領，以便統計，而利黨務。

試問公務員必須加入國民黨，未申請加入及補行登記者尚須開列名單，勸導踴躍加入，這與國民黨第六次全代會宣言，「除共產黨外，凡屬人民，皆當有集會結社的自由」，是否不相抵觸？況徵收黨員範圍，由公務員擴大至各社團，蘇北黨務辦事處并製定各縣徵收新黨員獎懲條例，以爲考績標準，試問如此大量吸收，不管張三李四，一律加入爲黨員

六五

，其結果會不會如周佛海先生在中國國民黨過去的功罪與今後的地位一文中所說：「一般下級黨部的幼稚黨員，誤解訓政爲一黨專政，常常利用黨的招牌，去爲非作歹，有些干涉地方行政，使地方官一籌莫展；有些包攬詞訟，把持教育，以肆其營私舞弊的陰謀；有些排斥異己，侮辱鄉紳，以顯其作威作福的手段，他們所作所爲，比較他們所要打倒的土豪劣紳，還要壞幾十倍」。此種現象，會不會重行發生於今日？這是值得我們相當顧慮的。況且重慶方面，強迫公務員及小學教師入黨，已經引起輿論的責難，又何必一定要故蹈覆轍，才足以表示黨的權威呢！

國民黨在和平區域發展黨務，既然不自覺的復歸於一黨專政的舊途徑，因此在中樞機構上亦處處顯露其優越感，井時時似有意若無意的運用其「排他的」手段。我們知道還都後國民政府，是由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人士共同組織的，然而經過兩年來數次機構調整，很巧妙的將青年黨國社黨以及無黨無派的人士，摒諸行政院之外。同時，復以共和黨，大民會，興亞建國同盟相繼解散的緣故，主張實行新體制，要求各黨解消，而歸趨於國民黨一黨中心主義。因是在重慶方

面所盛倡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口號，遂同樣的在和平區域內流佈甚廣。在這裏，筆者更願意提出事實來證明：例如本年十一月十一日新中國報載，清鄉區黨務辦事處李兼主任士羣在清鄉區民運工作會議的訓詞裏面說：

「我們今後要秉着最高領袖的意旨，否決狹隘的民族主義，主張國家集團主義，排斥個人自由主義，主張全民主義，暨發展國家計劃經濟，對三民主義以最現實最具體的開發，在「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原則下，淬勵「鋼的意志，鐵的團結」，從刷新民運工作的過程中，完成國民再組織的偉大工作。」

李先生是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又是軍事委員會的調查統計部長，又兼江蘇省政府主席，在黨政軍三方面地位都很重要，無疑的，他的意見是可以代表國民黨最高幹部的意見的。此種意見，是否可以適應當前的政治局勢，姑且不管它；祇一想到三年前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願以至誠聯合有志之士，不分派別，共同擔負收拾時局的重任」。如今是又要在「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原則之下，從事新體制運動。「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我們深覺三年前所說的話，反而是多餘的了！

國民政府最高機構經過數次調整以後，行政院已成爲國民黨一黨所主持，照理說，應該已達到「強化」的程度，所有行政機構的運用，自應較爲靈活與便利，不致再有掣肘之虞；而一切行政措施，當更令人滿意，不致再有不合理的病態現象發生，可是按諸事實則不然！最近出版的華文每日上海版創刊號，有位筆名捕風君在風聞言事欄內，對於宣傳部與社會運動委員會的組織龐大，經費過鉅，中央儲備銀行與食糧管理委員會的待遇優厚，超過其他機關，以及特工機關的權責過大等等，均曾加以嚴正的指摘，可是措辭未免激烈了一點，筆者不願引證原文，以免爲仇者所快，親者所痛！而況該刊發行後不久，捕風君原文，即全部撕去，可見他的意見是有觸忌諱的。

然而就事實來說：社會運動指導委員會與宣傳部之隸屬於行政院，在汪先生的見解，是爲避免一黨專政的嫌疑，才由國民黨中央黨部裏面劃出來的。可是這兩個機關的組織龐大，在行政院內確實是超過其他部會的，而經費數字的鉅大，亦着實可以驚人！根據三十一年度下半年國家收支總概算書，國民政府五院（行政院各部會除外）的經費，總共是二

，一八一，五七〇元，而宣傳部連同附屬機關的經費，竟達五，一五三，七八九元，其主管的臨時費二，四三六，〇〇元尙不在內；社會運動指導委員會連同附屬機關的經費，亦達二，九三四，四四四元。但是第一集團軍的經費不過三，八四〇，〇〇〇元；第二集團軍的經費不過三，二四七元（按第二集團軍名義取消，軍隊并未縮編）；難道說汪先生所積極主張的「建軍」工作，都沒有宣傳專業及社會運動來得重要嗎？宣傳部與社會運動指導委員會如此鉅大經費，都是事實必需而全無絲毫浪費嗎？而主持特工的中央調查統計部，其經費爲五七五，七〇六元，比憲政實施委員會經費二六八，〇二〇元，中央政治委員會經費四九二，〇〇〇元自然大得多；另外所規定的特務費，竟有八，四〇〇，〇〇〇元之鉅，較諸教育文化費僅有四，九八〇，二四〇元，差不多爲二對一之比，想不到和平運動到了今天，「特工」仍然比教育文化事業來得重要。至於中央儲備銀行職員待遇優厚，超過一般高級行政官吏；食糧管理委員會的黑暗腐敗，更是社會周知的事實，筆者不欲多所論列了。

既然目前的政治，暴露這許多的病態！生活在和平區域

的民衆，其苦痛自不堪聞！儘管汪先生非常注重民生問題，認爲「民爲邦本，此理萬世不易。必民力充實，國力始能擴充；必民生安定，民力始能充實。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之能生存獨立與否，視其人民心力物力之集合與運用如何以爲斷。」無如和平區域內人民，經過屢次焦土戰遊擊戰以後，已經到了心力交瘁物力凋敝的地步，距離死亡與飢餓的邊線，相去并不過遠。當和平運動初期，汪先生組府還都之時，和平區域的民衆，確是抱有莫大期待的，然而兩年來的物價逐步飛騰，人民日常生活，時時有朝不保夕之感！加以苛捐雜稅，負擔奇重，兵匪交困，民難安枕。即以蘇北行營所轄十三縣而論，據我們青年黨同志調查，駐軍竟在兩個集團軍以上，雖小至不足三萬人口的鄉鎮，亦須每月攤派軍事及行政費用十二萬元左右。其他橫征暴斂的方法，如預借田賦，征收耕牛捐，圍豬捐，風車捐等等奇怪名目，更是不一而足。因此駐軍與行政機關之間，常常發生稅收爭執。最近蘇北行營主任臧卓與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楊仲華，因爭奪稅收而引起嚴重糾紛，卽爲明證。甚至一縣以內有三個縣政府，一區以內有三個區公所，除了一個是屬於和平區域的以外，還有一

個是屬於重慶政府的，另外一個是屬於共產黨新四軍的，也是照樣的征收田賦，征收捐稅。這好像三國時代魏蜀吳，三分鼎足而立。但因爲區域相接，齒牙交錯，三方面都沒有顯著的疆界。如果人民居住的地方，恰好三方面權力都能達到的話，那就要繳納三方面捐稅，決不能偏袒任何一方面。因此，政府方面也曾發動大規模「清鄉」工作，可是遺留給人民的印象，反而誤解是「清箱」，其無補於現實，更是不言可喻。於是生活在此時此地的人民，至少要具備三種生活方式的條件，否則無法生存下去的。

現在，和平區域的民衆，大多數是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況下掙扎過活的。對於和平運動的前途，是由渴望而趨向於失望的。此種心理的轉變，由目前政治上許多病態所召致，要爲無可否認的事實。如果今後政治還是不上軌道，一切措施，還是「諱疾忌醫」，不肯盡量改善，并且仍舊施行一黨專政，而把還都組府時所宣言的種種，如設立各級民意機關，舉辦地方自治，召集國民大會，頒佈憲法等，皆認爲事過境遷，置諸腦後，則不僅民生無法安定，民力無法充實，國力無法擴充，而全面和平更是遙遙無期，無法實現的。

試問國家民族又從何處覓得生存獨立之道呢！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祇要國民黨人能夠仍本和平運動初期的方針，和汪先生所提倡的「罪己精神」，容納「逆耳忠言」，打消自私自利及機會主義的觀念，一一實踐還都組府的諾言，則和平區域民衆以及非和平區域民衆，傾向和平的心理，未嘗不可由消極轉向於積極，自然有益

於全面和平的前途。而我們青年黨同志，決仍以風雨同舟，患難共濟的精神，來共負收拾時局的責任，協力完成國府還都所標榜的兩大使命——實現和平與實施憲政。這一點是今後時局轉變的契機所在，何去何從，那就在國民黨人善自決擇了。

### 昆明寄懷馬寅初先生

愚公

乍聽朝陽第一聲，橫空陰翳若爲明。朱雲劍已憑君請；鄭俠圖猶待我成。蕭艾未芟蘭自馥；黃鐘既毀瓦爭鳴。江湖遠迹應珍重，過闕還期酒共傾。

### 香港寄懷張君勳先生

愚公

翠湖風月足盤桓，鸞鳳遙憐惜羽翰。遲我巴山聽夜雨；輸君洱海弄微瀾。虎鬚偶捋冰同履；馬齒徒增夢未安。寄與黃花應共玩，曲江風度萬人看。

## 全面和平與各黨各派的協力

陳耀芝

中國最近幾十年來的內部風波，是以「甲午戰爭」失敗後的康梁維新運動爲起點，一直發展到現在尙未停止。其風波的內容，是越演越錯綜複雜，其發展的方向以及拖長到何年何月方能停止，似乎是測度不易。但是我們知道這風波儘管是錯綜複雜，其發展的前途儘管是捉摸不定，而其主要的目的是十分明白，因爲對外數次失敗的慘痛教訓和割地賠款的刺激，因而外求國家的獨立與自由，從許多不平等條約中解放出來。內求政治組織改進，使合於現代各文明國的民治民有民享的組織，把中國的國力充實，國民生計改善，足以與世界各文明國抗衡，換言之，近幾十年的風波，就是民衆外求獨立，內求民主的政治革命。這種革命目的——外求獨立，內求民主，不是中國那一部分人或那一黨所獨抱的目的，我想凡是屬於中國國民，對於中國現時所處的環境地位略有一點覺悟的人，都有如此希望的，這個目的達到了，中國的革命才算成功，這風波才可停止，但是這個目的至今還未

達到，幾十年來，中國不但未從不平等條約中解放出來，反將國家送於更險惡的境地，內部政治組織，不惟不曾改進，民主制度，不惟不曾確切建立，反使國家常陷於土崩瓦解的狀態中。

在辛亥革命成功滿清帝制倒台以後，國家本來有了光明的一線希望，民主政治算是已有了一點雛形。那時參與滿清末葉政治鬥爭的革命派的同盟會與立憲派的憲友會此時都起了極大變化，在表面上同盟會是由祕密到公開，憲友會是旗幟消滅；但實際上仍是兩派的離合變化。這種離合變化，變化去，一時小黨林立，似雨後春筍，一直到第一次正式國會成立，又化成革命派的國民黨與立憲派的進步黨，形成兩黨對立。這時參與政黨活動的人物，雖然有許多對於民主政治的真意義還不認識，對於民主政治的真精神還不能了解，可是其中仍不乏許多有識之士，抱着十二分的誠意在爲民主政治的實現，而與袁世凱氏獨裁野心作正面鬥爭。

本來在中華民國初成立的時期，一般人民及同盟會許多份子，都寄袁氏以重大希望。假如那時操全國軍政大權的袁氏真有實行民主政治的誠意，國家也許有慢慢步入正軌的希望。但袁氏乃一梟雄，根本無實行民主政治的誠意，他利用了革命勢力推倒了滿清，自己取得了國家元首的地位，一面玩弄於民初的各政黨間，以達到其重建個人皇室的目的。同時民初的各政黨本身又是弱點重重，既沒有一點民衆作基礎，又無確切的主義。即以同盟會的身身國民黨而論，辛亥革命是倚仗民衆消極的反滿意味得以成功。在滿清顛覆後，就根本與民衆不發生關係，與進步黨一樣，都成了水上無根的浮萍。袁氏最初對各政黨還相當的敷衍，對議會還有相當的顧忌，所以迭次內閣還容納點各黨份子。但到後來竟露出獨裁臉面，對民主政黨加以壓迫摧殘，國民黨首先處於危險境地，接近袁氏的進步黨亦不能倖存。到民國四年，袁氏本身滅亡，中國更陷於混亂的狀態中的悲劇——洪憲帝制終究演現。爲袁氏着想，這一念之差演成本身悲劇是十分不幸，爲國家着想，洪憲帝制亂後，造成國內大小軍閥的混戰，使國家根本發生了動搖，則更是國家的萬分不幸。

### 全面和平與各黨各派的協力

洪憲帝制變亂後，國內遂成爲南北大小軍閥的混戰時代。而此時期的政黨，更是愈趨下流。民初的政黨，雖然沒有民衆做基礎，主義不着實，黨員跨黨，黨籍不清，但牠們畢竟還標出一個政綱來，主張上還有集權分權的差別。而混戰時代的政黨，全然變爲個人的私黨，什麼「韜園」「靜廬」，什麼街幾號，什麼胡同幾號，什麼系什麼系的名號以外，祇有金錢和官位，所謂政綱就根本沒那回事了。這時中國的政局已步入最黑暗的時代，革命的目標——外求獨立自由，內求政治改造實行民主，豈但無成功之希望，而且離題愈遠，甚至整個中國均陷於混亂崩潰中，全國的統一，遂成爲國家最嚴重的問題。同時國家於國際間的處境亦日益險惡。因爲臨城劫車案的發生，國際共管中國的呼聲傳遍於全世界。於是本黨遂應時代的需要於此國家最險惡的時期而產生。確定「外求獨立，內求統一」爲口號，以國家主義爲中心思想，提倡「國家至上」主義，以冀促成國家的獨立與統一。標榜民主政治以繼諸先烈的奮鬥，爭取民主政治之實現，以建立民治民有民享的共和國。主張社會政策，以改善國民民生計，充實國力。本黨根據以上目標奮鬥，迄今已整整十九年

了，革命的目的雖然沒有能達到，但是國家至上的提倡，已爲全國人士所接受，此亦本黨同志稍可告慰者，至民主政治之實現，還有待全國人士的共同奮鬥。

四十餘年來的民主政治奮鬥，真如俗語所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維新變法，經過光緒帝同意，本來已有實現的可能，但結果光緒爲袁世凱所出賣，使其運動全部失敗。光緒也因此失去帝王的實權，最後還犧牲了生命。辛亥革命後，民主政治本可步入正軌的可能，結果仍爲袁氏全部摧毀，並使中國陷於土崩瓦解的境地。及至民國十年以後——所謂各地軍閥本身在日趨沒落，一般人民均甚厭亂求治，頗希望有一新興勢力起來以代替失去民心的各地軍閥。國民黨遂於民國十三年實行改組，第一步統一了廣東政權，至十五年興師北伐，正迎合上一般民衆厭惡舊軍閥希望新興勢力來代替的心理；故一舉而能擊敗數省軍閥，奠新都於南京。至十七年十二月卅一日退出關外的張學良宣言易幟，國民黨遂得到一次形式上的統一全國。此時國民黨正可乘此時機，以實行其總理孫中山先生的遺教，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以冀由形式的統一做到真正的統一，更可爲民主政治

奠下鞏固的基礎，以與全國賢智之士共同努力建設新中國。但國民黨因爲容共的結果，理論上受了共產黨的影響，乃主張一黨專政，主張黨外無黨，把非國民黨的一切勢力與人物，均視如北洋軍閥，均稱之爲反動勢力。因此數年北伐以熱血爭得來的一點形式統一，便全付之東流。此不僅爲國民黨惋惜，即我們非國民黨人也感慨系之。說句老實話，所謂國民黨一黨專政，又何嘗真是由黨專政，還不是蔣介石個人獨裁。黨外的份子彼可任意屠殺，固不必論，即國民黨本身的反獨裁同志亦難倖免。以追隨孫中山先生一生的胡展堂先生，身爲國民黨重要首腦之一，因與蔣介石政見不合，亦難免被幽禁八個月零十四天，更何況其他歷史較淺的同志。這時本黨有鑑於獨裁之魔的復活，乃冒任何壓迫而從事反對一黨專政的運動。更有名教授胡適之等，亦憤而以學者的資格，挺身高呼人權運動。國民黨本身亦有以孫中山先生夫人宋慶齡女士爲領導，組織人權保障大同盟，以與獨裁的蔣介石相周旋。此雖一時未能成功，但總算民心未死，辛亥革命的未了工作，總算還有人在繼續奮鬥。

談到民主政治，國民黨本來是有民主政治主張傳統性的



。在中國歷史上正式組黨以推翻專制創造共和的，還是以國民黨的前身中國同盟會爲始。民初以同盟會改爲國民黨，亦以爭取民主與袁世凱對抗。其總理孫中山先生所創的三民主義，除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求民族解放與國民生計改善外，而國內的政治組織是以民權主義爲依歸，冀求實行直接民權。今蔣介石實行一黨專政，以冀行個人之獨裁，是違背了國民黨的傳統性的民主主張，更犧牲了同盟會推翻專制創造共和的光榮歷史，破壞了北伐流血所爭得來的形式統一，真係其總理孫中山先生遺教的叛徒。

蔣介石實行一黨專政，個人獨裁，將一時形式上的統一破壞了。於是過去的軍閥混戰，又重演於國民黨執政時期。所謂蔣桂之爭，蔣馮之爭，甯粵之爭，蔣閻之爭，十九路軍的閩變，加之共匪的猖獗，使整個國家無一甯日。其中尤以閻馮合力的中原大戰爲時最久，結果蔣介石誘張學良入關，算是結束了閻馮之戰。但結局是種了滿州事變的大因。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氏所領導的南京政府又束手無策，使中日國交越演愈惡劣。關於這一點，周佛海先生於「中國國民黨過去的功罪與今後的地位」一文中說得很明白，他說：

全面和平與各黨各派的協力

「九一八的時候，如果真正的抗戰起來，我想不但不會因爲抗戰而擴大事件，反將因此而結束糾紛。否則與日本直接談判去覓求和平，也不致使事件越演變越離奇。當時既不戰，又不和。在不戰不和的糊糊塗塗的形勢之下，便把東四省輕輕的斷送了。這個責任，國民黨是沒有法子可以推卸的，這個罪名，國民黨也是沒有法子可以洗刷的。」

豈但九一八事變如此，七七事變又何嘗不是如此。未戰之前，既毫無準備，便冒然抗戰。既戰之後，節節敗退，國都南京失陷了，徐州廣州又失陷，及至中國的心臟武漢又失守了，還不考慮結束事變方策，惟依存英美，把國家作爲英美犧牲品。這個責任，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也是沒有法子可以推卸的。盲目戰敗之後，喪師失地，數千萬人民流離失所，人民財產損失更不能以數字計，這個罪名，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也是沒有法子可以洗刷的。

蔣介石感於中日時局的嚴重，一時的輿論對其專政獨裁又大加責難，於是在事變將爆發時有廬山談話之召集；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後有最高國防委員會參議會之召集；南京失陷後，在武漢有稍含一點民意組織意味的國民參政會的召集；同時蔣介石與汪精衛先生以國民黨正副總裁之名義，

與本黨代表左舜生先生及國社黨代表張君勱先生正式交換函件，在野黨在此時才得到法定承認。這種種類似民意機關之召集，以及在野黨之承認，表面上似乎是蔣介石對於實行民主政治之誠意，其實非也！不過是對外戰爭節節敗退，迫於形勢之不得已的敷衍而已。故於武漢淪陷退保西南以後，他對於開放政權實行民主的毫無誠意的真面目則全部暴露。他一面玩弄參政會以裝飾門面，欺騙民衆，欺騙英美；一面強迫公務員小學教員入黨，行其獨裁專政之實。如此騙局，本黨同志趙毓松先生，在參加和逆組府遠都後，曾於致左舜生李璿書中說明：

「自九一八之變，始有國難會議之召集，而所議者，乃限於綏靖，不許涉及政治外交，是以赴會者寥寥。自有七七事變，始有廬山談話會之召集。而所謂談話者，亦不外集合學者名流報告談論而已，非有法定機關之性質權限也。自八一三全面戰爭既起，始有最高國防委員會之參議會組織。乃所約參加之黨外人士，亦僅寥寥二十人，無關宏旨，何裨大局。迨至首都陷，武漢播遷，乃有國民參政會之召集。共二百名之會員，亦皆由要約指派而來，共談國難，共聽國難而已。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虛名徒擁，力量毫無，實則政府即根本不需其有力也。直至武漢淪陷

，退保西南。以過去選接遞近之比例推之，宜可邁進一步，開放政權，組織國民聯合政府，以謀最後之一致。乃其結果，適得其反，不惟開放政權毫無希望，反進而攘奪飯碗，爭取地盤，馴至後方皇皇，不可終日。故開放政權云云，純屬騙人騙局，全面抗戰，民主聯合政治云云，亦屬自欺欺人而已。」

蔣介石的欺騙壓迫，殘害，不僅施於黨外人士，即國民黨的同志亦所難免。如周佛西先生「回憶與前瞻」文中說到武漢失陷後，重慶一般人的情形。「沒有一個人不想和，沒有一個人敢說和，兩個人關着門說話，沒有不疾首痛心。咒罵戰爭，希望和平的。但是有了三個人，調子就高起來了。——這不是蔣介石的壓迫又何至於如此。即以汪先生而論，以其國民黨副總裁與國民參政會議長之尊，還不能在重慶公開發表政見，還要一犧牲自己的一切，離開重慶，以便公開的發表和平主張，從事和平運動。」更何況黨外人士，以及在國民黨地位較低的黨員！

蔣介石雖橫行一時，背叛了國民黨傳說的民主主張，背叛了其總理孫中山先生的遺教，而實行一黨專政，個人獨裁。但是我們研究中華民國以來的歷史，有那一個獨裁者得以僥倖成功的？那一個獨裁者違背了革命的主流——民主政治

，而不歸於失敗的，由袁世凱起到北洋各大小軍閥止，他們雖然反動的阻礙民主政治發展，而其本身終逃不了失敗與滅亡。所以我想蔣介石的失敗與滅亡，也就是最近將來的事。更何況他盲目拖戰，迄今不悟，置人民痛苦與國家前途於不顧，亦只有促其早日滅亡而已。

重慶國民參政會的民主鬥爭，在蔣介石的壓迫下，仍是黑暗重重，不見一點曙光。直到二十七年底汪先生脫離重慶，倡導和運。二十八年八月，召集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上海，發表對時局宣言，正式宣布和平反共並放棄一黨專政主張，民主政治的發展，才算有了一線新的希望。其文中曾說：

「……本屆大會特鄭重宣布，授權汪同志，延請國內賢智之士，參加中央政治委員會，前此中央政治委員會為政治之最高指導機關，其人選限于黨員，今當破除此例，以收集全國人才之效。並鄭重宣布，除共產黨外，凡屬人民，皆當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本黨願以至誠聯合全國有志之士，不分黨派，共同擔負收拾時局之責任。」

二十九年一月汪先生赴青島參加青島會談時，曾於接見中外記者發表談話時，對於放棄一黨專政又加說明：

全面和平與各黨各派的協力

「過去國民政府法統之所以被人非難者，乃由于推動全國政治之中央政治委員會之構成份子，祇限于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並無黨外人士之參加，致招外界謂為一黨專政之嫌。去年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有鑒于斯，對斯制度，特議決加以改善，在大會宣言中，已表明此旨。由是今後中央政治委員會，已非國民黨一黨獨占，凡各合法政黨及全國賢能之士，均能依法參加，協力商議政治。此即實施憲政之初步，同時矯正過去政制缺點者也。」

汪先生自脫離重慶，冒重重危險，以領導和平反共運動，促進中日和平之實現，並斷然放棄一黨專政與各黨各派合作，共負收拾時局之責，此與本黨反對共產黨反對一黨專政之主張全相符合。本黨有鑒於斯，並為汪先生的大無畏精神所感動，遂於汪先生和平宣言發表後，即以中國青年黨中央政治行動委員會名義發布宣言，擁護和平反共國策。

三月二十日汪先生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名義，邀請南北已成政權與各黨各派領導人物，以及無黨無派具有聲望的賢智之士，在南京舉行中央政治會議。關於政府樹立的大綱，中央政治委員會組織條例，國民政府的名稱，各院部人選的推定，以及其他有關還都諸問題，都圓滿解決。次

日汪先生向全國廣播「國民政府還都的重大使命」，說明國民政府兩大施政方針。(一)實現和平，謀中日關係的調整，完成東亞和平與秩序的建設。(二)實施憲政，謀民主政治之實現，完成中華民國的建設。三月三十日，國民政府舉行還都典禮，發表還都宣言及國民政府政綱。於是這和平反共的各黨各派無黨無派聯合的政府遂正式成立。

還都以後的中央政府，已集中全國人才之效，為和平區奠下了和平統一的基礎。例如：最高政治指導機關的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構成份子，除國民黨外，梁鴻志溫宗堯王克敏王揖唐諸先生以代表已成政權參加，趙毓松諸青來先生等以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之代表資格參加，趙正平趙尊嶽先生等以無黨無派社會賢智之士被邀參加。院部方面，汪先生自主行政院，梁鴻志先生主監察院，王揖唐先生主考試院，溫宗堯先生主司法院，陳公博先生主立法院。行政院各部方面，有本黨同志趙毓松先生長農礦，國社黨諸青來先生長交通，無黨派的趙正平先生長教育。原為國民黨黨員而以已成政權資格參加的陳萃先生仍繼續長內政。如此全國大聯合的中央政府，實開中國政治史的新紀元，亦可為中國政治史上由專制

到民主的過程中的一朵光明燦爛的花。我們希望大家對這朵燦爛的花善加保護，不要讓專制的惡魔來摧殘。

至於數黨聯合組閣，在中國也不是絕對沒有過。如民國初年的幾次內閣，同盟會共和黨進步黨都有份子參加。但那時與現在情形完全不同。(一)那時軍政實權乃在軍人手中，而議會與內閣仍暗中受軍人的左右。今日和平區內已無軍閥存在，實際的軍政實權已握於政治家手中，政治重心已由軍人身上轉到政黨身上來了。這在中華民國史上，是一大進步。(二)民國初年的政黨，既無民衆的基礎，又無確實的黨義黨綱，其實際的政治目標，不過對那一個軍人的接近與反對而已。而今日參加南京政權的國民黨，青年黨，國社黨都有民衆與社會基礎，各有其主義與主張，如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黨的國家主義，國社黨的國家社會主義等是。(三)民國初年的混合內閣，不過是政潮內爭的妥協結果。今日南京的各黨合作，是有求得中日永久和平與實施憲政完成中華民國的建設的共同理想。故國府還都的各黨派大聯合，決不能與民國初年的混合內閣同日而語。故我稱組府還都的大聯合為開中國政治史上的新紀元，是由專制到民主的過程中的一朵光

明燦爛的花，決不爲過。

國府成立後不久，爲實施憲政計，曾有憲政實施委員會的成立。其組成份子，亦本着還都時各黨派大聯合的精神，邀請各方面人士參加。曾經開過兩次大會，通過了召集國民大會的日期。對於憲法問題，以前國民政府所擬之五五憲草爲張本，重加討論審訂。當時爲了憲法第一條三民主義共和國問題，曾引起國民黨與非國民黨爭執與辯論。這個我認爲是各黨各派合作與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是應該有的現象，是向民主方向發展的進步，不是退步。一個問題未決定前，彼此的意見不同，大家可以盡量表示意見，可以彼此爭論，既經大會通過，少數就應該服從多數，服從決議案，這就是民主精神。這種精神我們不但不必抑制，更該加以培養。所謂憲法草案之第一條之爭論，最後還是經大會通過將「三民主義共和國」字樣取消了。

至於召集國民大會問題，因礙於實際環境的困難，一再延期，及至今日，好像大家已忘了這回事。召集國民大會的困難，我們應該設法努力打破，如於萬不得已之中，我們也應該設一個過渡的民意機關，以鞏固各黨派大聯合的基礎。

全面和平與各黨各派的協力

否則，長此蹉跎，置政府兩大施政方針之一的實施憲政而不顧，將何以取信於國民。

兩年半以來的國民聯合政府，因爲實施憲政問題的停止進行，政府即失去兩大施政方針之一，亦即各黨派大聯合的和平陣營失去了一個共同奮鬥的目標。在各黨聯合相互間的關係上講，由一黨中心論起，接着就有解散各黨各派的論調發生，強化國民政府即強化國民黨的曲解理論出現，所以其聯合相互的關係漸趨鬆懈，亦是必然的趨勢。這種推翻各黨聯合的基礎與政府內部構成份子一元的推動與發展，結果行政院的國民黨的清一色化終久實現了，什麼「一個黨，一個主義」的口號，也就正式作清鄉區的宣傳目標了。於是組府還都時的各黨派大聯合的根本精神，也就根本發生動搖了。此正如岩井英一氏於「強化國民政府與新國民運動」一文中所云：「殆乎還元成爲國民黨的獨裁了」。說是獨裁的復活，也許過甚其詞，但根據種種事實的表現，我們也不能否認有恢復一黨專政的傾向。這個傾向若不加以防止，則將來確有全部摧毀組府還都時的根本精神，分化和平運動的力量之可能。我們希望全面和平能早日實現，更不願在全面和平未成功之

先，會看到和平運動陣營本身的不和平。我們希望中國能早日統一，更不願在以各黨派大聯合組府還都的局面下有不統一的現象發生。我們反對蔣介石的一黨專政個人獨裁，更不願在和平區裏看到有一黨專政個人獨裁。但願這種傾向不致實現，同時更希望有此主張的和運同志，趕快放棄此種主張的進行，以免將數年來和平運動的基礎，毀之於一旦。

倡導解散各黨各派和加強某一黨的論者，皆以各黨各派合作的政府，機構運用不靈為藉口。此實吹毛求疵之論，政府機構運用之靈與不靈，全看人事支配之當與不當，以及從政者對國家對政府之誠意如何為斷。如各黨各派合作之政府，人事支配得當，彼此合作有誠意，對國家對政府也有誠意，我想亦能運用靈活自如。如人事調度失當，大家只知權利之爭，根本對國家對政府毫無誠意，即行一黨專政，亦難免黨內派別對立，運用不靈。事變以前，蔣介石專政獨裁的南京國民政府不是很明顯的例證嗎？

本來以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聯合為其基礎的政府，在中國算是第一次創舉，要一時實行得盡善盡美，本非易事。不過我們總不希望這一次的創舉僅是曇花一現，我們希望以

此次團結為基礎，除努力完成和平建國外，還得為中國奠下永久和平團結的基礎。所以我們今日應該檢討過去的缺點，努力加以改善，應該討論如何加強各黨派大聯合的團結，以完成大業。關於這一點，我想應該加強彼此對合作團結的誠意外，更應有下列幾個條件，才可以做到真正的統一與團結。

(一)要培養以國家為前提的共同信仰 以國家為前提的信仰，本來就是現世各文明國立國的最高原則。如友邦日本以皇室為中心，而皇室即是代表國家，效忠皇室也就是效忠國家。平時他們國內的政爭亦在所難免，然一旦有關於國家的重大事件發生，大家即可消除成見，共同為國家皇室效忠。所以日本能自明治維新後的短短時期內，發展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德義兩國的法西斯政治，更是極端國家主義的政治，他們的政治理論，根本否認個人生存的目的，個人的存在，不過是為國家生存發展的目的而存在。所以德義兩國今日能稱霸於歐洲，亦決非偶然。再談英美等國，平時的兩黨對立，政爭亦相當激烈，然一遇國家利益發生問題時，大家即可放棄黨見，組織國民聯合內閣，共同衛護國家的利益。不幸中國立國數千年來，以國家為前提的信仰從未養成，始

終停留於家族主義爲中心思想的階段裏。帝王把國家皇室視爲自己家族世代相傳的私產；人民的一切活動，更是以家庭爲中心。爲國家服務做官，是爲了光耀門第，每年到了清明，做官的人可以放下政務，回家掃墓祭祖。社會道德是以孝爲出發點，什麼「父母在，不遠遊」，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等等，都是家族主義的道德。至五四運動後，家族主義破壞了，所新起的又是軍閥割據的地方主義，以及極端的個人主義。政治上的發展，有以地方爲主的什麼奉系直系，社會上的發展，到處同鄉會林立，經濟事業上，又有什麼「山西幫」「廣東幫」，另外新興的個人主義，只講極端的個人自由，他們否認一切組織，只有個人的發展與活動。當時社會上固然成爲混亂的局面，而思想上也成爲無政府狀態。本黨同志有鑒於當時的情形與危險，遂於組黨之時，乃以國家主義爲中心，高呼國家至上以喚醒國人。但以共產黨對此理論橫加攻擊摧殘，認爲愛國是狹隘的落伍的，並倡「工人無祖國」「勞工無國界」等等謬論。致本黨同志所提倡的「國家至上」主義，未能即時收效。十六年國民黨執政以後，又高唱「以黨治國」「黨權高於一切」等理論，結果養成

#### 全面和平與各黨各派的協力

一部黨見甚深的黨員，認爲國可犧牲，黨的政權不可放鬆。直至事變發生，全國均陷於烽火之中，大家才感到國家的重要，於是本黨於民國十二年間即已提倡的「國家至上」主義，才爲全國人士所接受。這種以國家爲前提的初步爲人民所接受，要能發生實際的效果，還有待我們的去培養努力。國家處於今日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還有人在專爲自己打算，或派系打算。所以今日我們到處可以看到發國難財者，均置國家危亡於不顧。如何培養這種以國家爲前提的共同信仰能發生實際效果呢？我以爲今日應以各黨派大聯合的國民政府應該擔當此任。因爲在組府還都時，大家本來是以國家爲前提，參加份子各自犧牲部份的私見或黨見，以聯合共同努力，求全面和平實現，中華民國建設的完成。這種精神，不但不應任其被摧毀，更應努力加強，以此訓練民衆，訓練自己。使參加和平陣營的每一份子或政團，都能切實以國家爲前提，犧牲部份私見與黨見，以樹立和平團結的風範。周佛海先生生在「國民黨過去的功罪與今後的地位」一文中曾說：「我們不能再懷着以國殉黨，以黨殉人的心思，再不能採用這個辦法了。我們要倒轉過來，以人殉黨，以黨殉國。」我以爲

在今日艱苦的境况下，不僅黨要殉國，就是人也該殉國，大家都應該在以國家爲前提的共同信仰的最高原則下共同努力。那末，各黨派大聯合的陣營才不致破壞，團結才會益加鞏固。

(二)彼此承認其價值 本來一個人長成後，脫離了父母的保育到社會上活動，其活動的範圍儘管有大與小，但都有其本身價值，也可以說在國家整個功能上說，都有他的貢獻。大而至於政治領袖，軍事人才，小而至於看門巡捕，黃包車夫，我們都相信他在救國工作上，各有各的本領，各有各的功能，而主持國家大事的人，更應了解其功能，承認其價值，然後才可以作安排整個使用的張本。人的向上心和自負心，大半都是先天付與的，所以每個人的活動，無論大小，其所要求的意義隨時總在希望向上與擴大。因此，一般從事政治活動和軍事工作的人，固然都認爲自己的活動是救國的。而一般從事工商業以至做工人農民的人，也都認爲他的活動是有補於國家前途的。這種本身價值的理解是不错的，一個國家的富強與發展，其原因本來是很複雜，那末任何一種正當的職業與行爲，大小都是有其貢獻的，各種貢獻，對於

國家發展上，其功效究竟如何？這全靠主持大局的人去如何安排他，如何使用他。同時主持大局者，對各方有價值有貢獻人士，那怕其對國的功能甚小，也得使他了然而他的行爲對國家有補益，因之他的向上心便可加強，對國家貢獻的情緒也可以增加，這是就主持大局者一般情形講。若以政黨合作擔當大任講，而彼此價值的承認，則更爲重要了。原來在合作的基點上，就是互相承認了價值才開始合作的。合作之後，更要彼此價值的承認與了然，達到彼此鼓勵向上心的加強，這樣政黨合作的效能才易於收效，團結才可以鞏固。否則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承認自己的價值，否認他的價值；只有自己才能將國家事辦得好，他人都不行；自己才是愛國份子，他人都是壞蛋。結果我可以斷定什麼事都幹不成功，更是自己遮蔽了對國事對國人了解的眼目，阻礙了國家團結的大道。

政黨合作，在彼此承認其價值的原則下，我們還得有一個認識——國事的分工。中國的建國工作，是千頭萬緒，困難重重，決不是任何個人可以辦得了，也不是任何一部份人可以辦得了。周佛海先生曾於「國民黨過去的功罪與今後的



地位——文中曾如此說：

「將來還有許多難關，要我們去打破，許多具體的困難問題，要我們去解決。這也不是一黨一派所能把持，所能包辦的。所以我相信中國國民黨沒有一個黨員，現在還主張不許黨外派系和人士，參加政治的，即使少數人有這種糊塗的主張，也不能得到黨的通過和採納。」

國家大事，不是那一部份人可以包辦得了的，這個認識，我想凡對國家問題關心的人，都有此同感。尤其是我們中國，目前處境之困難為空前所未有，即集全中國之人力物力，還不能挽回頹勢於一時。恐怕還要十年至三十年的共同努力，才有完成中華民國建設的希望。這種工作是如何的繁難，這個責任是何等的重大，那一個個人和派系，可以包辦得了，可以擔當得了。

人的生命，不過短短地幾十年，以此數十年的生命與國家的生命相比較，真是渺小之至。個人生命有限，國家生命無窮，個人只能做一段工作，未了工作還須讓後人做。個人能力有限，國家事業無窮，個人只能做一部份工作，其他工作還得讓給他人做。大家有此覺悟，大家有此認識，彼此承

全面平和與各黨各派的協力

認價值，彼此互相鼓勵，如此才可免去相忌相殘，團結才可鞏固。

三、不必強不同為共同 這一點在表面上看起來，好像與各黨聯合合作精神相違背，而實際確是各黨各派由聯合到團結的一個很重要的消極條件。此次組府還都，是以聯合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賢智之士為基礎的。所謂聯合，就是因為有不同，才有聯合，如果全同，便稱一體，便不必聯合了。由不同到聯合，其中必有一個共同，這個共同就是聯合的基礎，也就是聯合的最高原則與目標。否則，共同沒有，也無法聯合。此次組府還都，是以和平反共實施憲政為最高原則，也就是此次各黨派大聯合的共同。這個共同，需要每一個聯合份子；去衛護，去奮鬥。至於其他不同，我以為不過問為是，因為聯合的構成份子，以政黨說，各有各的主義信仰，各有各的政黨歷史；以無黨無派的人士說，各有各的歷史關係，各有各的人生想法。如其要強不同為共同，彼此拿着一個尺寸，一付模型，不但永遠不會合式，一定會發生許多糾紛，結果也許會將根本精神都犧牲了。關於強不同為共同的工作，過去有許多人做過，但結果無一不失敗。民國十三年

國民黨改組，因為外交上要聯俄就不得不聯共。可是那時的國民黨一定要做到強不同為共同，由聯共就變為容共了。當時在聯俄外交與打倒北洋軍閥目標上講，國民黨與共產黨有此共同，而在黨籍上與思想上，又各的不同，因為要強不同為共同，在共產黨黨員頭上，再加上國民黨的帽子。結果，使國民黨北閥剛到武漢就發生分裂，而共產黨也就在國民掩護下奠下了鞏固的基礎，迄至今日，成為國家的大患，這是一個例。蔣介石要實行一黨專政，個人獨裁，乃主張思想統一，強迫入黨。這也是一個強不同為共同的工作。十餘年的統一思想工作，不但未生效果，反引起中立份子的反感，增加了反對黨的力量。強迫入黨工作，由公務員起，到北洋軍閥止，什麼石友三，韓復榘，張學良都是國民黨的同志了，甚至高級的北洋軍閥還做了國民黨的中委。這種強不同為共同，於蔣介石何補，不但破壞了國民黨傳統精神，並且促進了黨的分裂，這又是一例。同時我們知道中華民族是好自由慣了的，如欲硬生生的勉強，總得到相反的結果多。中國人的語言中，通行「非不」或「偏不」兩個字。自己願意做的事

，赴湯蹈火在所不惜，如強欲為之，他可以來一個「非不」或「偏不」，這事就無法進行了。

印度的民族領袖尼赫魯先生在他的自傳的序言中說：「真正的合作必須根據對於歧異點以及同點的體驗」，我覺得這句話真是至理名言。今日的國民大聯合，大家都由歧異點與共同點去體驗，以達到真正的合作團結。防止強不同為共同的事件發生，以免破壞了聯合的基礎。

上面所說的三個合作條件，要是都能做到，國民大聯合的團結算是鞏固了，再加以大家的誠意與努力，全面和平的目標會提早完成，進而為中國奠下永久和平統一基礎。所謂循環革命不再發生，由維新運動為起點的內部風波即宣告停止。然後再集全國的力量，以完成歷史所給予我們的「對外能獨立自由，從不平等條約中解放出來；對內改進了政治組織，成爲一個民治民有民享的現代國家，國力充實，民生改善，足以立於世界各文明國之林」的重要使命。

這一個遠大的建國理想，我想凡參加此次各黨派大聯合的同志們，都應該有此希望與抱負吧！

# 中國何以不能實行民主政治

王照明

中華民國建立已三十一年。當初許多志士仁人之獻身革

爲一無組織的國家。

命，與夫一般民衆之贊助革命，以推倒滿清建立民國之主要目的，即在推翻專制政體，實行民主政治。換言之，即是把國家的主權，從一家人一姓人之少數特殊階級手中，交還全體國民，一變只爲少數人所有，少數人所治，少數人所享的國家，而成爲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所以於組織中華民國之臨時約法開宗明義第一章，即明白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當時舉國歡欣，以爲數千年專制政體之舊污已經滌除，

在此號稱民國而民治未行變亂紛乘之際，復遭遇空前未有的國難，陷國家民族於絕續存亡的危急關頭。在我們的看法，總以爲國事敗壞至此之原因，是由於政治不上軌道，政治不上軌道之原因，是由於民主政治未能實行，今後要轉危爲安，撥亂反治，非本當初建立民國的本旨，實行民主政治不可。而在一般另有用意者的論調，則以爲中國今日的病源，不在未能實行民主政治，並且以爲中國不能實行民主政治，勉強行之適足以致亂，與我們的看法剛剛相反。

建立民國之目的已經達到，依照臨時約法之規定，於約法施行後十個月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由國會制定憲法，從此中國即可步入民主政治的正軌，而成功一個現代國家，屹然立於世界。不料事勢之推演，竟與當時的希冀相去太遠，蹉跎三十一年之久，不特民主政治未能實現，連現代國家所決不可少的根本法——憲法尙未制定，致使外人譏誚中國

這是我們國家極不幸的事體，建立民國已有三十一年，而對於民主政治之是否應該實行還在討論之列。我們在此姑且撇開理論不談，試就民國成立以來未能實行民主政治之事實，作一個簡略敘述：

(一)當民國元二年之間，臨時約法既已施行，正式國會及各省省議會縣議會亦已依法成立，民主政治的規模，可謂

中國何以不能實行民主政治

樹立起來了。宋教仁對此頗爲樂觀，即以民主國家之政治家的姿態，活躍於政治舞台之上，到處演說，發表政見，仍主張將來的正式大總統推選袁世凱，而以在國會中占有多數議席的政黨組織內閣，俾能發揮責任內閣制的精神。黃克強更誠意推重袁世凱，首先把自己南京留守的職務呈請撤銷，把所部的革命軍隊解散，以表示擁護中央的誠意，并於到北京之後，勸袁世凱也來加入國民黨作國民黨的領袖，使政府有後援，政局能安定。孫中山先生雖對於袁世凱之是否能夠效忠民國存而不論，但仍主張把政權讓給袁氏，以觀後效，而率同志爲純粹在野黨，專從事擴張教育，振興實業，以立民國國家百年之大計。至於袁世凱本人，也信誓旦旦，効忠民國，於清帝退位之時，即電南京臨時政府，認定「共和爲最良國體，世界所公認，今由帝政一躍而躋及之，實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國無窮之幸福，……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當此民主政治的規模已經樹立，各方一致表示尊重民主，只要沒有人利用不正當的手段橫加摧殘，則民主政治之實行，即可日益發揚光大，躋中華民國於自由平等之域。乃袁世凱一心背叛民國，

帝制自爲，因忌刻國民黨之選舉佔優勢，在國會中佔有多數議席，恐宋教仁挾國會的勢力逼着要組織內閣，遂唆使內閣總理趙秉鈞派人於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暗殺之於上海，首先破壞民主政治的正軌，致激起國民黨之興師討袁，即所謂贛甯之役。此役袁軍勝利以後，袁世凱更無忌憚，不惜採取種種卑劣暴戾之手段，向着民主政治之軌道節節破壞，務必摧毀淨盡。袁氏始則利用進步黨贊助其先選總統後定憲法之主張，以攫取正式總統的位置，而於二年十月國會開總統選舉會的那一天，預先製好一種便衣軍警的公民團數千人，將議場重重包圍，脅迫議員們非將袁氏選出不准出場，似此利用國家元首的權力以導演如是其卑劣滑稽的醜劇，委實有傷民主政治的尊嚴，開競選未有之奇例。袁氏於利用國會投票取得正式總統的名義以後，隨即進而破壞國會，第一步通電各省都督民政長等干預憲法之起草進行，一致起而叫囂，主張解散國民黨，撤銷國民黨議員，撤銷憲法草案，解散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二步授意各省都督民政長等，再度起來叫囂，呈請總統解散國會；於是屢遭袁氏摧殘早已名存實亡之參衆兩院，遂在此種由袁氏一手造成之非法的惡例的軍人干涉

政治及行政人員干涉立法之情形下，於三年一月由袁世凱正式宣告解散。袁氏於解散國會之後，隨即進而由他御用的政治會議產生約法會議，由袁氏提出增修臨時約法案於約法會議，由約法會議遵照袁氏意旨修改交卷，把總統的職權，擴張到最大限度，名之曰新約法，由袁氏於三年五月公布；復於三年十二月公布由袁氏御用的參政院所制定的修正大總統選舉法。明定總統任期為十年，連任無限制，必要時無須改選，繼任人以總統推薦之三名為限。照此兩法之所規定，袁世凱無論在事實上形式上，已經成了中國終身的獨裁元首，所謂民主政治的精神及形式，至是均已摧毀無遺。然而袁世凱並不以此為滿足，一意要過皇帝癮，終於揭開了擁護共和效忠民國的假面具，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公然帝制自為，改元建制，把中華民國根本取消。

照以上所述，可知自民國成立至袁氏稱帝這一個時期，民主政治之所以不能實行，完全由於袁世凱一心要做獨裁政治的領袖，并且要明白實行帝制，要他的子子孫孫都可做獨裁政治的領袖。根本與民主政治不相容，而用種種卑劣暴戾的手段，加以破壞，摧殘，毀滅的原故。

中國何以不能實行民主政治

(二)袁世凱於民國五年因稱帝不如意而羞憤以死，段祺瑞繼之而興，依據袁氏臨死以前的任命，以內閣總理自居，隱然為北洋派之領袖，憑藉北洋軍隊的力量，把持大局。而以副總統黎元洪出任大總統。本來黎氏之出任大總統，為當時南方軍務院之所主張，依照民國二年十月公布的總統選舉法所規定之總統缺位由副總統繼任，是當然無問題的。然而段氏之意，則不願恢復臨時約法，致諸事皆受國會牽制，不能以黎氏為傀儡而大權獨攬，故宣告黎氏的總統資格以袁氏民國三年之新約法為根據。嗣以於法理上究竟說不過去，兼之南方堅決反對，乃承認恢復臨時約法，并依臨時約法續行召集國會，於是年六月由大總統正式申令。及國會於八月開會於北京，段祺瑞內閣的閣員亦通過於國會，可謂第二次的南北統一完成。假使當時各方均能遵守民主政治的道德，在民主政治的軌道以內活動，制定憲法，完成憲政，則中國雖經袁世凱之一度竊權僭位的變故，而民主政治的基礎，仍可從新建樹起來，如法國之推倒拿破崙第三以後即永奠共和基礎一樣。乃段氏計不出此，於當政不到一年之間，即接續發生府院的爭議，與黎元洪勢成水火；督軍團的示威，愈為增

長北洋軍人干涉政治目無法紀的兇殘種種事件。終且因爲對德宣戰的問題，一面召集各省督軍來京開軍事會議，以威脅國會，一面由陸軍部人員指揮其所雇用的所謂公民請願團，五族請願團等約三千餘人，於衆議院開會時，包圍議院，毆辱議員，以致激動國會之公憤，議決變相之不信任段內閣案，雙方各走極端。黎氏徇國會方面之意見，免段氏國務總理職，激成督軍團的獨立，要求中央解散國會。黎氏懼段系武人之暴動，調張勳入京以自衛，張勳亦以解散國會相要求，黎氏遂不得已而下令解散國會，是爲國會之第二次解散。張勳復辟之亂旋起，黎氏逃避，段氏誓師平亂之後，乃擁重兵以鎮首都，總攬政府大權。自是以後，北洋軍閥的氣燄日益囂張，南方各省雖以護法相對抗，實際上亦係大小軍閥趁火打劫的局面，整個的中國，重現五代時的形勢，國家紀綱，掃地無遺，秩序大亂，民不聊生。所謂國會，不過徒爲軍閥利用之工具，要如何組成便如何組成，要如何解消便如何解消；認爲需要時便召之使來，認爲不需要時便揮之使去。至於民主政治云云，更非彼輩之所能了解，所能接受。自段祺瑞於六年七月重任國務總理，決計不再召集舊國會，另行成

立新國會，卽世所稱之「安福國會」，於七年九月選舉徐世昌爲大總統，直至九年七月直皖戰爭而段倒，十一年四月直奉戰爭而徐去，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於倒段驅奉之後，主張恢復法統，召集舊國會，繼續製憲，請黎元洪復大總統職，似乎時局又呈一線的曙光。乃曹氏只知覬覦大總統位置，吳氏堅決要用武力統一，對於政治毫無一新耳目之作法。迨至公然扮演逼宮以驅逐黎氏，賄買議員以謀得總統，不僅曹氏爲人唾棄，卽國會的信譽亦爲之蕩然無存。時局推演至此，凡是有識之士，皆知既非法律所能解決，亦非用政治手段所能解決，要打破軍閥之專制及割據局面，實行民主政治，只有出於武力革命之一途。

照以上所述，可知自背叛民國之袁世凱死後，民主政治之所以仍不能實行，完全由於北洋軍閥干涉政治，破壞法紀，致陷中國於分崩離析的境地，政治建設莫由進行的原故。

(三)孫中山先生爲創造民國的元勳，於民國六年，見着段琪瑞再度組閣，不肯召集舊國會，直是承認黎元洪非法解散國會之行爲，乃率領海軍及國會議員往廣州，組織軍政府，樹立護法的旗幟。軍政府由非常國會產生，選舉中山先

生爲大元帥。軍政府組織大綱開篇申明組織軍政府之目的，在於「戡定叛亂，恢復臨時約法」。中山先生就大元帥職，宣言：「當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復約法，以竟元年未盡之責」。無如當時西南各省之軍人，名雖擁戴中山先生護法，實則各懷私圖，爭權奪利，不肯接受中山先生的領導，從事「攘除奸兇，恢復約法」之大業，反而與政學會互相勾結，倡議改組軍政府，把大元帥的首領制取消，而改爲實力派的首領合議制，以排除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於七年五月向非常國會辭大元帥職，同時通電指出當時的情形道：「……其時滇桂之師，皆由地方問題而起，而所以宣告自主者，其態度猶屬暗昧，似尙置根本大法於不問。……文不忍坐視正義之弗伸，爰於滬上與民國諸老，倡議護法，海軍將士，亦有宣言，相率南來，……由是發生國會非常會議於廣州，於中華民國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公布軍政府組織大綱。文不才，被舉爲大元帥，不能坐視大法之淪亡而不救，是用不避艱險，不辭勞瘁，以爲護法討逆倡。自是以後，粵桂滇黔川湘，又莫不宣言護法，始以恢復非法解散之國會爲共同目的，於時地方之爭，一變而爲護法之爭。軍政府雖無尺地之憑藉，而此志

中國何以不能實行民主政治

已範乎六省，其他表同情而來附義者，尙復所在多有，不得謂爲護法之己告一成功。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邱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於法律及民意之下。故軍政府雖成立，而被舉之人多不就職，卽對於非常會議，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內既不能謀各省之統一，外何以得友邦之承認。……」在此種情形之下，中山先生心有餘而力不足，自不能資策策萃力以成護法之大業，故於辭去大元帥職後卽赴上海，發憤著書，從事國民之心理建設。及至九年冬季，軍政府因滇桂軍之衝突，而破裂。粵軍陳炯明由閩回粵，中山先生乃再去廣州，召集國會非常會議。國會非常會議「鑒於軍政府之組織權責不專，遇事瞻顧，致大亂未平，而國本先潰，乃謀澈底之改造」，從而製定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於十年四月選舉中山先生爲大總統。中山先生就大總統職後，卽圖貫徹護法的初衷，銳意北伐，以陳炯明於十一年六月叛變，乃離粵到滬。嗣於十二年一月復回廣州之際，舊國會已在北京開會，中山先生仍以大元帥資格與北廷抗爭。及至曹錕賄選成立，國會自甘暴棄。中山先生乃與段祺瑞張作霖結成當時之所謂三角同盟以抗曹吳

，此亦不過策略上之運用而已，當時中山先生已深覺非徹底革命不足以打倒軍閥，故捨護法而講革命，積極謀整頓國民黨，并決意聯俄容共以壯聲援，把革命的事業，從新創造。

照以上所述，可知當北洋軍閥毀法以妨害民主政治之際，中山先生即護法以維持民主政治。護法未能成功之主要原因，厥惟西南軍閥，陽奉陰違，從中作梗。西南軍閥之干涉政治，破壞法紀，與北洋軍閥名異而實同，皆爲民主政治之障礙。

(四)民國成立之初，政黨紛紛成立，直到第一次國會正式成立的前後，纔化成兩個大黨相對立，一個爲國民黨，一個卽進步黨。正式國會選舉的結果，國民黨獨佔優勢，朱教仁便以組織政黨內閣的候補者自居。進步黨以在國會中競爭不過國民黨，遂不擇手段，聯絡袁世凱以壓迫國民黨，袁世凱自樂於加以利用操縱，以解除國會方面之牽制，俾可爲所欲爲。當時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如袁氏之不經國會同意而祕密向五國銀行團大借款，係屬違背約法的行爲；派人暗殺宋教仁於上海，係屬觸犯刑法的行爲，進步黨皆袒護袁氏而抑制國民黨。及贛甯之役告結束，袁氏已決心破壞國會，不過尙需利用國會投票選他爲正式大總統，故仍虛與委蛇，而提出

先選總統後制憲法之辦法，進步黨竟亦首先贊成。迨至袁氏取得正式總統而着手破壞國會，組織公民黨以爲爪牙，進步黨始覺袁氏之不可與合作，欲聯絡國民黨謀對抗，已經無濟於事了。袁死而段琪瑞代執北洋派之牛耳，進步黨後身之研究系，亦以段氏有中堅實力，可與合作以取得政權，故仍擁護段氏，而不惜逾越民主政治範圍內競爭之正軌，利用軍人以壓迫敵黨，如五年憲法會議開會發生鬥毆，事後研究系通電各省督軍攻擊敵黨議員，因而啓督軍圍干憲之端；復辟亂平之後，研究系以其在舊國會之份子不多，遂主張改造國會，因而啓南北分裂長期紛擾之端。凡此諸種事實，足見北洋軍閥之毀法亂法以破壞民主政治的進行，進步系不能不謂爲有以助其惡而長其箠。進步系在北方之作法如此，政學系在南方亦異曲同工，當研究系主張改造國會的時候，政學系并不堅持恢復舊國會，嗣以不得意於段琪瑞，乃轉而南下加入護法運動。此時中山先生雖擁有非常國會，但得不到西南軍閥的實力援助，西南軍閥之近在肘腋者爲桂系陸榮廷，聲光較大者爲雲南唐繼堯，政學會以岑春暄與陸唐均有相當關係，乃擁戴岑氏爲偶像以抵制中山先生，外面勾結西南各省實力派，



內而拉攏非常國會之中間派議員，造內外之聯結均已成熟，遂將軍政府大元帥制改爲七總裁的合議制，名義上由岑春煊爲主席總裁，實際上則由政學系操縱運用當時的局面，以謀發展政學系本身的權勢慾，對於護法毫無誠意。嗣以滇桂軍閥互相火併，粵軍乘機返粵，國會議員相率他去，軍政府瓦解，政學系的勢力和形式始隨着消失。而護法事業屢經磨折至於此時，也就陷於不能號召的境地了。

政黨本爲推進民主政治的重心。乃當時之政黨，竟如以上所述，爲目的不擇手段，幫助軍閥或勾結軍閥，以破壞民主政治之進行或阻撓民主政治之維護，此不能不謂爲過去民主政治不能實行之一重大原因。

綜合上述四段之事實，可以歸納而易詞言之；中國過去民主政治之不能實行，由於獨夫竊國而已，由於軍人干政而已，由於政客弄法而已。只要能夠反其道而行之，使獨夫不竊國，軍人不干政，政客不弄法，民主政治就可以實行起來。然此僅就民國初期北洋派當政時代之情形而言。自民國十五年國民黨北伐，十六年奠都南京，十七年完成形式上之統一以來，民主政治之未能實行，完全由於國民黨堅持一黨專

中國何以不能實行民主政治

政，不肯實行民主政治之故。一黨專政的制度係發源於俄國共產黨。國民黨以本來主張民主政治之政黨而採取一黨專政的制度，委實係受俄國共產黨的影響。不過國民黨人對此並不承認，說是國民黨並不主張一黨專政，只是主張以黨訓政，訓政時期由國民黨行使統治權，經過訓政時期即還政於民，實施憲政。我們對於訓政之說，自始不肯贊同，經過這十年來的觀察，更認爲訓政直是具文，覺得國民黨無堅持此種說法之必要。何以言之？

人民之參政必須從實際參政中獲得經驗而後有進步，非憑空訓練之所能有效，且亦不必先之以憑空訓練而後令其參政。例如英國之立憲，日本之維新，美利堅之建國，皆立即實施憲政，其人民並未經過訓練之階段，即能依照憲法參與政治，即是明顯的例證。至於調查戶口，測量土地，辦理警衛，修築道路等等，都是行政範圍以內的事體，隨時都應辦理，在憲政施行之前固應着手，在憲政施行之後亦該舉辦，不能以此爲施行憲政的先決條件。就訓政之事實而言：照建國大綱第八條所載：「在訓政時期，政府派員協助人民，籌備自治。……人民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

議立一縣之法律。」又建國大綱第十四條所載：「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後，得選國民代表一員，以組織代表會，參預中央政事。」這兩條之所規定，當然是訓政時期最重要而必須辦理的事體。但是自國民黨於十八年正式宣布訓政規定訓政時期六年以來，迄今十有四年之久，而全國一千九百餘縣之中，竟無有一縣能夠完成這種事體，不是國民黨人之辦理不力，即是此項規定實在有礙難辦到的地方，無論其原因屬於那一種，都足證明訓政之無成績而不可拘泥，更不可以訓政完成始實施憲政爲口實，使憲政可望而不可及，如鏡花水月一般。

年來國民黨當局對於一黨專政之說既已否認，對於以黨訓政之說亦不堅持，迭次有實施憲政還政於民的表示，但在事實上則係一天一天的向着強化一黨專政的途徑上走去。以中國現行制度與德意三國之現行制度比較，則中國國民黨專政的程度實已凌駕俄國的共產黨，德國的國家社會黨及意國的法西斯黨而上之。如行使統治權之最高機構，在俄國爲全蘇維埃代表大會，在中國爲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全蘇維埃代表大會之代表並不限於共產黨黨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

會之代表自以國民黨黨員爲限，是即俄國非共產黨員之人民亦得參預行使統治權之最高機構，而中國非國民黨員之人民，則不得參預行使統治權之最高機構。如俄國政府之用人，並不限於用共產黨黨員，列寧關於軍事且請教於俄皇時代的將軍，德國政府之用人，亦不限於用國社黨員，希特拉登台時所用的國防部長漢隆坡，外交部長牛瑞，銀行總裁沙赫特等，皆非國社黨黨員，意國之公務員亦不限於用法西斯黨黨員，墨索里尼在征服阿比西尼亞時，且曾用非法西斯黨員之軍人充當前敵總司令；而中國各級政府之公務員，則一再令其加入國民黨，非加入國民黨即受歧視而不能立足。又如德國現在仍設有國會，遇有重大事件如廢除凡爾塞條約，進兵波蘭及併吞捷克等，皆採取公民投票的方式以取決於人民，意國亦有職業代表制的議會；而中國國民黨則廢置民意機關而不設置，嗣雖成立所謂國民參政會，而職責則限於建議，議案只提供採擇，直等於政府之諮詢機關，國民黨並此諮詢式的機構亦必把持操縱而後快。國民黨之專政，既已比較俄德意三國之專政爲澈底，而其所以表現於政治上的事實，則爲因國民黨內部之糾紛，而引起內戰以招致外患，陷國家於今日這

種淒慘的境地，如周佛海先生所云：

「中國國民黨的罪惡，就是自從民國十六年以後，因為黨的內部糾紛，而引起接二連三的內戰！共產黨的猖獗，是不斷的內戰產生的；外禍的緊迫，是不斷的內戰引起的。民國十六年受了共產黨挑撥的當，演成了甯漢分裂。……等到十八年春天所謂「討桂」事件發生，比較上兩次，就多打了幾仗。以後在一年之中，接着發生了討馮之役和唐生智的叛變，在河南就打了多少次的血戰。到了十九年的中原大戰，無論在時間上或規模上，都是空前的內戰了。……產生兩個結果，第一，共產黨有了機會侵入長沙，有了機會在贛南蔓延發展，致演成到今天不但不能消滅，而且愈益猖獗的形勢。第二，因為中原大戰持久，雙方都不能下台，於為請東北軍入關以結束戰事。因為東北最高當局的入關，於是又造成瀋陽事變的機會。又因為瀋陽事變沒有毅然決然的方法去解決，只是一味的拖，於是就拖出了這次中日兩國的空前的仇殺。……內憂外患，從那裏來的？難道不是國民黨內部糾紛所產生的嗎……」

國民黨專政的結果如此，今後如果不肯改絃更張，而加強專政的作風，不顧一切的專制下去，恐怕不僅非國家之利，也非國民黨之福。彼俄國共產黨之專政，係基於共產黨的

中國何以不能實行民主政治

思想與理論，並且史太林政權之鞏固，是建築在他的建設成績上面。德國國社黨專政之成功，是因為德國於外受壓迫，經濟凋敝之餘，一般人民皆不滿意威瑪憲法下之共和政治，希特拉乘時而起，而能迅速表現成績，執政十年之間，即振揚國威於世界。意大利法西斯黨於打平共產黨後取得政權，墨索里尼對內對外之所表現亦頗不錯，而國內反對專政之勢力猶潛滋暗長，幾幾乎有乘此次大戰而起之勢，賴德國軍警之開入意國鎮壓而始未見騷動。國民黨的思想和理論既和俄國共產黨不同，即不必做法其專政。國民黨自十六年定都南京，主持國政已歷十七年，較諸德國國社黨於一九三三年始行執政多七年，而所表現適與德國國社黨相反，周佛海先生亦不諱言國民黨有罪惡，如此而欲中國國民絕對信賴國民黨專政，殆為情理及事勢之所不可能。中國今日共產黨的勢力已根深蒂固而瀰漫於全國，其他國民黨外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之反對一黨專政的運動，亦在不斷的猛進中，此固較諸意大利，反對法西斯黨專政之力量為顯明而雄厚。意大利法西斯黨的專政尚不免有動搖之象，國民黨如何能鞏固其專政制度。

因此之故，我們爲國家計，爲國民黨計，關於一黨專政制度，認爲有更改的必要。更改的途徑不外兩種；一爲無黨政治，卽自國民黨起之所有各黨各派完全解散，從新組織運用政治推進政治贊助政治的機構，彷彿日本之新體制。一卽民主政治，立卽還政於民，實施憲政，所有各黨各派之地位一律平等，自由活動。前者爲中國今日情勢之所絕不容許，後者爲中國近五十年來國民之所爭求而屢經波折未能實現，及今急起直追，尙未爲晚。其關鍵所在，全在國民黨之一

念耳。前述中國過去民主政治之所以不能實現，以袁世凱及其北洋派之破壞爲主要原因。如果再爲追溯，則滿清慈禧太后及其親貴之阻撓憲政，亦卽民主政治不能實現的原因。現在民主政治能否實現，完全以國民黨之願不願爲轉移。蓋今日之國民黨，卽處於當年北洋派的地位，今日國民黨的領袖，卽處於當年袁世凱的地位。我們謹以至誠的意思，請求國民黨的領袖不要作袁世凱，國民黨不作北洋派，而本着建立民國的本旨，立卽實行民主政治，永奠共和國基。

## 兩年來從政的感想

李守黑

時光快似流水，我們從事和運，不覺已屆三年。回憶當二十八年秋汪精衛先生蒞滬倡導和運，首先表示取消黨治，願與各黨各派及既成政權共商組府還都大計，同時并宣言以實現和平實施憲政爲兩大施政方針，以和平反共建國爲組府主要使命。汪先生是項國事主張，實與本黨二十年來所努力奮鬥之反對黨治反對共產主義之一貫政策相同；而實現和平，尤爲本黨主張解放東亞政策之先決條件。是以本黨留滬留平同志於同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上海召集幹部會議，一致贊助汪先生之主張，幷成立中央政治行動委員會，正式參加和平工作。在過去三年內，本黨同志雖竭盡智慮，以求和平之實現與憲政之實施，無如爲環境所限，未能廣集人力，本黨同志又屬初次從政，經驗不豐，以致事與願違，徒耗歲月，而於汪先生提示之兩大方針，未得有所盡力；於茲本黨十九週紀念日思之，實不勝慚慙之至。

上面我們已自承對於實現和平，雖竭盡其力，對於實施

兩年來從政的感想

憲政，雖竭盡其智，然而力有不逮，智有不週，時至今日，虛度歲月三年，和平固屬無期，憲政更屬渺茫。所以我今天在本黨建黨紀念日執筆寫回憶，真有無從著筆之感，無已祇有避開和運與參政兩大任務，來寫一點兩年來從政的事務梗概。

(甲)農礦部時期 農礦部乃新成立之部，一切法令條例，須待重訂；一切施政方針與事業計劃，須待規劃擬議，一切前維新政府實業部所移交之各附屬機關，亦亟須調整，加之時當還都之始，環境經費兩有不便，故在最初數月中，對於部務實難積極推進。嗣後雖經多方努力，擇要先行興辦，無如爲時未久，於次年（二十九年）八月又因中央機構之調整，農礦部裁撤而罷。總計我們在農礦部任內，前後一年又五個月，所興辦之事業及所擬具之計劃，今略舉於次：

一、擴充中央農業實驗所。

二、成立農業生管理局。

三、興辦國立原蠶種製造場。

四、設立女子蠶桑講習所。

五、恢復合衆蠶桑改良會。

六、實施蠶種檢驗與蠶繭評價。

七、舉辦鑛山產權登記。

八、辦理稻作講習會及稻作實驗區。

九、實施棉花評價。

十、擴充棉產改進會。

十一、獎勵荒地興墾。

十二、實施食糧增產與獎勵播種雜糧。

十三、保護耕牛并派員赴各地視察。

十四、設立中央林區管理局及模範林場。

其他計劃如興辦農鑛銀行，創立薄荷精鍊廠，恢復長興煤鑛，及太湖圩田興墾等，均以經費關係未能實現。

(乙)司法行政部時期 我們於三十年九月接任司法行政部，至本年三月卸任，共僅七閱月，除依照施政方針，整理各級法院，延攬原司法界人才，逐步推進外，其比較

具體而重要之事業，特略舉於次：

一、整飭上海第二特區地方法院。

二、接收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及江蘇高三分院。

三、查辦徐達泉弑兄案，并設法向法租界當局交涉上訴。

四、設法以行政手續糾正最高法院對哈同夫人遺產案之

裁定。

五、設法進行查辦前上海地方法院院長嚴掄魁瀆職案。

六、督飭各級法院勵行假釋條例與公證制度。

七、恢復江蘇第六監獄。

八、籌備恢復江蘇高等法院第五分院。

九、重定統一囚口糧辦法。

十、修訂訴訟費徵收條例。

十一、調整上海地方法院。

十二、計劃成立泰縣地方法院及高等分庭，又擬於首都

設置高等法院。

(丙)銓敘部時期 銓敘部在中央各部會中，職務最簡單，範圍亦最小；全部經費上半年度每月僅二萬八千元，下半年度雖月增五千元亦不過三萬三千元。但本部通常事

務，較之其他各部會，事實上則未見減少；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員之任用，須經本部銓敘審查合格後始能任命，加之本年又舉辦公務員甄別審查及離職公務員登記，事務更形繁重。計自我們接任銓敘部以來，迄今八閱月，已辦了甄別審查案件二萬餘件，再加以任用及登記兩項審查案件，其為數之鉅，可想而知。惟以經費奇絀，各職員減支最低級俸而辦兼人之事，部中設備又極簡陋，而經費又不許稍予充實，是為吾人對全體同人所最感歉咎而苦於無法盡力者也。

以上所述各節，乃我們分內所應為者；而且以兩年餘之時間，成績如此之微，雖然尚有許多計劃，因環境及經費關係未能舉辦，但在我們以國事為己任者觀之，實自覺慚愧之至。「為政不在多言」，我現在僅就我們兩年來的艱苦工作的過程中，尋求幾個要點，作為本文的結束。

第一是責任心。我們認為政務是一種工作，從政是來擔負這項工作的所以我們既然担任政務，我們就要腳踏實地去做事——工作。所以我們不計環境如何的艱難，也不問經費如何支絀，我們總是要竭力逐步做去，做成一件是

## 兩年來從政的感想

一件。譬如我們兩年來所主持的各機關，除中央農事實驗所每月列有一萬餘元事業費外，其餘則僅有人事費與辦公費而已。但是我們并不因為無事業費就不做事，蠶種場無飼育費，育蠶工作仍照原定計進行；農產局無開辦費，仍能如期成立辦公；司法部僅列有旅費五百元，仍能派員赴各地視察司法；我們接收上海第一特區法院，前後三個月，僅用去四萬餘元；這是我們為責任心所驅使，無論經費之有無大小，我們總要盡力去做，以完成我們的責任。

第二是正義感。正義在個人是一種正氣，在國家是一種綱紀。所以我們在處理公務時，只要正義所在，必力求貫徹。譬如徐達泉弑兄案及哈同夫人遺產案，彼時雖有種種恐嚇攻勢及謠言攻勢，我們為維持正義，絕不為所動搖，亦不願於報紙上張揚宣傳，自我誇耀；結果徐達泉案提起上訴，哈同夫人案中止進行，第二特區法院瀆職人員均交付偵查。上舉三案，均在我們離開司法行政部之前辦畢，是不幸也，亦大幸也。

第三是吃苦與忍耐。我們兩年來所主持之機關，除農蠶部外，均屬間曹冷缺，而農蠶部又苦於無事業費，可是

我們能安坐冷板凳清苦自守；我們能甘受閒言蜚語，從無事中找事做；前者是能吃苦，後者是能忍耐。不然以我們兩年來所處的境地而言，今日要我略舉如前面所述的幾種不算成績的成績，恐怕也不可能了。

所以責任心，正義感，以及吃苦與忍耐，是推進我們工作的動力，我們希望能永遠保持不替，來共同担負復興中國與解放東亞的大任。

### 悼成志達同志

愚公

幽燕湘鄂記同遊。患難相依閱六秋。投筆抽刀來歛壯。百身莫贖萬人愁。

成達聘同志號志達。安徽合肥人。東南大學畢業。曾任金陵軍官學校及東北講武堂教官，為人勇於負責，勤於治事，曾佐直魯當局任防緝事，華北得免於赤禍，志達與有力焉。民國二十二年雙十節前，偕予赴湘西舉義，旋駐漢口司交通事，予赴港，君乃獨返北平，視其眷屬，不數日遂為人所暗殺，予聞耗慟甚，不啻折一臂也。



# 唯誠救國論

關作璜

許多人曾這樣問：『我們要救中國，以何事爲當務之急？』答覆這個問題，最先是康梁這一批維新志士，以爲當以改革政制爲先，只要化君主專制爲君主立憲，則政治可期清明，一切可求進步了；然而結果是失敗的。其次便是清朝末葉的重臣李鴻章張之洞等，以爲當由步武歐美的船堅炮利入手，只要軍制軍備工業改良，政制不妨照舊，亦可以救中國，然結果又歸失敗。再其次便是辛亥前的革命黨人，以爲必先推翻君主專制，建立民主政體，纔有辦法；結果君主推翻了，政體改變了，而國家依然未能得救。於是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繼起，以爲單從政制或武備兩方面改革，仍不足以救中國；必須更進一步，從文化思想社會制度上改革着手，方足以謀復興，然結果僅得到破壞了許多傳統文化倫理觀念的效果，而未能建立新的適應的社會倫理觀念以代之，以至反形成全國上下思想徬徨行動脫軌的惡現象，至今未能安全。於是共產黨出，以爲苟不先從經濟制度謀改革，則一切改革

，都歸無用；然而共產黨的領導的革命行動，徒造成許多矛盾慘酷的悲劇，給人民以莫大的痛苦，增國家無窮的禍患。納粹運動與法西斯運動崛起於歐州後，於是又有人以爲欲救中國，非步武德義的全能政府不可，遂極力模仿德義，施行軍事政治經濟集中一權的政制，創立武裝黨員的政黨，施行統制經濟，統一思想，統一宣傳方針，形成獨裁政治；然而行之六七年，政治未見進步，糾紛愈益增加。而最壞的結果，則爲徒使野心專制的領袖，得攬權自恣的藉口；貪污蠶國的巨猾，藉獨裁政權爲護符；而備受剝削苦楚的民衆，不特無法抵抗，甚至無從申訴其冤苦；民衆所受苛酷的待遇，遂呈古今中外所未有的慘象，而其所中於國家的禍害，則更不可勝言。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我想凡是有頭腦有思考的國人，內心都有同此苦悶的感想。

從過去六十餘年改革運動的史實看，如果說改良政制即足以救中國，則法國式的內閣制，美國式的總統制，蘇維埃

式的一黨專政制，納粹式的一人獨裁制，都已嘗試過了；然而結果何嘗有補於國家。如果說改良經濟制度即足以救中國，則過去武漢政府的厲行聯俄，土地，農工三大政策，現在延安政府的種種措施，何曾收到實際上的效果。如果說埋頭建設即足以救中國，則過去實業救國，建設救國，交通救國，築路救國等口號，都曾為人們所提倡，曾為一時期或一局部的政治綱領，然結果則成效未收，已先為政治上的惡劣環境所破壞，反足證明如政局不安定，雖埋頭建設，仍不足以救國。如果說改善外交政策，借助外援，即足以救中國嗎？則過去六十餘年以來，聯俄，親美，親德，聯英，都已反復嘗試過了，然而至今未能為國家求得一光明出路，而反每每為強國所玩弄與利用。我中國民族，智慧並不後人。國際環境，這幾十年來，并非絕無機會。為什麼他們的國家，改革都可以成功，而我國的改革，則每每失敗？為什麼歐美各國的良法美制在他人行之，已迭著成效的，一到了中國，便都弊端百出，一無所成？這個問題，真值得我們下全副精神去研究。如這問題，得不到精確的答案，恐怕我國前途，將益趨暗淡。將來我們做了亡國奴，還不明亡國的緣故，豈

不可憐而又可歎！

依我這淺薄者的見解，以為時至今日，欲謀一切改革的成功，當先從民族質素的改革做起。如果民族質素不改變，則一切改革，將仍必徒勞無功。過去政制改革的所以無成，不盡是改革方案的不善，不盡是政治制度的不良，更不關機構的不完備，而是運用的不得其人。故政治改革，徒冒虛名而無實際。推而至於社會改革的失敗，建設事業的少成，其故皆由於此。在其他國家，政治一時的失常，政府人員一部的腐敗，然而民族質素大部份優良，或大部份未壞，故改革其機構，變更其人選，剔除一部腐壞的，即收其良效。然若民族質素大部份已壞，則機構雖善而人不靈，一部腐惡分子雖去，代而起的仍是壞的，結果當然無補於事。而且我國過去改革的不成，不特非關方案的不善，而實則任何改革方案，皆未嘗徹底實行。或名是而實非，或名實俱偽託，或託美名以行詐偽，或利用機會以遂私圖，故大事小事，公私組織，無不失敗。積長時期大多數的公私事業的失敗，以構成影響全國的大失敗。中國國事的愈弄愈壞，殆由於此。

然則欲謀民族質素的改革，當從何着手呢？欲答此問，

當先研究中國民族質素的惡劣，以何者爲最大的病根。中國民族最大的病根，不消說爲自私與虛僞。自私與虛僞，兩者相連，一而二二而一的。自私爲虛僞的動機；虛僞爲自私的結果。虛僞所以掩飾其自私，自私所以運用其虛僞。兩者交相爲用，於是一切事理，便無真正是非。一切措施，便無明確標準。一切行動，便無顯著趨向。故一切改革，無從奏功，國事前途，日趨黑暗，皆由於此。試舉例來講，如行政制度，以中央集權爲宜呢？還是以地方分權爲宜呢？集權要集到如何程度，分權要分到如何程度，纔適於國家政令的運用呢？在學理上，在國情上，如果真誠以國家的利害爲立場，作開誠虛心的討論，斷不會求不到精確的結論的。而且即使結論判斷錯了，也未嘗不可以修正，斷不至阻塞政制改革進步的前途的。但如果存半點私心，就得不到明確結論了。我國過去爲此問題，握中央政權的，每極力主張高度集權，而握地方政權的，又必主張極端分權。甚至堂堂政黨，未得政權時，高唱民主政體，議院政治，地方分權，達不到目的，不惜訴諸武力，造成分裂，以求貫徹其主張。然而一旦獲得政權後，卽痛詆民主，拒斥議會，厲行集權，而毫不自愧。

這顯足證明過去的主張分權，力爭民主，無非由於想奪取政權的一念之私，而不惜作虛僞的主張，爲朝三暮四的醜行，這樣自然引起政敵方面的模仿，交相爲僞，政制的改革，如何得明確的方針；既無明確的方針，則朝令夕更，典章無定，如何能有成功的希望？此一例也。又如外交政策，當日俄對立的時候，到底應和日以拒俄，抑當聯俄而備日？當日英暗悶的時候，究竟應親英美以抗日，抑當聯日以逐美英？如果虛心誠意，單純以國家民族前途的利害得失爲前提，斷不至求不到正確的路線的。可是以蘇聯指揮的第三國際爲背景的人們，極力鼓吹親俄，煽動排日。而藉英美的金融資本勢力以壟斷政權的大老，又堅持依附英美政策，不惜疏俄而排日。其尤甚的，更有因自身政治環境的改變，不惜由聯俄而轉言排俄，由親日而轉言排日。又有因政爭策略的運用，故採與其鬥爭對手方相反的政見，以別立門戶，你說和，我必須主戰，你主戰，我必主和，圖利私爭，不惜以國事爲兒戲。又有圖利用國民情感的趨向，作政治上的投機，故意採與其鬥爭對手方相同的政見，以迎合民衆一時的情感，而爭取政治上的地位，或自固其政治地位的，因此本不主戰，然你主

戰我也不能不主戰。在此情勢之下，每每發生言行相違前後矛盾的政治言論或行動，如口主戰而心欲和，或口主和而心欲戰。或明知不能戰，然因防政敵借以鼓動國民攻擊自己之故，不能不矯情主戰。或明明心欲和，然因避免反對者攻擊的藉口之故，而不能不否認謀和。這樣的勾心鬪角，以逞私爭，直把關係國家存亡民族生死的最大問題，作為政爭的工具，而不惜自陷國家於極度危險之地，亦竟有人公然為之，而且多人繼續不斷為之，而且利用政權，絕對禁止人民的批評與呼籲，橫暴至此，黑暗至此，國事前途，焉得不為此輩敗壞殆盡，此又一例也。又如經濟政策，當採自由放任主義呢？抑當採統制主義呢？要統制又當如何統制？在何地何時統制？何者應統制？何者不應統制？以如何為標準？以如何為適當的程度呢？在學理與國情上，也不難求得一適當的方案。然而在民間力倡自由放任，在政府力倡嚴密統制；甚至大批以官營商的人，對利於其所營的，則力主放任，害於其所營的，則厲行統制。或不應放任而放任，或不應統制而統制，或先放任而後統制，或先統制而後放任，變化莫測，出爾反爾，以便其操縱與營私。如是則一切經濟改革的方案，

又焉能有成功之望？此又一例也。此外如文化思想上的論爭，社會制度教育方針的討論，無不有人挾爭名爭利的私心，以主張為運用策略的工具，各逞異說，各散誑言，以求達其私心的目的，這些實例，更不勝枚舉。純誠愛國的民衆，唯知渴望改革的成功，期求國勢的進展，聞一般政論家外交家經濟家乃至各知識階級的言論，五花八門，言之成理，初時不期然而信仰之，附和之，更進而擁護之，又那裏曉得都為那些虛偽的指導者所騙，而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域呢？於是民衆雖具滿腔血誠，然黑幕揭穿，自不免由懊悔而失望，由失望而橫決，至是而國家民族危亡的程度，將必由此而增加；外力的壓迫更必由此而加重，那更不待言了。

時至今日，一切空論，已不復為人民所信任，故吾人欲求國家的得救，欲求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改革的成功，必當從改善民族的質素始。欲改善民族的質素，必先從革除虛偽與自私，而提倡公忠與誠實始。這雖是老生的常談，然實際上是萬古不磨的真理，在此時此際的中國尤為特別需要。汪主席的提倡新國民運動，時常以力行知恥誠樸沉毅訓示青年，力戒叫囂浮躁淺薄衝動的惡習，其着眼即在於此。

不過怎樣纔能屏除虛偽自私？怎樣纔能使人人都能竭盡忠誠，時時說實話做實事呢？這是一個最切要的問題，而絕不是空言理論所能倖致的。最扼要的關鍵，第一必須居高位握重權的人，以行動爲表率，以事實爲提倡，能以身作則。在上的能從事實上表現公忠體國的精神，樹立秉公心，說實話，做實事的模範，則草偃風從，全國風氣，必爲之一變。第二在上的自己固必須說實話做實事，同時尤須能獎勵他人說實話做實事，纔能轉移風氣；否則自己雖以爲已說實話，然嚴禁他人的指摘與論難，拒絕他人的查察與監督，排斥他人獻納的意見，惡聞不利於己或不便於己的忠言，這樣深閉固拒，予智自雄，只許自己說實話，不許他人說實話，結果必至自己的實話，也成爲虛話，而得不到良好的效果。因爲在上者既好諛而惡直，則在下的必詭詞以迎合，邀恩固寵，以行其奸；或緘口不言，以求免禍。這樣在上者所說的話雖忠實，而奉行者所行的不見得完全忠實，而在上的懵然無知，必至得到相反的效果，而無補於國事。第三，自己以爲已說實話，也容許他人說實話，然誰說得對，前說與後說，所說與所行，是否相符？有無矛盾？是否真正的忠實，還必須

有人監督？如果無監督的機關，排斥監督的機構，或這機構不能盡其職責，則在上者言行是否相符，動機是否公正，無人負責糾彈，仍不能促進說實話做實事的效果。第四，雖有人監督，然權力的行使，苟無節制的機構，則其效仍不顯。故權力的運用，必須有節制，操權的人，尤必須有容納相反意見的胸襟，接受監督，服從節制的雅量，方能收上下相維，層層節制的大效，而使一切內政外交軍事經濟的政策方案，獲得切實推行的效果。能如此則方案而善，固必能獲得成功；卽方案未盡善，亦必知其失敗癥結所在，使成爲下次成功之母。故全國上下，苟能人人屏絕私心，戒除矯僞，負責忠實，勤懇盡職，則無論何項改革，必得成功，卽方案不善，亦只遲速之分，終無不成之理，積長時期無量數之小成功，以構成影響全國的大成功，那也是必然的。中國將來國家的得救，民族的復興，亦必由於此。

然而今日的一般居高位握重權的人，却不肯如此。他們因爲過去會假託政制美名以利政爭，便以爲他人也是一樣。一切和自己相反或只相差的政見，都無非藉名想爭政權。於是嚴抱深閉固拒態度，排斥民主理論，排除監督與節制機關

；封鎖輿論，拒絕忠言，禁制申訴，偽造民意，包辦民衆團體，統制報道宣傳，而美其名爲集權，美其名爲統制，這種「愛國不許他人，成功必須自我」的心理，現在仍普遍的存在於許多負政治領導責任者的腦海中，而嚴厲執行着。於是全國上下，無人敢爲半句申訴痛苦之言，無人敢作半句相異之論。報紙只由官辦，團體盡變官廳。恭維以外無言論，捧場以外無主張。全國之大，說話的只有一二人，決策的也只有一二人，任何會議，監督的機關，都徒存形式。一人以爲是，則莫敢不是，一人以爲非，則莫敢不非。大小羣僚，工商士庶，唯有咽淚吞聲，忍氣飲泣，以求自存於極少數人之下。這樣的現象，變成全國無敢說真話之人，更安能望其忠誠努力以作實事，則必只有敷衍塞責。此種病象，此時已深入膏肓，處於無可挽救了！有心人方且憂憤徬徨，懼大禍之將至；而一部妄人，還懵然酣嬉自樂，以爲安富尊榮，可傳之百世，這真是亡國之徵，心死之象，最爲可痛的。

在全國上下，相率爲偽的今日，唯誠始可以救國。交相爲偽，必足以亡國。蓋必存誠，始敢說實話，做實事。必說實話，始能得真理，得正確方針。必做實事，始能收實效，無論成敗，均得明確的癥結，以爲改進而終底於成功之域。人人皆能說實話，則誰敢不公？誰敢拏政治主張爲私爭的工具？人人皆能做實事，則誰敢不盡責？誰敢怠忽職務，以身試法？故誠爲公忠之始，僞爲私慾之源。能存誠則一切良好政制，一切良好計劃，都可以成功。不能存誠，則任何政制任何計劃，都必歸失敗。國家的能否得救？民族的能否復興？只在政治當軸者的一轉念間而已。

然而欲存誠，則必自有罪己精神始，必自樂聞己過始，更必自有接受監督節制之雅量，容納反對異己言論之襟懷始。茫茫大地，袞袞羣公，誰能有此汪汪大度呢？我將寤寐以求之！執鞭以事之！

# 政治得失的衡量

許淨生

批判政治的得失，絕不是一件輕率的工作，因為政治所包括的範圍太廣，無論政治的理論和政策的實施，其所牽涉的事物太多，若祇舉其一端而加以論列，實難得到公允的結論，但是我們絕不能因為政治的批判是一件煩雜的工作，便可以馬馬虎虎，抱定「得過且過」的態度，混了過去，我們還是要設法把衡量政治得失的標準來研討一下。

## 理論的得失

任何政治思想的發生，都有兩種因素，一即「足以引起這種思想的環境背景」，二即「想起而改造這種認為尚有缺陷的現實的動機」，那麼基於這兩種因素而奠定的政治理論的優劣，便不是輕易可以批判的了。

我們知道政治是一種要見諸實行的東西，不能是一種空想，更不能是一種幻想，所以政治的理論一定要附着在一個實際的標的上，現在我們要談政治，不是要研究十萬年八萬

政治得失的衡量

年以後世界上應施行什麼政治，更不是要研究假使人類的心理狀況由於將來人類生理狀態變更而引起的變移以後應當採用什麼政治的問題。所以我們以為批判政治理論的優劣得失，祇有主要的三個條件，即1.是否合理的，2.是否人生的，3.是否針對現實的（即客觀的環境的），所謂合理的，就是合乎邏輯的，人生的，就是人間世的，談政治要以這個世界上的現有人類實況為對象；所謂針對現實的，就是談甲國的政治，一定要以甲國為標的，談乙國一定要以乙國的客觀環境為主，凡不合這三個條件的，雖然某種政治理論有多麼美妙的解說，多麼生動的誘惑，我們都祇能認為是一種無裨實際的空論，甚至於幻想。

在中國流行過的政治理論和施行過的政治體制，已有不少，比如說有主張君主專制可以救國的，所以有了洪憲的皇帝，有張勳捧出來的復辟；有主張蘇維埃制度可以救國的，所以有了蘇維埃的中國人民委員；也有主張獨裁可以挽救中國

的、所以也有過什麼大元帥，執政，等等，但是對內來說，中國人民的生活不但毫無改善，反到越來越苦，直鬧到顛沛流離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現狀，以對外來說，不但所謂的國際地位的自由平等根本夢想不到，就連最低限度的苟延殘喘的掙扎現局都大有所不能。我們探本求源，與其說這些政治理論的不好，反不如說是搬移和借用這些制度的那些人的不好。我們仔細探究這幾年來的政治往迹，便很容易發現一個很危險的病根，我們的危險不是我們的身體太弱，也不是我們太窮，更不是我們的智慧不如人，而是我們的最起碼的國家意識的不很明瞭，再痛心一點說，不但我們大多數的國民對於國家的意識不很清楚，甚至於負有指導國民重任的政治家們對於國家的意識應當怎樣堅固的把握着，似乎也還有了疑問。我們以為政治家最偉大的使命就是要指導大眾使他們認識他們與政治的關係，與國家的關係，更要喚起他們對於國家對於政治的同情，因為國家和政治的發源，自始就是基於一種共同利害和信仰而發生的一種同情。法國哲學家勒南 (Renan) 對於國家會下了一個很切近現代國家意義的解釋，他說：「一個國是一個靈魂，是一種精神的原則。」

(Principe Spirituel) 在意義上其實是相同的，能夠造成這個靈魂，這種精神的原則，一種是過去的，一種是現在的。前一種是一些公同所有對於過去很豐富的紀念，後一種是對於現在彼此的承諾，願意共同生活的承諾，願意共同繼續發輝光大前人遺業的承諾。一個人并不是立刻便成功這個樣子的。一個國也如同一個人是有很長遠的努力，犧牲和盡職的過去為他的基礎，所以一國人最重要的精神在不忘祖先，我們之有今日，何莫非祖宗之造就，一種英勇的過去，一些光耀歷史的偉人，這都是社會的基礎，為一國精神所系屬的，曾共有在過去的光榮而又有在現今的志願；曾共作了一些大事業而尚願再共作一些，這便是對於成立一個國家的主要條件：「怎樣能使大家追念過去，以眷念未來，怎樣喚起大眾對於這共同團體的同情與愛護，正是每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的使命。中國所急切需要的，正是這一點觀念，固然還有許多更遠大更動聽的政治理論，在將來的將來，中國或者也是需要，但是如前所論，不能針對現實的任何理論，我們實在不敢妄為贊同。」

有些人說，在中國現狀之下，無論什麼政治也不能挽救



中國，因為中國的國魂早已喪失了，這種說法，固屬痛心之論，然而我們仔細研究一下，中國的國魂，其實並沒有喪失，祇不過是失掉滋潤而已。

一個人的魂，是附着在那個人軀殼的深處，比較膠結在整個民族精神的中心點上的國魂容易想像一些，個人的靈魂——精神需要時的修養滋潤，而國家的國魂也時時需要更新滋潤，所以時代雖是不斷在變遷，但是富有修養精神的個人，總能拿集中的內在的隱力，抵擋任何外來的侵擾，而富有滋潤的國魂的國家，更能拿集結內在的潛力來抵抗任何外來的變故，其理由是一樣的。我們祇要翻閱中國任何朝代的正史，便隨時隨地的可以發現許許多多「至死不懈」的學者，「成仁取義」的俠士，和「博施濟衆」的仁人，其他稗官野史敘述這類事迹的就更不遑枚舉，這是講以往的，說到現在呢，還是一樣的情形，無論走到那裏，祇要不離開中國，便到處可以看見許許多多用極笨重的方法汗流浹背的在耕種着工作着的農人工人，但是他們既不怨天，又不尤人，父子相傳的自信必有收獲的「樂天苦幹」的工作着，更可以到處發現「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士，國魂是什麼，說起來好

像很抽象，其實細究起來，也不過就是這些人情風俗信仰習慣幾百年幾千年積聚下來的結晶或者他們的「昇華」罷了。所以中國民族幾千年歷史鑄成的品格，祇要用「自信」「勇敢」「博愛」幾個字就可以形容得差不多，而我們中國的國魂便就在這些東西的範圍裏面浸潤成長了。所可惜的，環境一天一天的在變，可是我們的國魂却總沒有得到一種滋潤，一種「積極精神的誘導」，於是自信便逐漸走上「畏縮不前」的路上去，「勇敢」便逐漸向「輕浮誇大」的路上走，而「博愛」便越走越離「不負責任」的路近了，於是這「國魂」的素質，便漸漸的黯淡下去，一點一點的消失下去，而「萎靡不振」「華而不實」的兩頂輕鬆的高帽子，便不知不覺的戴到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頭上。所以我們知道這國魂并不是完全喪失了，實是失掉一種積極精神的誘導，也就是失掉一種「正確目標」的滋潤。沒有正確目標的努力，等於不努力，沒有針對病痛的治療，等於不治療，我們的病痛，正如同以前日本，德國，土耳其，意大利等所患的病痛一樣，他們復興的歷史告訴我們，他們不能借重別人的力量以復興，他們祇有借重他們民族原有的力量，加以集中，賦與「國

家至上」的一個標的，領導前進，難關重重，但是終能衝出重圍，中日邦交的恢復，中國正應當積極效法日本的這種「國家至上」「自力更生」的偉大精神，所以任何政治理論，在現狀的中國來看，凡不能以「國家高於一切」或「國權高於一切」的，都難使吾人相信為一種好的政治理論。

國際聯盟失敗了，並不是因為聯盟本身失敗了，而是因為組織聯盟的英國，究竟不能因為維護聯盟而使英國吃虧，更不能因為主張所謂的「公道」而使英國以外的他國佔了便宜，德蘇的合作協定，和德蘇的戰爭，兩個主人翁雖毫無變更，但是德國究竟還是德國，蘇聯究竟還是蘇聯，第三國際在西班牙的搗亂，結果所得到的，究竟還是西班牙整個國家的統一，所以我們更可以知道，無論任何政治理論想在「國家」的頭上套點東西，其結果還是不能使原來的「國家」改變樣子。

## 信念和決心

革命者信仰一種主義，絕不是偶然的，也更不是強迫注入的，而是他衷心誠懇的把他所瞭解而信仰的那個主義看成

一種真理，他不但要澈底的探求追索這個真理被發現的始末，他還要把維護這個真理的信念永久的熾烈的燃着，以堅固不拔的決心來推行這個真理，使這個真理被一致的瞭解而被採用，藉以發生這真理應有的效能，固然沒有澈底的瞭解這個真理是不會發生維護這個真理的信念，但是僅僅有了信念而無誓死的決心，這個真理無論如何是不會奠定他的基礎的。

同樣的，政治家推行一種政治主張，也絕不是偶然的，突如的，在他把政綱政策發表以前，換句話說，就是在他相信這個政綱政策是一種真理以前，他一定要很縝密的思考，研究過這個政綱政策，他不但要在自己確信這是一種真理，他還要用「貨真價實」的方法來使大眾都相信這是一個真理，要想達到這種目的，固然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政治方式，但是歸根追究起來，還是祇有這維護真理的信念和決心，才有確實可靠的作用，歷史告訴我們的事例，很可以拿來作憑據。

說到民國卅年來的政治，真是波瀾起伏，千奇萬變，種子不知播了多少，可是究竟收獲了些什麼，實在難於置答，

假使我們把三十年來前後當局已經發表的那些政綱政策和會議的宣言主張，很耐煩的收集起來，的確可稱「洋洋灑灑」「蔚然大觀」，所可惜的，那些政綱和宣言，不但未能使大多數的國民相信他們是些真理，就連那些政綱政策宣言的原製造者，有很多的時候，也不一定相信那些政綱政策和宣言所主張的是些真理，他們所作到的，不過是把那些所謂政綱政策，類似機械式的，甚至意識不很完全的發佈而已，事前既沒有澈底的瞭解那些政綱政策，事後更談不到什麼維護那些主張的信念和決心，結果祇有無聲無臭的失敗，我們可以說，這種政綱政策越多，政治越糊塗，國家的元氣越受傷！但是有些時候，這些政治家們，似乎也把那些政綱政策在發表以前，曾經過思考，但是一經實行，障礙來了，破壞來了，他們馬上疑慮起來，不但把原有的一點發動力完全制止，有些時候，還要把原推行的方向根本反轉過來，照着這些障礙和破壞力量所指示的方向去作整個的反推動，其結果遂使整個的政治脫離了軌道，不但失掉大家對於整個政治的信仰，簡直可以把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命斷送掉，比如說，由「清黨反共」的路綫，居然會走到「國共合作」的路綫的事實，

### 政治得失的衡量

便是當局缺乏一貫信念和決心的錯誤所促成的，所以製造政治理論，介紹政治理論，判斷政治理論的優劣，固是要緊，但是這維護政治理論的信念和決心就更要緊了。

### 理智和情感

已經有了好的政治理論，而且有了維護這個政治理論的信念和決心，但是政治實施的結果，有些時候還是得不償失，就是所得的結果，常不能如事前的預期，這裏隱藏着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便是，理智和情感運用之是否得宜。

我們知道推行政治方式雖然很多，但是推行政治的終極目的，似乎應該是「以條理的方法，積極的手段，處理公眾所需要，處理的事務，使之對公眾發生福利的效果。」假使這種說法是合理的話，那麼受了公眾所付託（無論付託的方式如何）浸潤在政治生活裏面的人們應當怎樣運用他們的理智和情感以達成這種任務，便值得考慮研究了。

人類生來就先理智而具有情感的本性，世間許多偉大的事業也更非有熱烈的情感的贊助很難成就，可惜情感是一種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千變萬化，捉摸無定的怪物，成事固非

他不可，而敗事的主要因子，更非他莫屬。所以我們很容易知道，這「成」與「敗」雖都有「情感」加入的作用，但是除了「情感」之外，一定還有別種很重要的因素存在着。我們姑且先舉個很生動的敘事來證明這個因素的重要：

「叔孫相魯，費而主斷，其所愛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妒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壬固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妒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以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

在這段敘述裏，我們祇看得見叔孫的「怒」和「殺」，他的情感非常豐富，但是他所缺乏的，正是這裏認為很重要

的「理智」，我們以為政治家固需要本身有好的理智，有健全的思攷力，但是我們覺得他更應當設法造成一種他可以利用別人好的理智的環境，「自是之見」常是「誤盡蒼生」的禍首。因為這「自是之見」裏面所包括的，常不是「理智之見」而是「感情之見」凡肯盡量利用別人的理智的政治家，常是最偉大的政治家。我們現在來看一個肯於接受別人理智的場面：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汝欲寡人之哽耶？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于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撥木而貫櫛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燼，炭火盡赤虹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財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

在這裏，我們首先發覺的是文公的情感，但是他不像前面的叔孫，他自己雖不能馬上辨別事情，他却能造成利用別人理智的環境，所以不會把事情弄錯。

固然也有本身很明達，理智很迅速，思考力很豐富的政治家，他的感情的發動，很難被人發覺，好像他祇有理智，

而無感情，我們且看底下一段的敘述：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尙宰人也。」

「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尙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之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尙浴免，則臣得而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在這兩段裏，我們祇看得見僖侯的「理智」。

這樣說來，好像祇有「理智」才是有益的，「情感」祇是有害而無益的，其實這又不盡然了。所以有些人主張說：

「中國民族的生活，常是呆板鈍滯的，沈寂悶鬱的，因爲缺乏感情生活，所以缺乏生氣與勇氣，遂至願意關心政治以至實際參加政治的人數少到幾至令人難以相信的程度，其結果政治便永是混亂，永不能走到應走的軌道上去。對症的治療方法祇有積極設法把民族的感情生活培養起來。」

的確，人類的整個生活假如用嚴格的理智把一切的情感抑制了，那麼活潑進取的生氣和勇敢鬥爭的精神，便很難產生出來，不但政治無從建設，就連整個民族的存續都要發生嚴重的危險，所以說積極培養民族的感情生活，確是促進政

政治得失的衡量

治建設方策之一種，但是已往中國政治的混亂，無效果，正是前面說的那種祇有「情感」沒有「理智」的政治的結果。換句話說，也就是「理智」和「情感」，配搭的不得當的結果，那麼「理智」和「情感」究竟要怎樣配搭才最適當，最有效果呢？我們且來研究一下。

我們要想解答「理智」和「情感」最適當，最有效果的配搭方法，我們應當先把「理智」和「情感」一切可能的配搭方法來分析研究不可。

情感和理智，除了（1.）兩者各自獨立，各不相犯外，還可以有（2.）情感爲主，理智爲從，（3.）理智爲主，情感爲從的兩種配搭方式，底下分別加以說明：

「情感和理智，完全對立，各行其是，各不相犯」，在這種環境裏，情感和理智常要背道而馳，在心理學上，這種現象，叫作「自我完整之破裂」，這是患精神病者常有的現象，也就是變態心理學上所謂的「多種人格」的說法。這種配搭方式，自始就是病態，不但在政治生活裏的人不應有也不會有，就是一個病人遭遇這種病況也是十分痛苦，在這裏不必贅論。

「情感爲主，理智爲從」，在這樣的配搭方式裏，理智是要絕對服從情感，換句話說，就是無論情感怎樣的發動，進行，終了，理智都要隨時贊助，隨時批准。就像以前刑法上的「恐怖說」，倫理學上的「快樂說」，都是以這種理論作出發點的。比如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這「愛」與「惡」的對象，完全是同一個人，但是情感要「愛」的時候，「理智」不但要贊助這「愛」，批准這「愛」，還要進而替「情感」揣想出許多「可愛的理由」，並且要很誠懇的替「情感」祈禱他所愛的那個人「永生不滅」。可是一旦「情感」把「愛」變成「惡」了，那麼「理智」便馬上要把以前的「愛」的批准原案撤消，把以前替「情感」想出來的那些「可愛的理由」一律打倒，立刻贊助「情感」的「惡」，那時把「惡」批准，跟着就要替「情感」想出許多「似是而非」的「可惡的理由」，並且還要希冀那被「情感」所「惡」的人「立墮輪迴」。其實這些「可愛的理由」，和「可惡的理由」，都是些似是而非的，「自己愚弄自己的」，早已失掉「理性」，不過是一種「自解」，「自便」的「戲法」，這種現象在心理學上叫作「虛偽的

推理」，在我們人類的日常生活中，這種現象很容易發現。我們以往政治的混亂，這「虛偽的推理」正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們且舉個例來說：

「洪憲皇帝」在「登極」以前，不但各省反對，「陛下」知道的很清楚，就連北京城圈裏的老百姓們是否絕對贊成，「陛下」也很明白，並且「帝制不會成功」的「陰影」，也深深的印在「陛下」的「理智」上面，但是因爲「陛下」的「情感」發出了「抓着王冠」的命令，一經行到「陛下」的「理智」的時候，「陛下」的理智，馬上服從了，馬上批准了，並且立刻替「陛下」的「情感」，想出所謂的「非仰合天心，俯從民意，不足以安社稷」的許多「理由」來，於是「陛下」的「情感」的主張有了護符，一切實現了。這就是「情感爲主，理智爲從」的配搭方式產出來的，這當然是要不得的，不待細說了。

「理智爲主，情感爲從」，在這種原則之下，可以有三種次序的配搭方式：（一）在情感發動之前，先由理智負責考慮并判定該事件之合理與否，可行與否，再命令情感分別發動或不發動，或爲某種特定性之發動，（二）事件一經到

來，情感一面開始發動，一面理智同時加以判斷其是非，其是者可由情感繼續發動，其非者情感即行終止，（三）情感既經發動終了之後，再由理智加以判斷，其是者可命令情感以後同樣的發動，其非者以後不再為同樣的發動。這三種次序，自然以第一種為最偉大，因為這樣配搭的結果祇會引到合理的正途，其次便是第二種的次序，事件之到來，先用情感來接受，再用理智來處理，尙可以說「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可是第三種次序，便要「得失參半」，其結果已遠不及第一第二兩種了。

政治的本性，是活動的，在時間上既是前後有絕對的因果連繫，而在空間上更是像「水銀洩地，無孔不入」，有向各方面的伸展磨擦，所以浸潤在政治生活裏面的人們所遭遇的環境常是錯綜複雜的，而且是瞬息萬變的，任何事件之到來，既需以「冷靜」的理智來接受，更需以熱烈的情感來處置。因為不接受，便很可能的，把最適宜的機會失掉，不處置，便永不會發生所需要的最大的效果，接受既不容易，而處置尤見其難。有人認為「理智」比「情感」來得重要，所以就有「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的說法，這裏的「

道法」便是「理智」所指示的道路，而「愛惡」便是情感的表示了。但是雖然有了「道法」，假使不用熱烈的情感去推行這「道法」，那麼「道法」的效果，還是很難產出來，所以「情感」和「理智」還是非要「相依為用」而不能「頃刻分離」的。

### 真理的維護

前面已經說過，政治的終極的目的，是要謀公衆的福利。所謂公衆，便是指全體不可能時，全體中之大多數而言，要想達到這種目的，就不能不使這公衆的意思可以很自由的表示出來，因為假使公衆的意思不能表示出來，那麼公衆所需要的的是什麼，既不清楚，則所謂公衆的福利的目標便很難加以確定了。「民主政治」的主要着眼點，就是針對着這一個觀念。在全民政治的民主制度裏面，祇要是一個國民，他便有與別的國民同等的運用理智的機會。他可以把自己思考的結果和需要的目標很自由的發表出來，提供大眾的考量。這許多理智思考的總結果，我們相信不但可以有制壓任何少數人的情感弱點的力量，並且還有激發可以推動這大眾思考

總結結果所需要的熱烈情感，所以在這種政治環境裏，我們最容易得到理智與情感最適當的運用方法。

有些人說，民主政治落伍了，政制的組織太雜亂，事權不集中，所以「事倍而功半」，在這種環境裏，運用「理智」的人和機會都太多，所以很難用有效的方法來歸納這些「理智」思考的結果，更不容易把這些很複雜的思考的結果去命令千萬人用熱烈的「情感」來推行。所以世界上已經有好些地方改絃更張另施行一種與民主政治體制不同的政制了，祇看那些地方施行這種新政制已經有了很多的一「成就」，便可以證明那些制度的成功。這種說法，固然也有他們的見解，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的，便是前面說的「政治的終極目的，是在謀公衆的福利」，那些施行與民主政治體制不同的地方，已經表現出來的所謂的「成就」，究竟是否足以代表那地方的大多數人真正的意志和實際的需要，既然還有相當的疑問，那麼是否那些人的福利已經達成，當然就更有問題了。換句話說，我們要求的最大目標是「全民福利國家的建設」，也就是上面說的政治的終極目的，這是要造成能使全民自由表示意思，運用理智，激發情感的一種政治環境，而不是

要求一種以一個人或極少數人的「偶然的刺激」，來制壓大多數人的理智而完成的「偶然的興奮」，如像前面說的那種「成就」一樣。我們認為在全民政治的民主制度裏面，多數人的「理智」很容易制壓少數人的「情感」的弱點，因為前面說的那些「虛偽的推理」「自解的愚昧」也就比較在其他政治制度的環境裏面，容易避免。

總之，政治得失的衡量，就要看政治理論的優劣，負責人有無維護好的政治理論的信念和決心，和運用他的理論和情感的是否得宜幾點為準，雖很煩雜，但究竟還是有系統的。

在這支離破碎，危急存亡，繫於一髮的時候，「反共建國，實施憲政」「集中全國公意，養成民主政治」的政綱，終於被發現了，這種政綱，可以說是民國卅年來具有自由意思的大多數國民所大聲急呼，甚至許多革命鬥士前仆後繼的所要求的對象——這種政綱主張，不但原發現者，是以崇高的理想作出發點，并用犀利的見解，縝密的思考，確切的認定他是一種真理，就是在主張這種政綱政策的政府目前力量尚不能達到的許多地方，也已經有了很廣大的民衆在深信這種



政綱爲真理了。所以我們可以說這真理的被發現，被認定是毫無疑義的了，換句話說，就是，好的政治理論的被發現被認定，是毫無疑義了。

國府還都兩年來的設施，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觀察，都可以發現各部門計劃的推進，完全是以這個真理爲鵠的，固然我們不能說推行這些計劃的結果，已經得到完全合於理想標準的收穫，但是在這短短兩年的過程中，內外環境所給予的

一些障礙和破壞，的確初步的測驗了我們對於維護這個真理的信念的有無。我們相信，這種測驗，還要「與時俱進」的加重他的程度，來襲擊這個包含着三十年來全國多數人民誓死力爭的「實施憲政」的真理，而這個真理的能否被奠定被實施，就要看負責者怎樣樹起他們的維護這個真理的決心，和怎樣運用他們的理智與情感了！

# 中外人士之中國青年黨觀

## (一) 國內左右兩派之中國青年黨觀

張吾軍

「晉文蘇武兩流亡，若論年光我更長；

冰雪餐餘情偽悉，直須穩渡太平洋。」

這是本黨領袖曾琦先生前兩年養病昆明時所作的「旅滇雜詩」之一。在紀念本黨建黨十九週年的今日，我們誦讀這一首詩，不禁引起無限的感慨！想當年蘇武先生身陷異域，持節牧羊，歷時十九年，纔得重回漢室，晉文公出亡在外，也足足有十九個年頭，左傳上說：「重耳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我們青年黨從創黨到現在，也恰巧有了十九年，在這十九年中，我們身受種種壓迫與殘害，含辛茹苦，堅忍奮鬥，何嘗不是備嘗了險阻艱難？其詳細經過，一時也難以盡述。

但是我們國家主義者，向來主張一切「以國家為前提」

，不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根本沒有急切近利的思想，有利於黨而無利於國的事，是我們所絕對不願為而且不屑為的。所以本黨十九年來，還沒有有過一次成功，還沒有取得過一次政權，因而不免為崇拜權位和過於重視已成勢力者所輕視。但我們當初組黨的目的在於救國救民，並不是為的爭權爭利。我們的所作所為，只須叩諸良知，問心無愧，雅不願多所表白。

不過輕視者儘管輕視，而本黨的真正價值和過去的苦心孤詣自為有識者所深知。例如中國國家社會黨領袖張君勱先生，便是最了解本黨最同情本黨者之一。張先生去年從雲南

特撰一文寄到香港，遙祝本黨領袖曾琦先生的五十大壽，那篇文章，很有意義，茲錄於下：

「蒼山雪，洱海月，號爲國中山水之美者也。余遊而樂焉，乃擇之爲講學之地。今居此者，有年矣。顧迤西山水，雖爽心悅目，而夙興夜寐之中，遙想長江東端之吳越，則又慨然長嘆曰：「今而後其尚有還我故鄉，祭掃祖宗廬墓之一日乎？」抑更有時在念中之朋友，抑鬱之餘，負於東南海中香港島上，以繼續其艱難奮鬥之生活者，則曾君慕韓也。民國十三年以後，國中政治之分野，一曰容共，二曰反共。容共者，受俄國之援助，樹階級鬥爭社會改造之幟。慕韓與余則以爲中國之隱憂在外患，所以指導國人者，當以國家爲本位，而打倒資本家與地主，非病根之所在。時國中之大黨，爲國民黨，爲共產黨，既攜手矣，於是容共主張，熾赫一時。慕韓與舜生幼椿等於舊政黨衰落之餘，忽焉崛起，與容共者對峙，號曰國家主義派。余嘉其志之卓而行之勇，而亦從旁助之。於今屈指計之，已逾十有五載矣。方今國難臨頭，痛定思痛之後，追論往日之主張，則容共者是非乎？反共者是非乎？容共者有功乎？反共者有功乎？然政治上之是非，不決於理論，而決於成敗。成而有權也，雖非亦是，雖罪亦功；敗而無權也，雖是亦非，雖功亦罪。近二十年吾輩之所以不得稍伸其志，並首

### 國內左右兩派之中國青年黨觀

領常若不能自保者，豈不以此歟！」

國社黨和青年黨都是「以國家爲本位」，都是主張「民主政治」，在政治主張上本來大同小異，兩黨今日所處的環境，亦復相同。張先生這篇文章，正說明了兩黨的關係是如何的親密，兩黨領袖的友誼是如何的真誠。

其實張先生與曾先生的友誼，是淵源於一代文豪梁任公先生的，梁張兩先生的關係，盡人皆知，無待贅言。而梁曾兩先生的關係，外間知者，或尙不多。民國六年，曾先生留學日本，在房州海濱曾有一封萬言書寄給任公先生，陳述其對於國事的意見，當時任公先生正在上海，立刻覆信，那信的內容是：

「得手書，字字悉如鄙懷，而所以匡其不逮者且無量。再聞善言則拜，况聞而至再者哉！下走謹再拜服之無斃矣。」

由這封信，可以看出任公先生的虛懷若谷，和對曾先生的傾倒之忱，大有歐陽文忠公對待王荊公的意味。任公先生的愛才如命，也可以由此窺出一斑。

任公先生是立憲派領袖。至於革命派領袖章太炎先生對於曾先生更爲器重。太炎先生生平目空一切，對於當世人物，

向來是少所許可的，但他獨對曾先生期許甚殷，特別關切。民國十七年曾先生赴香港，太炎先生有親筆信致廣東銀行行長陸蓬山，鄭重介紹，期其相助。信中說：「慕韓之志得行，國事其庶處有豸乎。」不料陸蓬山稱病不見，這封信至今還由曾先生保留着，作為紀念。外間每有人誤認青年黨常得資本家的支援，其實完全與事實不符。因為青年黨并不主張資本主義，而中國的資本家又根本沒有所謂階級意識，對於政治，從不關心，見了在野黨就害怕，那裏會解囊相助呢？太炎先生又嘗致函南北各省的軍事領袖，力為曾先生游揚，函中有云：「慕韓崛起，獨樹一幟，國共兩黨，視同敵國。祈加優禮，以扶正氣。」這幾句話很引起各方面的共鳴。據聞太炎一生祇心許兩個人，前惟宋教仁，後惟曾先生。所以曾先生在他逝世以後他的聯語也推崇備至，聯云：「繼黃梨洲顧炎武而興，著書自足傳千古；」「與孫中山黃克強並起，建國誰能沒大勳！」這聯語，不單是表示酬答私誼，而且含有表彰公道的意義。

以上所舉的張君勸先生，梁任公先生，和章太炎先生，可以說是右派的代表人物，他們對於青年黨所倡導的國家主義

運動，不惟承認其價值，而且予以精神上的鼓勵和事實上的幫助，梁章兩先生雖已先後作古，還是值得我們時時刻刻紀念的。

至於左派的政治主張，原和青年黨大有歧異，但對於反對專政獨裁這一點，則觀點相同。所以在重慶國民參政會裏，在野的左右兩派是往還很密的。例如左派的文壇健將前生活周刊編者鄒韜奮先生，便對青年黨的三大領袖，有深刻的認識，他在「抗戰以來」一書裏，有這樣一段評語：

「青年黨被請的有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陳啓天，常乃德諸先生。余陳常都是教育家。講到青年黨的代表人物，一般常稱「曾左李」，這的確是一件湊巧的趣事。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三位「大亨」曾極一時之盛，現在青年黨也有了他們的「曾左李」。朋友們見到他們時也往往稱呼他們為曾公，左公，李公，以示尊崇。曾公善詩文，雍容雅度，沈着持重，對國事常能平心靜氣，把握癥結而下恰當公平的結論。左公原為著名的歷史教授，風行一時的醒獅報的文壇健將，每論政治問題，慷慨激昂，怒髮衝冠。他是一位極富有正義的朋友，他談起沈老先生（鈞儒）總是慨嘆道：「愛國愛民的沈先生！我實在替你擔心啊！」李公是深沉的一流人物，思慮周到，不露聲色，有人說李公有一肚

子的謀略，而在表面上絲毫不露圭角。青年黨的三傑，確有他們的特色。」（鄒韜奮著「抗戰以來」第三十一頁）

去年曾先生到了香港，展開「民主政團大同盟」的活動，和左派詩人柳亞子先生結為詩友，互相酬唱，傳為美談。

當時柳先生祝曾先生五十壽辰詩，有云：「羞見公孫霸西蜀，尙遲諸葛起南陽。」竟以諸葛孔明相期，其尊崇可想而知。以上所舉的鄒韜奮先生和柳亞子先生可以算是左派的代表人物，他們對於本黨和本黨的領袖同樣的承認其價值而加以尊重。

可是關於青年黨的力量問題，外間揣測多端，有人以為青年黨根本無力量，有人以為青年黨雖有力量而僅偏於教育方面，因為他們看到青年黨有不少教育家，尤其發揮教育理論的著述，為全國人士所稱道，如余家菊先生著書有四十餘種，陳啓天先生著書有二十餘種，所著各書，風靡一時，因此一般人便以為青年黨的力量僅限於教育界。又有人以為青年黨的力量偏於軍事方面，因為他們看到青年黨的軍事同志一批一批的從五省聯軍軍官學校，雲南講武堂，東北講武堂，日本士官學校，各軍隨營學校等畢業出來，又一批一批的插入各軍去服務。尤其在蔣介石的嫡系軍隊及中央軍官學校

國內左右兩派之中國青年黨觀

裏，時常發現青年黨黨員的蹤跡，而強迫他們「具結悔過」，一時傳說青年黨所養成的軍事人才，也有一萬左右，這是蔣介石所最感頭痛的。

究竟青年黨的軍事力量有多少呢？這是本黨的最高機密，祇有本黨的最高幹部纔清楚，筆者不敢妄談。不過就反對方面的觀察，亦值得一提，例如上海的藍衣社要角陳恭澍，於自首後所寫的「藍衣社內幕」一書，其中就有兩段涉及青年黨的問題，其一是：

「二十三年，青年黨首腦曾琦，曾借濟南訓練黨員，入省府供為上賓，從韓的荷包拿出黨費，還特派最有權威的幹部程志遠到平津一帶，網羅青年，大肆活動，未料被北平藍衣社偵悉了而將程反擊斃命，又由濟南的藍衣社把曾琦一羣人，威脅走，韓的「幹部」活動遂一時中止。」（見「藍衣社內幕」第八二頁）

另外一段是藍衣社北方負責人王天木的自述：

「義勇軍興，東北救國協會實主持之，他們命令，私洽我友王化一等，祇要宣傳，募捐，辦青年黨，三項工作。」

戴笠遂以制裁青年黨，邀功蔣氏。

蔣氏遂以策動義勇軍邀譽國民。」（見「藍衣社內幕」第一二〇頁）

關於前面一段所說的程志達，係成志達同志之誤，藍衣社方面已經承認是他們暗殺的。至於後面一段所說：「戴笠以制裁青年黨邀功蔣氏」，可見戴笠的功名富貴是拜青年黨之賜，蔣介石的權勢威名，也是拜青年黨之賜，我們想不到青年黨竟被他們這樣重視，更想不到竟被他們這樣作為獵官沾名的工具！

最近又有人在上海報紙上寫了一篇「青年黨內幕」，那篇文字的口吻也并非盡出於善意的，茲抄錄幾段在下面：

「中國青年黨那似乎比國家社會黨的歷史還要悠久，大約在民國十二年吧，左舜生與曾琦，陳啓天，余家菊，李璜等人，即提出中國青年黨的主張。並出版「醒獅」雜誌，「提倡國家主義，認為國家是超越階級而存在的，是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是人類中的最高理想，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

「民國念年的前後，「青年黨」曾經在北方一帶與張學良打得火熱，那時，張也有在北方登基，成為土皇帝的意思。據說，張曾經一次付給青年黨一百萬元的活動費，而在國內各大學校中從事組織與收買羣衆的工作。但是，到了「九一八」事變以後，張的土皇帝夢被敲碎了，青年黨好夢也自然跟着「一齊毀滅」。

「這以後，據說與于學忠又結不解緣，于雖然沒有張學良那

麼一次付一百萬元的大魄力，但是，那時人們都知道于學忠的部隊便是等於中國青年黨的部隊的……。

「事變以前，據說，「中國青年黨」又在四川軍人中握有實力，原因是曾琦與李璜二人是四川人，與四川軍人素有來往，他們一會兒聯絡劉湘打倒劉文輝，一會兒又聯絡劉文輝打倒劉湘，朝三暮四，翻來覆去，也玩了不少的鬼把戲……。

「更由鄒韜奮，曾琦，梁漱溟等人，在香港展開了反滬運動，並出版機關刊物「光明報」，一時真是鬧得轟轟烈烈。渝方除了對留在重慶的張，左等人行動加以秘密的監視外，也不敢有過份的取締行動，只是由私人的口中，對該「民主政團大同盟」加以抨擊罷了。」（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新中國報載「國社黨青年黨內幕」）

從上面這幾段文字裏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照他說來，張學良曾經一次付給青年黨一百萬元的活動費，于學忠的軍隊等於是青年黨的部隊；那麼青年黨往年在華北又有黨費，又有黨軍，其聲勢似乎是浩大極了，力量似乎是雄厚極了。第二，照他說來，青年黨一會兒聯絡劉湘打倒劉文輝，一會兒又聯絡劉文輝打倒劉湘，似乎青年黨的力量，足以左右四川的政局，操縱四川的內亂。事實的真象究竟如何，我們

姑且不談，然而該文作者對於青年黨這樣過譽，我們是感覺萬分惶愧的。

我們常覺有些人對於青年黨的估價，有時看得太輕，有時又看得太重，而在我們青年黨人看來，則我行我素，從來不計較任何毀譽，所謂「譽之不加增，毀之不加減」，我們始終抱着這個信條，不作誇大虛偽的宣傳。究竟有力量無力量，一向任人揣測，從來不加申辯。我們深信左右兩派人士對於青年黨的評價和期望有相當的真切的。

不過有人說，蔣介石對青年黨領袖曾琦先生的認識不足，頗似曹孟德之對劉玄德。因為蔣氏有時視曾先生為無用的書生，有時又認作和他爭天下的勁敵，恰似曹操青梅煮酒論英雄的時候，說出：「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那樣的重視玄德；後來看見劉備開書失箸，閉門種菜，又覺得他懦弱無能。我們讀三國志陳壽評劉備云：「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機權幹略不及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惟競利，且以避害云爾。」所謂「非惟競利，且以避害，」可見曹操對劉備同樣的認識不足。其實據筆者

國內左右兩派之中國青年黨觀

所知，曾先生既非百無一用的書生，又非存心爭天下的英雄，他生平所用的一切功夫，都是近代政治家的修養。他曾把歷史上的物分爲兩類，第一類是英雄式，帝王式，第二類是聖賢式，宰輔式。第一類人物，志在打江山，爭天下，如劉邦，朱元璋等可爲代表；第二類人物，志在用其所學，治國平天下，如伊尹，周公，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曾國藩等可爲代表。我們深知曾先生是屬於第二類，決非第一類的人物，因此他決沒有打江山不居人下的思想。他常常勉勵同志說：「我們應該有責任心而無虛榮心，有事業心而無利祿心。」他既無虛榮心和利祿心，當然沒有力爭第一把交椅的必要。他之所以要組黨，不過爲的救國救民，一心一意要把中國造成一個近代國家。他常說，我們應以主張爲進退，凡不違背我們宗旨和主張的，對任何人都樂於扶助，我們試一考察他過去三十年的活動經過，沒有一件事不是言出由衷，本諸至誠的。否則他十八歲即蜚聲論壇，三十歲即名聞全國，何以至今還能安於布衣的生活而怡然自樂？這便是他的修養工夫有超越常人之處。我們記得他舊作雜感詩中，有一首說：「偶從六一話歸田，海外東坡幾謫遷，檢點平生羞自

信，白衣宜至白衣還。」他不但以布衣爲賤，而且以布衣自豪。如果他真有虛榮心和利祿心，以他的聲望才學，恐怕早已策高足而登要路了。

本來一個未成功的人物，是不容易被別人認識的。莫說具有學者風格的聖賢式人物，就是具有流氓風格的漢高祖，當他未唱大風歌以前，他的第一位佐命功臣蕭何還不是曾罵過他「劉季故多大言少成事」嗎？大家總還記得清末的王公大臣，曾目孫中山先生爲「海盜」，就是民國成立以後，孫先生也還被人呼爲「大砲」，說他是一個「空想家」，可見悠悠之口，那足爲憑。曾先生嘗有兩句自慰的詩：「道高一尺魔千丈，物議飛來莫用噴。」他向來不計較什麼毀譽問題的，他不以他人之毀而憂，也不以他人之譽而喜。從前港報曾經登載過曾先生一首「海上觀日詩」，說明這道理，極爲透澈，頗饒興味，茲將港報原文錄下：

「曾見愚公先生海上觀日詩云：

「萬方明照物，五彩訝披紗；沒似珠沉海，升如月吐霞。去來無缺憾，好惡任喧嘩。若擬人間世，差同政治家。」

記者知先生夙喜欣賞自然之美，尤愛朝霞與落日。嘗喻明月似文學家，而太陽則似政治家。月之本身，有圓有缺，人無不愛

，足予吾人以安慰。太陽普照寰宇，萬物以生，自其初出，以至沒落，始終圓而不缺，本來面目，未損絲毫，不論人之愛憎如何，卒完成其對人類之義務而去。與政治家之挺身而出而撥亂救治，救國濟民，不計人之毀譽，祇求達其任務者，正復相似。蓋無太陽，則五穀無由而熟，人類或幾乎息；無政治家，則國家無由而治，社會不免於亂也。試觀旭日初升，霞光萬丈，有如新起之政治家，人皆愛之；及至烈日當空，炎威炙人，則如當權之政治家，人皆憎之；迨日薄西山，斜陽冉冉，則如下野政治家之晚年，人皆惜之。然而夕陽雖好，已近黃昏，政治家又豈能長生不老耶！先生於海上觀日之餘，輒有此感，嘗莞爾而笑曰：「人之於太陽，一日三變其愛憎；人之於政治家，一生數變其毀譽，則又何足怪哉！」記者聆之，乃知其一生政見，不隨流俗爲轉移，獨往獨來，有山然矣。」

曾先生近來嘗把他的活動認作「超黨派的救亡運動」。他常常對同志說：「我們的信仰是不能動搖的，我們的黨籍是不用諱言的，但我們和各方面人物周旋，千萬不可拿自己的黨義來繩人家。我們是黨員，同時也是國民一分子。比方信仰宗教的人，是教徒，同時也是國民，儘管各有各的信仰，但是國民的義務，大家都要盡的。不能因爲甲信仰孔教，



乙信仰佛教，丙信仰耶教，丁信仰回教，便弄得甲乙丙丁絕對不能合作。須知所謂「國家高於一切」，原是指國家高於黨派，高於教會，高於階級，高於個人，斷不能因信仰之不同，便連國民的義務也不能攜手共盡。」他這種宏闊而曠達的襟懷，自然容易引起別人的共鳴。所以他自從離開重慶以後，無論在昆明或在香港，都爲一時物望所歸。他確有曾湘鄉愛才之風，凡有才學之士，他往往扶病訪問，推誠相與，不論是那黨那派，或無黨無派，他都樂於結交，這種超黨派的精神，曾經博得廣大的同情。無怪渝方特工人員，要時時把他作爲情報資料，但這樣究竟又何傷於日月之明呢？

有人常問：「曾先生慎於出處，遲不出山，是不是有點近於好名？」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直率地答覆：「名利兩者比較，他確是近於好名的。但他所好的是身後之名，而不是生前之名。」因爲生前之名，極不可靠。甲以爲堯舜，乙以爲桀紂；甲以爲聖賢，乙以爲盜跖。是非毀譽，毫無一定所以歷來的政治家，例置一時的毀譽於不顧。然而獨裁者及其黨徒，時而對他輕視，時而又對他重視，視他爲問題中人，可以說是根本缺乏認識！艱難創黨歷十九年的曾先生，現

### 國內左右兩派之中國青年黨觀

在仍以在野多病之身，繼續度其亡命生活，他今後的動向如何，自不免爲世人所注意。但筆者可以重複地說一句話：「凡無利於國而有利於黨的事，是曾先生和我們青年黨同志所絕對不願爲而且不屑爲的。」

但有人說，蔣介石對於文人并不重視，向視文人如娼優隸卒，不值錢，以爲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然而我們細察過去蔣的秉政歷史，蔣對武人，確有辦法，但對文人，并無辦法。試看十幾年來，南北武人如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張發奎、陳濟棠、陳銘樞、李濟琛、蔡廷鍇、石友三、韓復榘、孫殿英等迭次的反蔣運動，無一不被他次第蕩平，以金錢與武力併用，施用內勾外壓的手段，及胡漢民先生所說的「扼、拆、嚇」三字訣，因而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反蔣勢力，曇花一現，即歸消滅，的確反蔣的武人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但我們再看一看他對付文人的結果怎樣呢？今日雄據延安號稱長征了二萬五千里的毛澤東，曾畢業於長沙初級師範，不是文人嗎？迭次反蔣，善造風雲召集過非常會議，擴大會議，今日組府還都的汪精衛先生，不是文人嗎？一度被囚於湯山，釋放後遠走港粵，造成兩廣獨立局面的胡

漢民先生，不是文人嗎？又如批評財政政策，攻擊外戚專權，使蔣孔宋三家無可奈何的馬寅初先生，不是文人嗎？因了文人，不知使蔣耗了多少心血；因了文人，不知使蔣添了多少白髮！無怪乎前年在南嶽軍事會議席上，蔣懊喪地說：「還是文人難於對付！」

其實，文人都是書生，並沒有三頭六臂，毫無可怕之處。但是書生却有三個特點：第一，書生重是非而輕利害；第二，書生重理想而輕權勢；第三，書生重精神而輕物質。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幾句話可以算是正派書生的傳統精神，昔曹操父子，挾天子以令諸侯，三分天下有其二，曾令人招降諸葛武侯，武侯作正議以叱之：「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世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武侯態度這樣倔強，便是「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表現。又如從前胡適之先生的咏柳詩曾有兩句話：「西風莫笑柔條弱，也向西風舞一回，」這充分反映出文人反抗軍閥的心理，決不是威武所能屈的。

在中國歷史上，我們隨時可以找出不少爲文人吐氣的史

實。例如清代龔定庵先生「送夏進士序」文中說：「乾隆中，大吏有不悅其屬員者。上詢之，以「書生」對。上曰：是胡害？朕亦一書生也。」定庵文中又說：「天下事，舍書生莫屬；真書生又寡。」以乾隆之英主，亦自稱爲書生，定庵之奇才，亦承認書生的可貴。這是爲書生吐氣的一個例。又漢光武微時游長安，從經師，受尚書，通大義。後來起兵討莽，人皆大驚，道：「謹厚者，亦復爲之！」漢室中興的光武原來也是書生出身。這又是一個爲書生吐氣的例。又如漢代奸雄曹操，終不免受制於一個書生諸葛亮；明代奸臣如嚴嵩，終爲張居正的老師陽明學派的徐階所打倒。「書生」這名詞，雖然屢爲中國歷史上的奸雄所輕視，然而輕視書生者，沒有一個不受嚴重的後果的。袁世凱之於梁任公，蔣介石之於汪精衛，便是最近而最好的教訓。有人說，獨裁專政的武夫，對於不爲威迫利誘的書生，還有一個最厲害的對付方法，便是施行暗殺手段。其實我們看來，這方法不過是獨裁者的自殺方法。請看袁世凱因暗殺宋教仁而激起贛甯四省革命之役；蔣介石因暗殺王樂平而激起西山派和改組派聯合的擴大會議；因暗殺白逾樞而引起嫡系部隊和黨部被迫從華北撤退；

因暗殺曾仲鳴而促成汪先生的組府還都。因暗殺周作人而促使周氏在華北登台；因暗殺唐紹儀而促成溫宗堯陳錦濤在南京登台。試問這些事實，對於袁蔣本身究竟有什麼益處呢？

我們中國青年黨時常被目爲「書生集團」我們對這名詞，並不諱言，因爲我們本來大多數是書生，但我們轉覺受之而有愧，因爲中興滿清的「曾左李」，沒有一個不是書生，而我們這一羣書生至今還沒有完成使命，實在愧對國人。可是我們并不自餒，我們目前雖然被壓迫，雖然受排斥，仍當本着原有的信念，爲理想而奮鬥，向前邁進，決不後退。等待十年二十年後再請國人來批評我們這「書生集團」的成敗與得失。

在結束本文之先，筆者還有幾句話謹向青年黨同志一言

## (二) 國外友邦人士之中國青年黨觀

張吾軍

。記得從前孫中山先生革命，從甲申中法之役，經甲午中日之役，到甲辰日俄之役，前後歷二十年。所謂「興中會時代」，并無赫赫之功，甚至連孫文的「文」也被人誤寫作「汶」字，他後來的鼎鼎大名，在當時確是並沒有許多人知道的。但是自從乙巳年在東京和黃克強先生所領導的「華興會」，章太炎先生所領導的「光復會」合流以後，不到七年，便有辛亥革命的成功。我們看他奔走革命前後歷二十七年纔得一次初步的成功，到十四年逝世的時候，已經超過四十年了，他還高呼「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在我們僅有十九年歷史的中國青年黨，連比興中會的年齡還少一歲，我們怎能妄自菲薄半途而廢呢？同志們！大家奮鬥，繼續前進罷！

中國青年黨建黨十九年來，埋頭苦幹，素不喜作誇大之宣傳。不惟對國內不願於誇，即對國外亦未嘗多所表白。惟

國外友邦人士之中國青年黨觀

國外之士以青年黨爲中國有數之大黨，恆以濃厚之趣味，注視青年黨之發展，尤以友邦日本朝野人士，對青年黨之活動

，頗有深表同情而力為游揚者。例如歷任中國政府元首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之顧問而對中國情形異常熟悉之坂西利八郎中將，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在東京演講「東北問題之要點」，其中有兩段特別介紹青年黨於友邦人士，其第一段云：

「於此尚有一事須注意者，即因近來三民主義未墜人望，反動方面有所謂國家主義青年黨之抬頭，名為中國青年黨，反對國民黨之一黨專政之委員制，仍主張設二院制之議會，大總統民選，由責任內閣施行政治，其組織雖尚幼稚，但已有相當多數之會員，為反動思想中之有力者。」（見「日人對東北言論集」七四頁）。

上文所謂「反動思想」，乃指由一黨專政所激起的反對思想，所謂「反動方面」，乃指反對一黨專政之力量，非一般所稱「反動派」之「反動」理論也。其第二段云：

「再目前中國在政府中之要員，固不得不為三民主義之崇拜者，但一般人未必全部信仰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現已有下坡之勢，多數人均主張有改變趨向之必要，尤其對於懸掛遺像舉行紀念週等宗教儀式、更多反對，總之，局勢必有變動，國家主義或許抬頭。」

坂西中將認為「局勢必有變動，國家主義或許抬頭」。其對吾人期望之殷，溢於言表。又坂西中將曾兼任貴族院議員，曩在東京，為喚起日本朝野對於中國青年黨之注意，曾在貴族院一度廣播講演，略謂中國青年黨已擁有百萬黨員，為不可忽視之新興勢力。結論並以肯定語氣，作如下之斷語：「代北洋派而興者，國民黨也；代國民黨而興者，青年黨也。」當時遍載日本各報，引起極大之注意。惟坂西中將對吾人之同情與熱望雖屬可感，然所言未免期許過當：第一，中國青年黨員在戰前尚未達百萬之數，坂西中將謂本黨已擁有百萬黨員，顯係根據傳聞，與事實微有出入。第二，坂西中將謂青年黨可代國民黨而興。其實本黨目的不過敦促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與各黨聯合，協力救國，並無推翻國民黨政權取而代之之意。今距坂西先生演講之日已十年矣，而吾人猶在艱苦奮鬥時期，迄無喧赫之表現，殊覺愧對同情本黨熱望本黨之國外友人也。

此外，東京有「東亞會」者，編印「東亞月刊」，其第十五卷第一期載有「中國青年黨史略」一文，著者不詳其姓氏，該文對青年黨可謂為有系統的研究，雖所敘非盡翔實，

然亦可供關心本黨者之參攷，該文首敘青年黨之現狀云：

「中國青年黨有十七年的悠久歷史，是一個在國家主義信念之下，反對國民黨，共產黨，繼續鬥爭的政黨。事變前，最盛時期，擁有約計十七萬黨員的實力（黨團及別動團體）。事變後，與國民黨合作，在重慶設有總部，為左舜生，曾琦，李璜等所領導，今春重慶之第二次國民參政會（譯者按係指三十年春）左舜生被選為主席團之一員。由於汪精衛氏領導下和平運動的發展，青年黨中的和平派便以趙毓松為首腦，組織中國青年黨中央政治行動委員會，該會踴躍參加和平運動。」

關於參加和平運動以後，青年黨對黨治之態度，該文亦有所論及：

「中國青年黨從來反對國民黨的黨治，對最近國民黨所提倡之「國民黨中心論」，採取嚴重的批評態度。要而言之，青年黨是維持現狀主義，對國民黨所標榜取消各政黨，樹立「一國一黨」之主張，持絕對的反對態度。所以今後隨着國民黨之發展，與青年黨發生摩擦，是當然預知的事。」

又云：

「純正的國民黨，為實現中國新體制，希望取消各黨各派，均參加於國民黨之旗幟下，但青年黨對此，則抱有不同之意見，即

國外友邦人士之中國青年黨觀

：「國民黨員愛國民黨，同樣青年黨員，亦愛青年黨。其他各黨各派如自動解消其團體，本黨表示同情，余等之信仰未變以前不能作東施效顰，亦不欲妄自菲薄也。」

按青年黨雖反對「一國一黨」之主張，但汪精衛先生至今并未明白宣佈恢復一黨專政，則該文所謂國民黨與青年黨之摩擦，未免言之過早。該文敘述青年黨與新政權之關係云：

「中國青年黨是中國三大政黨之一（國民黨，共產黨，青年黨）。繼續秘密黨務工作，已歷十七載之歲月，較諸國共兩黨之動態，雖顯沉寂，然其潛勢力乃為吾人所不能輕視者，此次一部份青年黨員，奮起邁進國民黨之和平運動，想不久的將來，將予新政府以助力，因此，關心新政權者，對該黨總須有大體的認識。」

關於青年黨在中國政黨中之地位，該文敘述甚詳：

「中國青年黨，是中國三大政黨之一，國民黨因獲得政權，威勢極大。一躍而為中國政黨中之王座，共產黨依賴蘇俄支援，始與國民黨合作，其勢力順利發展，繼而國民黨實行清共，共黨即對國民黨繼續武力鬥爭，故極惹全國人士之注目，再回首來看，在沉寂中繼續不斷的作潛伏工作的青年黨，常常為人所忽視，因

此國民黨佔第一位，共產黨佔第二位，青年黨便被看做第三位了。」

「青年黨信仰國家主義，主張全民政治之實施，不但對漠視祖國之共產黨人信奉之共產主義加以反對，亦反對國民黨之一黨專政。青年黨正是站在四面楚歌的特異地位，一方遭受共產黨的攻擊，他方蒙受國民黨之壓迫，飽嘗苦痛經驗，而其結果，反能迅速發展。」

「然而，事實上，青年黨雖蒙受種種壓迫，其秘密活動，反日盛一日，由於中國內憂外患的環境，激發一般國民的國家意識，使彼等醒悟了國家存在的必要，一黨專政的錯誤，以致造成了使不欲參加國共兩黨的有志之士，來參加忍苦奮鬥的青年黨者，日有增加之勢，如此，參加的分子，至今仍保持潔身自好絲毫不抱隨官發財的私慾（如抱有私慾，決不加入受壓迫的黨），彼等只知爲國家繼續艱難的鬥爭，因此青年黨的發展，一日千里，如斯困苦的環境中，仍未解體，想爲此種原因了。」

「同時青年黨的地位，在最近的將來，青年黨員相信或有一種變化。據彼等之言論謂，今日的環境和事實，無一不適應青年黨前途的發展。第一，「國家至上」，「無國家則不能生存」，完全證明了。「打破國家組織」「黨高於國」等等的謬論，完全被

國家主義壓倒了，第二，共產主義已遭受多數人的反對，尤其中國共產黨把握廣大的民心是困難的。即共產國家蘇俄，亦漸漸改換共產主義的真面目了。第三，國民黨執政垂十餘年，其威勢固有，然仍未形成中心勢力，民衆亦不心悅誠服。國民黨不能成爲民衆的中心勢力。盡人皆知其缺點。且黨內復分若干小派別互相牽制，由上三點看來，青年黨將來的地位，實在是可以樂觀的。」其次，該文復論及青年黨思想之淵源，尤其對於國家主義之何以育成，可謂爲有正確的認識：

「中國青年黨的結成，是基於信仰國家主義。若將國家主義簡易的下個解釋，即：「愛國，強國，治國，保國，忠於國」，等意義。國家利益重於一切，國家主義的理論尙未系統的形成以前在中國愛國，強國，保國的思想，已經萌芽了。這種思想便漸成爲國家主義青年黨結成的胚胎了。」

「中國近代國家主義的運動，是在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及一八六一年英法聯軍，中國失敗以後開始的。復由於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中國敗戰，國家蒙受重大刺激，國家主義的思想，應運澎湃，長足的飛躍起來，且因此，由從來對外敵視的態度，轉變爲對內改革了。改革運動，由於手段的差異，分爲以下二派：一爲康有爲的「保皇會」，主張君主立憲，一爲孫文之「同盟會

」，主張急進革命。由於清政府之腐敗，君主立憲失敗，贊助孫文之革命者日盛一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革命運動起義武昌，打倒滿清，於是國家主義的對內運動告一段落，國家意識深入人心了。」

「民國成立後，北洋軍閥掌握政權，仍有復辟運動及黨派之爭鬥，國民爲國內問題所刺激，陷於疲勞，民四五月七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之要求，反使民衆反抗列強之情緒興奮，即國家運動亦由半意識狀態入於全意識狀態，五月七日的事件，公認爲國恥，民國八年，復發生五四運動，反對凡爾賽條約及山東問題，全國學校商店，完全響應，展開罷工罷業運動，終致拒絕簽字，罷免親日官吏，於是國家意識由此育成。」

「在此階段中的中國民衆，憬然覺醒、痛感國家之重要及國家之至上，因此「愛國」，「保國」，「忠於國」，「國家高於一切」等等精神，充滿於國內了，此即國家主義青年黨之前身——胚胎。」

該文第三節敘述青年黨成立之經過云：

「直到民國十二年這個期間，中國國民的國家意識，逐漸增強，國家主義運動，亦應當時需要，日見發展，但尙未成功一個政治運動的名稱，直至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會琦，李璜，張子

### 國外友邦人士之中國青年黨觀

柱，段慎修等，在巴黎的玫瑰城，實行正式組織國家主義青年黨，開始祕密黨務工作，在歐洲的留學生及華僑，極爲銘感歡迎，翌年，會琦，張子柱等，從事國內智識階級的組織工作，進展極爲順利，同年十月十日，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的正式機關報醒獅在上海出版，與巴黎之先聲報相呼應，憑藉此等新聞紙公開宣傳的以政治運動爲目標，頗獲國民之注意與同情，同時，開始黨團的活動，實行預定的計劃，至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二日，更有「中國青年黨」的名稱公開於中外，國家主義運動表現了有組織和計劃，漸爲黨外人士所明瞭。」

「若談到青年黨形成的原因，可如下述：第一，由民國八年至民國十年，發生新文化運動，所有的時代落伍的舊思想舊制度，被粉碎得體無完膚，結果，陷於空虛狀態，由於新思想新制度出現，而不能使其統一的原因，一般既不信仰三民主義，亦不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很迅速的跑到國家主義的陣營，以此爲中心思想，而青年黨便結成了。第二，民國七年後，南北不統一，政治日形腐敗，人民則由於不絕的內亂，陷於不能生活狀態，所以一向埋頭於學術文化之士，此時亦關心起政治來了，尤其自民十二曹錕「賄選事件」發生，更促使熱心國事者，參與政治運動，此亦促進國家主義青年黨形成之一因也。第三，由民國八年至十二年

，世界和平聲浪高鳴入雲，然證諸事實，不過係一種空想而已，爲解決中國問題所召開之華盛頓會議，結局只是空洞條件，不但列強仍維持領事裁判權，即稅關行政，亦不得收回，此亦爲中國人所不能忍受，因此，國人覺悟了世界和平之不可期，非自強自救不爲功，亦爲促進青年黨形成的原因。第四，五四運動以後，思想界自由開放，致共產主義輸入中國，思想徬徨的青年，便接受了共產主義，但國家主義者，認爲欲從如斯危機中救出中國，並爲排斥共產主義，感覺非有一個組織不可，因此青年黨結成了。

「要而言之，青年黨之結成，是迫於現實的需要，決非是基於空想的理論。」

青年黨原爲書生集團，其初僅從事於文字宣傳。博得廣大同情，其後青年黨規模粗具，乃致力於軍事人材之培養。

該文對此亦有所敘述：

「一面藉醒獅先聲報，作文字之宣傳，同時同志等開始作實際的活動，以致國家主義的革命組織，漸次普遍於全國各省，國外方面，由歐洲各國開始，以至日本，美國，南洋各地，均有國家主義青年黨及支部之組織，從事秘密黨務工作了，信仰國家主義者，積極方面，發揮國家主義的理論及其政策，消極方面，反對

新舊軍閥及共黨等反動勢力，與彼等作終始戰，因彼我力量上之差異，未能作出使人驚異之效果，但每個國家主義信徒，都保有了血的苦鬥經驗是不能否認的。」

「民國十四年以後，由於五卅事件之激刺國人，國家主義運動大爲進展，一向很多漠視國家主義者，此時亦因該事件之刺激，醒悟了只有國家主義始能拯救中國之危亡，毫不躊躇的投入青年黨陣營裏。同時青年黨爲提高民衆之國家觀念，以此爲契機，給與民衆以正確的領導。便總動員參加了各種的民衆團體，從事各種愛國運動。一方面曾琦，李璜，張子柱，趙毓松，楊叔明諸氏，於國內開始準備軍事實力，急速展開各方面的政治關係。他方，余家菊，王慎虛諸氏，親自參赴軍隊，擔任教育訓練事項。同時並派遣梁思忠，崔宗漢等同志百餘名，赴國內外各軍事學校，使其研究高級軍事學。所以南方如四川，雲南，貴州，廣東，廣西，北方如河北，山東，河南，山西，以及東北三省，乃至長江中部各省，到處印有中國青年黨軍人之足跡。尤其張學良之部下，參加青年黨者，更爲很多。」

青年黨除基本組織外，另有別動組織，該文有云：

「當此時期，在國內之青年黨的別動團體，北京有國魂社，南京有國光社，四川的揚社，江蘇的少年中國自強團，河北深榆的



中國少年自強社等三十餘團體。國外方面有美國大江會，大神洲會等，完全忠實的接受黨的命令，尤以擁有教育界極大勢力的國家教育協會，亦參加青年黨了。由於展開了計劃的，系統的，規律的救國工作，國家主義運動便由宣傳而進展到實際行動了。」

青年黨成立以來，受國共兩黨雙重壓迫，赤手空拳，以與搏鬥。其間艱苦備嘗，頗多血的歷史。該文對於本黨所受種種阻礙，亦深寄同情：

「至民國十二年，青年黨的正式組織，尙未見諸成立前，在巴黎作愛國運動的國家主義者，已經受到共產黨徒的壓迫。常在救國運動的會場上，演互毆事件。此後國家主義在中國日形發展，共黨的壓迫手段，亦日加激烈，在言論上，罵國家主義者，爲什麼「小資產階級的開倒車思想」「狹隘的」「反動的」「時代落伍」等，極盡輕蔑的能事，在行動上則公開挑戰，民國十五年三月李璜在北京大學作反俄援僑大會，及同年六月，陳啓天在武昌召集國家教育協會之際，共產黨曾兩次雇用無賴漢侵入會場擾亂，青年黨員，及同情青年黨者，便對此等暴徒反抗致雙方演成流血慘劇。國共合作後，共產黨憑藉國民黨之勢力，於廣東湖南禁止醒獅出版，舉行反國家主義運動。」

「在上海，曾利用英人勢力，搜查醒獅社逮捕曾琦汪洋。繼之

### 國外友邦人士之中個青年黨觀

又將青年黨熱心工人運動首領馬志祥殺害，張翊負傷。國民黨北伐進展後，共產黨更在長江以南各省對青年黨加以壓迫，封閉青年黨設立之學校十餘所，禁止發行之新聞二十餘種，沒收青年黨員之家產三十餘戶，青年黨同志百餘名被監禁殺害，此外對同情青年黨遭受連累者，更不計其數。」

「民十六以後，實行清黨後之國民黨，仍對青年黨繼續壓迫政策，標榜黨化教育，開除杭本裕等青年學生六百八十餘人，並引用反革命懲治條例，及危害民族緊急治罪法，逮捕殺害多數國家主義信徒。五四以來，從事學生運動之青年黨員如李守黑，在南通被逮捕，在湖南西部領導國民運動之趙登瀛被認爲共產黨之間諜而遭暗殺，南京從事青年運動之盛仲謙被藍衣社之騙而失跡，北方努力反共之成志達被狙擊限命於北京，南方倡導反對軍閥言論之黎工飲死於香港之恐怖手段等，不遑枚舉。如上述之國家主義信徒，均爲了黨，爲了國，而陷於失學，失業，破產，被毆，逮捕，監禁，狙擊等悽慘狀態。」

青年黨雖受如上述種種阻礙，然猶能屹然不動，繼續生存者，其故安在乎？該文曾作如下之說明：

「青年黨在多重壓迫的環境中，仍能繼續生存者，一則由於偉大的同情及熱烈的友愛而使同志團結，一則由於嚴肅之黨規，勉

戒同志所致耳。只此一點，實爲青年黨繼續生存永不解體的最大原因。」

青年黨雖已奮鬥十九年之久，然吾人深自內疚，愧未能挽救國難於萬一，願該文作者謂本黨已有下列之功績：

「青年黨十七年之苦鬥，對中國社會遺留下的功績，如左所述

- (一) 對國家主義的理論系統的完成。
- (二) 確立國家主義的革命組織。
- (三) 把握住一部分青年的思想及行動。
- (四) 收穫反共反蘇之相當效果。
- (五) 實行並提倡收回教育權。
- (六) 領導民衆對國賊及強權與以實力對抗。
- (七) 爭取民主政治反對一黨專政。
- (八) 使民衆覺醒國家爲至上之意義。」

關於國家主義之理論，本黨另有專書闡述甚詳。該文作者似亦曾加研究，故有如下之論列：

「一言以蔽之，所謂國家主義，是以國家爲最高單位，無國家，則人民無保障，無幸福，也談不到民族之生存。因此，每個國民必須愛國，保國，忠於國，以國家之利益爲前提而犧牲一切。

不論社會之演變如何，只有國家這個組織，永遠存在，而且人民之生命財產，與國家有聯繫之關係，不論到何時何地，必以國家之利益作爲根據，共產黨抱有不要祖國，與夫國民黨之以黨治國之思想，二者均爲極不合理，總而言之，非以國家之利益爲先決條件不可，然而如何擁護國家利益？如何使國家至上至尊？關於此點，國家主義者有左列主張：

(一) 實施全民政治 救國須團結全國民衆，憑一黨，一階級，或少數人治理國是，爲不容易，故須實施全民政治，以期形成統一之國家。

(二) 努力自強自救 鑒於世界情勢爲弱肉強食，極少道義結合，欲求生存，厥爲自強自救，不可專依賴他人。（此處所說他人，係指英美而言。）

(三) 內求統一外求獨立 欲使國家隆盛，對外須脫離外人之束縛，對內須剷除軍閥割據及紛歧之勢力。（北伐以前中國國內軍閥極多，事實上爲內不統一，外不獨立之局面。）

(四) 除國賊抗強權 國勢衰弱之原因，一則由於國賊之盜取竊求，一則由於強權之榨取，故欲使國家興盛，必將此二者兼爲剷除。」

「由於上述之主張，惹起不少人士之誤解與疑惑，有人將國家主義看做帝國主義，排外主義，或個人資本主義，國家主義者，

均一一予以辯解，第一，國家主義並非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主張侵略，國家主義則反抗侵略。第二，國家主義決非排外主義，爲充分實行自衛，完全不依存於外力，以期脫離外人之束縛。運用外交，以求國家繁榮，決非對所有國家使其外交關係斷絕。第三，國家主義並非個人資本主義，因爲國家主義者攻擊不適合國情之共產主義，以致有人便認爲個人資本主義，實則國家主義主張發展國家資本，限制私人資本。」（見國家主義爲什麼反對共產主義一文。）

青年黨之潛勢力究竟如何？該文有如下之估計：

「二十七年以後，青年黨的潛勢力，日趨於增加之一途，由於戰爭關係無詳細統計。據民國二十五年報告，全國新組有八千九百七十三組，舊組有五千六百餘。已被停止組會者九千餘人。被其指導下別動團體，如學校，公會，工會，雜誌社等，約三百五十單位。合計以上約達十七萬人。」

該文又述及華北之青年黨情形云：

「在華北地區的青年黨黨員，爲數極多，其中有隱居者，亦有服務於行政機關內者，彼等尙互相聯絡。」

又云：

「在華北曾有「華北青年黨」之名稱出現，繼而改稱「新青年

國外友邦人士之中國青年黨觀

黨」及「青年黨」，只不過假藉青年黨之名義事實上內部純真之青年黨員，爲數極少，最近該假黨已被解除了。」

綜觀該文所述，雖非全屬事實，然頗多近似，足見友邦人士，關懷本黨，洞察入微，惟關於「華北青年黨」一節，吾人應加辯正者。所謂「華北青年黨」領導人劉紹琨君，於十年前，確曾加入中國青年黨爲黨員，當時本黨領袖曾琦先生亡命日本，遍訪日本朝野名流，交換關於中日問題意見，以劉君生長於大連，善操日語，乃令充任翻譯，須知翻譯並非代表，若友邦當局因劉君曾充會先生之翻譯，即認其爲本黨正式代表，實爲絕大誤會。况「七七」事變以後，華北青年黨在平津公開活動，劉君曾以首領地位在天津庸報發表談話，公然抨擊本黨最高幹部曾左李諸先生之人格，一望而知其立場早已與本黨，完全相反，其後該「華北青年黨」改稱「新青年黨」，旋又改爲「青年黨」，黨名數變，用意不明，與中國青年黨可謂毫無關係，特加辯正，以免混淆。至於中國青年黨之歷史尙在創造之中，吾人雅不願自我宣傳，張大其詞，惟既承友邦人士寄以同情，復際茲中日戰爭狀態尙未完全休止之時，務使全面和平早日實現，中日兩國，平等

合作，並肩攜手，建設「東亞共榮圈」，以完全「亞洲人之

亞洲，」庶不負中外人士之期望耳。

寄懷陳意園先生

木公

宦游一夢記邯鄲。識透民情另眼看。  
朗月冰心明折獄。清風亮節喜同官。  
老成正直長堪念。末俗偏私最可歎。  
爲問廉頗能飯否。期迴劫運仗忠肝。

## 閒話

渭清

這是一段閒話。假使須要一個命題的話，就叫做『幸福』。幸福是一個很通俗的名字。小學裏的學生都會講。愚婦愚夫都在那裏追求。有的人謀的是個人的幸福，家庭的幸福。有的人謀的是社會的幸福，人類的幸福。幸福可算是全人類同謀的標的，不過認識不同，方法也就各異了。

然而全世界的人類中真正得着幸福的有幾個？有幾個人不是長期的陷於苦境之中呢？何以終日終年，我們所追求的東西，終於得不着，甚至愈求而距離愈遠？這些問題恐怕很少的人能夠冷靜的去想。

我以為追求一個東西，至少總要懂得這樣東西，你懂得了這個東西，也就可以說得着了這個東西了。因此我們可以說懂得幸福的人就是得着幸福的人。

什麼是幸福呢？幸福是一種舒適而愉快的生活。可是愉快與舒適不能專從物質方面着眼。物質的享受是有限度的，無止境的追求足以增加罪惡。精神的享受須建築在健全的理

解與深心的體會之上。有了這兩層工夫，然後才說得上人格的修養。麻醉式的精神生活是自欺的生活。一個人想營一種舒適而愉快的生活得了解下面幾個基本的觀念！

1. 我。我是幸福的主體。沒有一個人對於這個主體不自以為了解而勤加愛護。但是一般人只知道私而不知有我。我不是你，你也不是我。我的自覺在歐洲歷史上造成了宗教的革命，科學的發明，和政治的社會的變革。有了我而後才有一切。

A 我有我的生命，生命是最可寶貴的。生命是上帝贈與我的禮物，不是一筆負擔，我不必憂愁，不必悲觀。我們要愛護生命比愛一隻小鳥更可愛。不能輕易的摧殘和自殺。我們要問犧牲生命的價值，我們要有生存權。

B 我有我的生活，人生的樂趣，就在我們的生活裏。生活愈豐富，我們的樂趣愈多，我們知得愈多，我們的生活愈豐富，我們懂得歷史地理，我們懂得機械原理，飛機如何

能飛，電燈如何發光，人類如何進化，世界有何將來，其中趣味無窮，我們能得愈多，我們生活愈豐富，我們能打球，能開汽車，能游泳，能跳舞，能管理工廠，能治理國事，其中趣味無窮，多知多能，是生活豐富的要素。豐富的生活是人生樂趣的條件。

C 我有我的人格。我的一束習慣與你不同。此之謂我。我有我的意志，我有我的志趣。我有我的生活方式。我依你的意志和志趣在不妨害社會的情況下我來決定我的生活方式，凡與我的生活有關的事體，我須有發表意見的機會，我須有參與決定的權限，此之謂人權。人權者，完成個人人格所必須的條件。

生命的可貴，生活的樂趣和人格的獨立是了解我的幾件事，我是幸福的主體，是了解幸福的前題。幸福的了解與否在於這幾種觀念的了解與否。因此我們可以說幸福的追求在於個人的身心之內，而不在個人的身心之外。

我是幸福的主體，我不能夠離羣獨處。我的需要要社會來供給，社會的需要要我來供給。我與社會不能分立，因此了解我之後當進而了解2.社會。

社會是人羣的結合。由於共同利害與共同旨趣的結合。

A 個人是小我，社會是大我，我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我行為的表現也是多方面的我要求學，那是求知的我。我要乘車那是旅行的我。我要開店，那是經商的我。我要作戰那是從軍的我。把我與社會分開，我將一無能為。把我與社會合體，我的行為將射放於社會各方面，所以說社會是大我。

B 我與社會有縱橫的關係，我在社會裏和歷史上是一個連環。我穿的衣服是裁衣做成，工人織成，農人種的棉花，運輸工人搬入工廠。每一件享用的東西無一不是經過無數人的勞力，閉目而思，這廣大的羣衆誰不是為我而服務。這是從橫的方面說。縱的方面。食米是先人發現的，建築是先人發明的，一切的文物制度有幾件是我們所創造？先人的發現或發明不知道耗費了多少的精力，冒了多少的危險犧牲了多少的生命。先人把這許多寶貴的東西和方法一代一代的傳流到現在，才有我們現在的文明，我們是坐享其成。

C 我們的責任是怎樣呢？搖尾乞憐這是一般人認為可恥的事。不勞而獲與盜竊又有什麼分別？我們受了社會的供養承受了先人的餘緒，我們應該以最大的努力為社會服務，

爲子孫造福。所謂對國家盡忠，對民族盡孝，其道在此。尤其我們這一輩的份子尤應盡更大的努力。我們的享受遠在一般人之上。中國的財富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田畝。本部十八省農民均攬每人所得僅有三畝。全國每人所得年僅三元。（戰前）一般人是什麼生活水準？我們呢？我們所享獨厚。我們應當盡怎樣責任才能說得過是公平？我們要先講義務，慢談權利。重視了權利，義務就忘了。

我是幸福的主體，社會是大我，我與社會有縱橫的關係，我受社會的恩惠，我對社會有應盡的責任，大我的健康是

小我幸福的先決條件，因此我們可以說個人的幸福是建築在社會幸福之上，而不是在社會痛苦之上，人與人之間是如此，國際間何獨不然？

懂得幸福，才有幸福，懂得我與社會的體系才懂得做人的道理。盡一分做人的責任即得一分人生的樂趣。人道無邊，幸福無邊。

以上的話不算怎麼高深，但是不能因爲平淡無奇便忽視牠，因爲天地間至當不易的真理本來便是這樣平淡無奇。

---

中國青年黨十九週年紀念日述感

楊從仁

彈指光陰十九齡，每從憂患度餘生，重重壓迫言難喻，處處摧殘  
夢亦驚，意志堅強方革命，精神偉大任犧牲，史觀唯物思消滅，  
政治全民矢鬥爭，轉戰六千艱苦日，動員十萬信徒兵，無端事變  
翻新局，若許輿圖換舊名，黨國獨裁豈合作，主賓相揖始分庭，  
大難來日需羣力，小就今時敢自寧，怵目環球無淨土，驚心徧地  
化愁城，生靈塗炭誰匡濟，民族危亡莫救營，信仰始終當貫徹，  
主張遲早定完成，欣逢紀念週年節，罷勉同心竭鄙誠。

---



中國青年黨第十九週年紀念特刊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二日出版

定價國幣伍元

編印者 中國青年黨中央政治行動委員會

發行者 中國青年黨中央政治行動委員會

寄售處

南京 北京 濟南 保定 杭州 廣州  
漢口 鎮江 徐州 上海 天津 開封 各大書局  
太原 蚌埠 蕪湖 九江 蘇州 泰州

157  
10005

# 中國青年黨中央政治行動委員會出版書籍

- (一) 國家主義淺說  
李 璜 著
- (二) 中國青年黨略史  
李 璜 著
- (三) 釋國家主義  
李 璜 著
- (四) 共匪的解剖  
陳啓天 著
- (五) 除三害  
常燕生 著
- (六) 國人對於中國共產黨運動應有的認識  
常燕生 著
- (七) 生物史觀與社會  
常燕生 著
- (八) 十九世紀初年德意志國難與復興  
常燕生 編譯
- (九) 大亞洲主義與中國前途  
關作璜 著
- (十) 趙毓松致左舜生李璜書  
關作璜 著

76.002  
54.03